CHINESE HERITAGE

中華遺産

2011.7



特别策划

火车走了

窄轨：慢下来的风景，远去的蒸汽机车

被甩掉的小站 甩掉的人

QJ 6484

RMB20元
HK70元
$6

慢的收获

■ 撰文／黄秀芳

我第一次乘火车是在32年前，从福州到厦门，坐了整整一天一夜。而今的福厦动车，全程276公里，用时仅1小时50分钟！

当年火车之慢有其原因。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福建一直属于前线，1953年中央决定在福建修鹰（潭）厦（门）铁路时，首先是出于国防战备和经济的需要，因此火车没有选择今天动车沿福建东南沿海的线路，而是沿武夷山、戴云山然后经九龙江流域，到达厦门。这条铁路通车后，又在南平来舟南侧的四等小站外洋站处，修通了一条向南接通福州的支线——来福铁路，于是但凡坐火车从福州到厦门的旅客，便要先饶行西北，然后再往西南、东南。这一绕，路程便长了许多，路况也险恶了许多，速度自然快不起来。

不过险恶不都是坏处，慢也有慢的收获。火车慢了，窗外的景色便历历在目。

因为是第一次出门远行，一路都装着忐忑与不安。但当火车吃力地爬行在闽北、闽西那无尽的丘陵、山地、溪谷间时，家乡的风光让我紧张的心得到了稍许的放松。南方气候温润，故而也把南方的山滋润得植被茂密，青翠欲滴。遇到火车爬坡、几乎被两山夹着喘行时，山壁上的草木几乎触手可及，有时真的会有几支淘气的枝桠伸进窗来，让人想起那“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

从此就这样乘火车来来去去，与福建的一座又一座大山擦肩而过。崇山峻岭里，总会有清清溪流，那水清澈得仿佛可以看见水底里游动的鱼儿。溪流不断地汇聚，当火车折向东南时，也进入由众多溪流汇成的九龙江流域，此时车窗外的景色是水多了，田多了，躬身农活的人也多了。

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条大河，九龙江边龙海县榜山镇的洋西村，历史上还曾发生过一件影响中国的大事。

那是1963年，漳州市遭受特大旱灾，为使漳州平原的十几万亩良田能及时插秧，龙海县决定在九龙江筑坝堵江，截流引水，于是洋西村大队为大家舍小家，淹掉自己的千亩良田。此事后来被改编为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龙江颂》，在1972年以后风行全国。

当年我曾是样板戏迷。迷恋的人物里有《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杜鹃山》里的柯湘，还有就是《龙江颂》里的村党支部书记江水英。江水英的招牌形象是齐耳的短发，还有脖子上围着的一条雪白的毛巾。至今还记得她开导为此而想不开的大队长李志田时说的话：“你向前看（登上一个土坡）！你再向前看！”。有了这样的背景铺垫，每每车经龙海县境时，我都会多看它两眼，在心里回想一番。

不过，当时不知道的事是，江水英的原型是男的，名叫郑饭桶。而李志田的原型叫邓流涎。俩人当时其实都是抗灾英雄，但是当《龙江颂》风靡后，两人的命运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郑饭桶变成“龙江精神”的代表，被光芒照耀；而邓流涎却被撤了职，成为落后形象，屡遭批斗。从此一个自信满满，一个木讷寡言。

后来我频繁乘坐的是福州到北京的T45／46次列车。那时的京福线和现今的线路不同，它走鹰潭、过上饶、经衢州、金华、诸暨、萧山、杭州后进入安徽，然后折向南京，入山东、到河北、北京，全程2400公里左右，费时44个小时。

两天两夜的旅程实在漫长，常常坐得下了车后一两天，耳朵里还都是“咯噔、咯噔”的声音。线路之长，使乘客都极其珍视列车靠站的几分钟时间，大家纷纷下车活动手脚，换换空气，买点特产、小吃。有个别站会停靠十来分钟，硬座车厢的人就会利用站台的水池，刷牙、洗脸。

那时的物质供应还颇为短缺，于是金华的火腿、南京的咸水鸭、德州的扒鸡、沧州的金丝小枣，都是最好的返乡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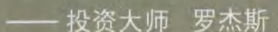
我很喜欢听列车催促旅客上车的信号——有时是打铃，有时是哨音，“嘟……嘟……”的，锐利而悠长，像大人着急地呼唤孩子回家。还喜欢听夜半更深时，列车到站后列车员的轻语声。他们在车下忙着给列车加水，备货，检修车辆，或者指点下车的乘客出站的方向。这样的时候，我偶尔会愿意从床上起身，坐到窗边，看着被昏黄的灯光笼罩的站台，看那些人影，走近，走远。有的刚离家，有的正要回家。若是在冬日，甚或会下车，去呼吸北方夜空里的冷气，看大雪和黑夜怎样作诗作画。

再后来，京福线行程缩短了，从44到36再到19个小时，据说开通高铁后，福州到北京只要7个小时。两地间的时空无疑大大缩短了，但旅程的内容也会随之苍白许多吧。现有的Z59/60次列车，全程就仅停靠鹰潭和武夷山两站。

如今我已久不坐火车，但是曾经有过的漫长旅程，却已沉淀为人生珍贵的记忆。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列由生到死的火车。那么乘快车的人，这一辈子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就只有几个大站。所以他的记忆里没有纷繁的风景，他的人生也就显得短暂、苍白。而踏上慢车的人，不错过每一个小站，可以在慢的行程中收获苦乐酸甜。仅仅从这个角度想，无论怎样，生活里也不能只有快车，没有慢车。

Voice / 声音

"各国政府并未解决引发危机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向市场注入海量资金，用刺激更多消费的方法来解决消费过剩和负债过剩的问题，这显然是行不通的。2009年或2010年国际股市可能再创新低，近期一轮反弹主要是央行大量印钞的结果，基本面存在的问题并未解决。"



—— 投资大师 罗杰斯



"人们现在非常担心美元，但IMF的"特别提款权"已经存在多年，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实际效果其实不怎么样，从短时期来看，我不认为我们能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取代美元的货币。鉴于美国在竞争力和创新力一直保持头牌地位，因此美元还将是世界主要的货币。"

—— 建设银行董事长 郭树清



"我认为营销的本质是沟通，网络无非是给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它每时每刻都在常变常新，网络营销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给顾客一种新的消费理念。"

—— 北京新中关购物中心总经理 王海

"创业并不需要什么特质，重要的是自己着手试试看，"不论失败几次都不气馁地持续挑战，在这样的过程中，就能培养出一位经营者。"

—— 优衣库服装连锁店（迅销公司）董事长兼CEO 柳井正

"武汉的商业只有零售业到今天还很活跃，这得益于外资和内资的竞争，内资在竞争中总结经验，完善自己。"

——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平价连锁分公司副总经理 张万新



"我认为，真正的复苏取决于持续的私人消费取代政府需求，取决于新的财富创造机制的出现去填平政府救市所遗留下来的大量账单。而这方面的形势还很严峻，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方向。"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

Data / 数字

859 元

根据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的"节能空调惠民工程"具体思路，中央财政从6月1日起开始通过补贴方式加大节能空调的推广力度，购买节能空调将可获得国家最高850元／台（套）的补贴，下乡货除外。

100 万元

在世界环境日，零售巨头家乐福正式公布了其节能成果，其将"轻装"应对微利行业竞争。家乐福大中华区总裁兼CEO罗国伟介绍，各门店经过节能改造后，去年共节省能耗费用1亿元，平均单店节省100万元。

400 亿个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对超市零售行业一年来限塑实施情况进行抽样调查显示，全国超市零售行业塑料袋使用率平均下降66%，塑料袋消耗减少近400亿个。

37.23%

国美电器最新发布的一季报显示，受关店及消费者信心低迷的影响，国美业绩继续大幅下滑，一季度利润3.22亿元，同比下降37.23%。

2.2 万人

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沃尔玛公司近日宣布，今年将在美国新开设或扩建150家超市，新增员工约2.2万人。

90%

中国银联近日宣布，目前美国已有超过36万台ATM机开通银联卡受理业务，占全美ATM机总量的近90%。中国居民出行美国将享受到极大的取款便利。

41 倍

全聚德集团成立16年以来，全聚德的品牌无形资产由1994年的2.69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10.19亿元，增长了41倍。

70%

工行近日正式对外宣布，以8025万加元（约7300万美元）向东亚银行现金购买加拿大东亚银行发行的70%普通股。

故宫商业化，到底错在哪里?

■ 撰文/张守刚

对北京故宫来说，5月绝对是残忍的季节。先是有展览文物被盗，后有案件侦破后赠送锦旗，“锦旗”上有错别字事件。再后来，倍受争议的建福宫“会所门”出现了，一直在宫门内过太平日子的故宫，一时间竟手足无措。

所谓“会所门”即“建福宫涉嫌做顶级会所”被披露。

先来简单回顾下该事件的原委：5月11日，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微博上曝光，故宫建福宫已成为全球顶级富豪独享的私人会所，500席会籍面向全球限量发售。此言一出，引发了媒体与社会的强烈关注与质疑。就此，故宫博物院先后两次发布声明，重申建福宫花园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顶级富豪私人会所。

即使如此，舆论与网民的言论对故宫博物院仍旧不利，被指“敛财”的故宫几乎陷入“全民讨伐”的境地。一位文保老专家听说此事后，气愤地面对媒体记者拍了桌子，难掩心中悲痛。故宫与商业化，在某些人心里似乎就应该是“天敌”，即：故宫就不该商业化。

故宫该不该商业化，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能否商业化？第二，享受财政拨款的国有博物馆，是否应该商业化？

先谈第一个层面。笔者认为，为尽量全面保护古建筑原貌与文物价值，不宜进行任何商业开发，这应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先以建福宫为例，建福宫是“复建”，这可能让它的文物价值打了些折扣，但它仍然承载了历史的内涵和艺术的韵味，是不能以“一所平常的房子”来定位的。

这样的建筑，如果真如同故宫声明中所说，仅仅用于贵宾接待、举办新闻发布会、小型展览、主题沙龙、讲座等文化活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成为某些人专享的、封闭的、排他的“全球顶级会所”，无疑是越过红线的行为。因为如此一来，被忽略的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殊性，即它们大多为土木结构，不管是使用年限还是易受损的程度都相对较高。

其实，公众对“建福宫涉嫌做顶级会所”的强烈反感，与国内古建筑保护过分商业化的倾向也有关系。任何一位参观者，无论在故宫还是在颐和园、天坛等地，都会看到鳞次栉比的廉价且同质化的旅游商品店，感受到强烈的“铜臭”气息。更不断有媒体爆出，有些名人故居建成了高级餐馆、私人会所等丑闻。所以，这并非针对故宫，而是民意的一种习惯性反弹。

第二个层面，享受财政拨款的国有博物馆能否商业化？其实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根据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博物馆管理办法》规定，“国家鼓励博物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自身发展。”200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也明确规定：“博物馆可以依法开展符合本馆特点的经营活动，接受捐赠、资助。”

也就是说，无论是国有博物馆还是非国有博物馆，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是“有法可依”的，公众尽不必大惊小怪。目前国有博物馆的收入来源，多数还是靠国家财政拨款，比如故宫就是国家全额财政拨款，即使它拥有数额惊人的门票收入，也是要悉数上交国家。此外，一些文化产业的尝试，还只是停留在日常饮食、场地出租、纪念品销售等初级水平。

而放眼国外，世界博物馆学界早在20年前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博物馆商业化已经是共识。资料显示，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在2007年时，政府补助占其总收入的56%，社会捐赠占6%，经营性收入占38%。而法国的卢浮宫在2008年时，法国政府仅资助其一半的预算，约为1.8亿美元，剩下的经费全由卢浮宫自给自足。

他们的探索方式，说起来可能令国人咋舌。2004年6月，印度富豪米塔尔为独生女举行为期6天的“世纪婚礼”，其中花了9.6万欧元租下了凡尔赛宫举行千人晚宴，又用5万欧元租下维孔宫和杜伊勒里花园，并在花园里举办了盛大的焰火晚会。另据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近期打算，把凡尔赛宫中一栋荒废的宫殿改建成5星级酒店。

试想，如果有人想租下故宫办私人婚礼，或在故宫里建设酒店，公众又会是怎样一种强烈反应？

由此联想到早前引发轩然大波的故宫“星巴克咖啡”事件。其实，麦当劳早就入驻了被视为法国精神象征的卢浮宫，蒙娜丽莎的鼻子多年前就嗅到了薯条的味道；而凡尔赛宫公关部负责人也表示，美国品牌进入算不上什么问题，只要游客有相应的需求就行。

也许有人要说，这大概跟西方与中国宫殿的不同有



2011年5月，当故宫建福宫“会所门”事件发生以后，进入建福宫的所有通道都被锁住了（下图）。在故宫探索商业化的道路上，建福宫形式被否定了，除了左图这样销售旅游纪念品的商业化模式，还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呢？



关。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中国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这种建筑材料的不同，使得西方宫殿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能实现更多的可能，而遭致的损坏也相对较小。比如，在杜伊勒里花园举行的焰火晚会，则是绝不可能在防火重地故宫进行的。

另一种声音则说，中西方宫殿存留于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不同，也是商业化开发接受度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中国，故宫作为沿用了几百年的封建王朝的宫殿，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与文化，更承载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威严，因而在国人看来十分神圣。而西方的宫殿未被披上那层神圣的外衣，其负担相对则要轻得多。

总而言之，对博物馆商业化的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包括故宫在内的国有博物馆都可以进行商业化的尝试，但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应该设立不可逾越的底线。比如，在中国的宫殿，商业化的对象应该有所选择，可以是能体现中国风格的商业活动，或者是格调相对较高的商品。而那些洋式快餐、低廉的旅游产品，应当适当退出故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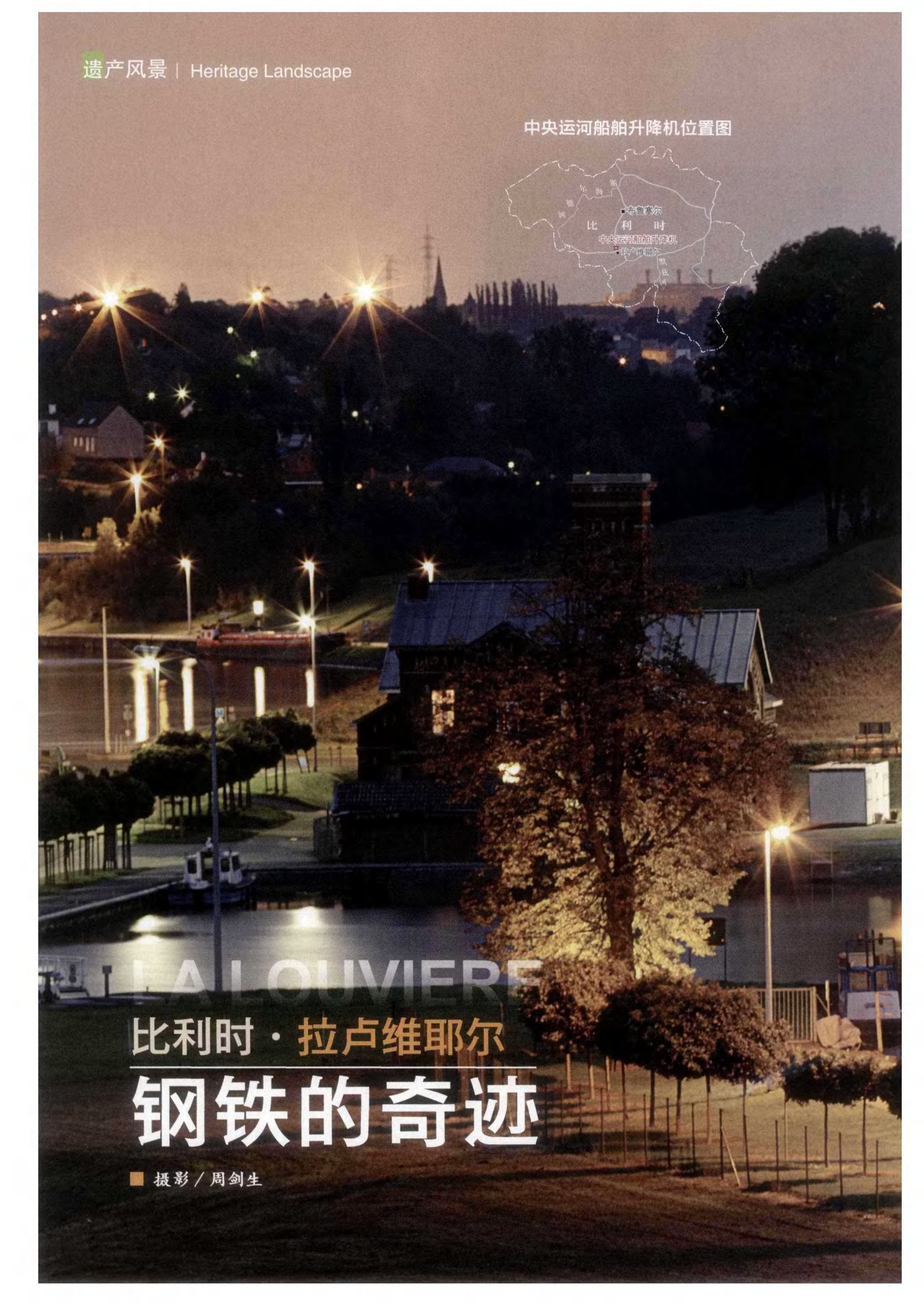
在公民意识逐渐觉醒的当代中国，进行任何商业尝试还应该考虑到公众的感受，否则，一意孤行，就容易陷入舆论的“万劫不复”境地。建福宫事件发生后，一个不想让人看到的后果就是：故宫商业化尝试的大门，可能就此长期封闭了。我想，即使是愤怒的公众，也不想再见到一个暮气沉沉的故宫吧？

最后，值得提醒的一点是，目前公众的眼睛还仅仅盯着“星巴克”、“建福宫”等这些容易引发仇富或者民族主义情绪的事件，而有些更深层次的商业“猫腻”，是他们难以觉察的。

比如，《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文物商店或者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有些收藏拍卖人，却绕着弯儿让拍卖与文物收藏单位挂钩。一位业内人士向媒体透露，2011年初嘉德拍卖的侣明室家具，其实就是曾在2006年故宫展览上出现的展品，“他们那东西本来就值几千万，花五百万（在故宫）搞一个展览，它卖好几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故宫品牌被私人极为廉价地利用了，尽管以一种极为隐性的、大众难以觉察的方式。这是我们应该要警惕的，也是坚决反对的。相反，如果以一种敬畏文物的心态与公开透明的方式，依法进行稳妥的商业化尝试，公众是不是也应该放下固有的成见，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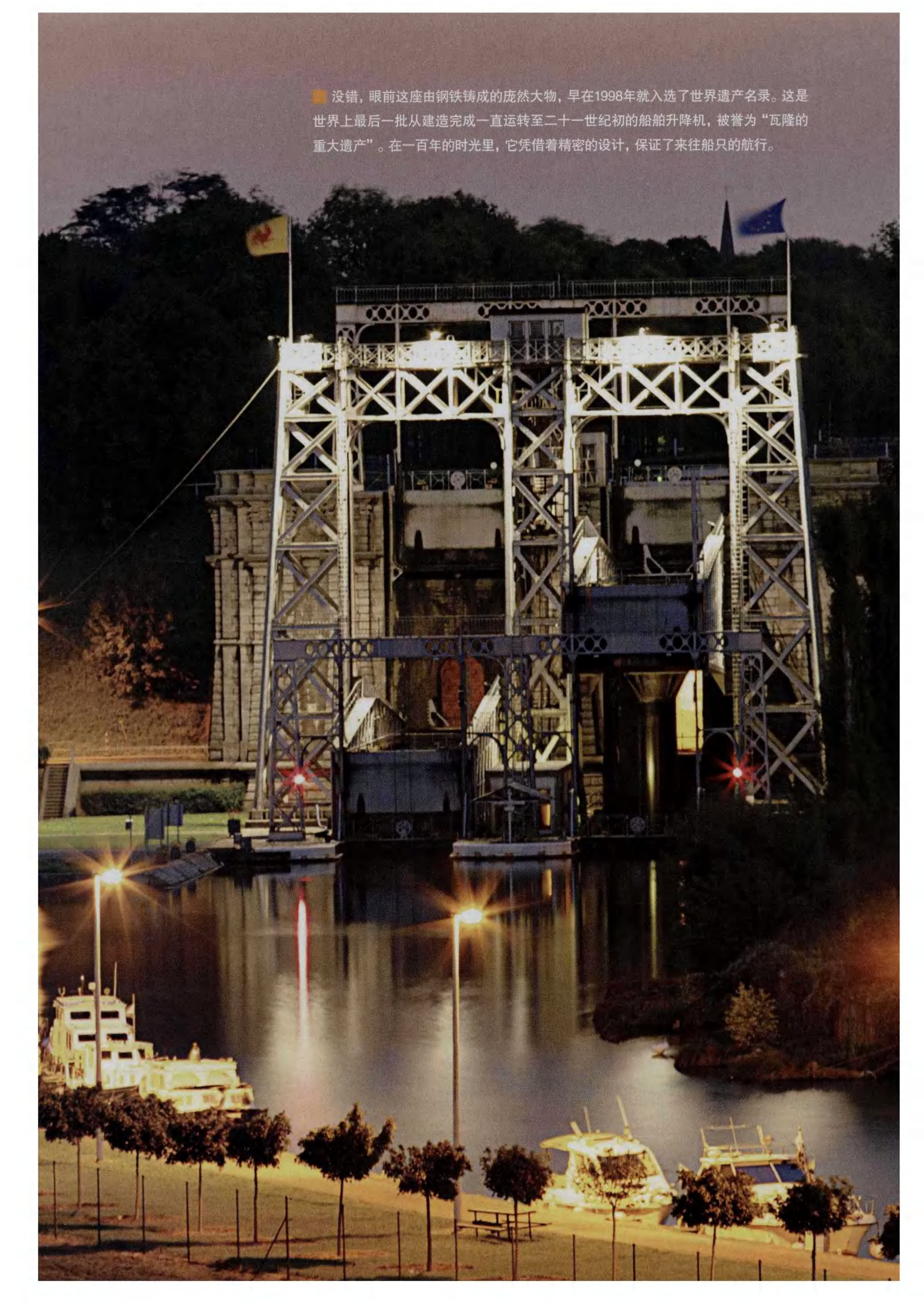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戴莹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比利时 · 拉卢维耶尔

钢铁的奇迹

■ 摄影/周剑生



没错，眼前这座由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早在1998年就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世界上最后一批从建造完成一直运转至二十一世纪初的船舶升降机，被誉为“瓦隆的重大遗产”。在一百年的时光里，它凭借着精密的设计，保证了来往船只的航行。

位于瓦隆行政区的拉卢维耶尔，是比利时重要的钢铁工业中心。12世纪末，拉卢维耶尔以东地区发现了煤矿，但这片区域恰恰位于默兹河与斯海尔德河流域之间，当时还没有适于行船的运河，人们只能通过人工背运将煤矿输出。直到1807年，独掌比利时统治权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积极谋划着称霸欧洲的战略步骤。为了把煤运往法国，他下令修建一条从拉卢维耶尔所在的埃诺省首府蒙斯，到法国孔德的运河。11年后，这条运河与法国境内的圣昆坦运河同期竣工，比利时矿区的煤自此便可以直达巴黎。

运河的修建大大缓解了比利时人长期以来头疼的运输问题。但蒙斯和拉卢维耶尔之间最关键的7公里航路，却因为蒂厄附近地势起伏较大，水面落差高达66.2米，而迟迟未能开通。直到1884年，英国工程师埃德文·克拉克的奇思妙想最终解决了船只的升降问题。他发明的船舶升降机由两个垂直的移动水槽构成，通过水压连结的两根铁柱支撑着水槽的升降。当红灯熄灭，船只进入其中一个水槽，就直接利用机械装置把船连同水槽降低到相应高度，而另一个水槽则会在重量的制衡下抬升。1888年，第一座15.4米高的船舶升降机出现在连接默兹河与斯海尔德河的中央运河上。29年后，其他三座各提升16.93米的升降机也终于投入运行。

拉卢维耶尔中央运河上的四座船舶升降机，是19世纪欧洲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它们与周边设施一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责任编辑/余荣培 文字编辑/郭婷 版式设计/杨东海



比利时中央运河上的四座船舶升降机（见图1）于2002年起陆续退出服役，接受修复。图2是船舶升降机的关键设备——铁柱。



动物博物馆里的皇家皮草

■ 撰文/岳飏　摄影/买国庆、余荣培



世事总是携带着某些偶然的机缘。若不是那日午后，去国家动物博物馆拜访买国庆老师，我或许会与这桩“异事”擦肩而过。

“异事”的原委很简单：买老师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首席摄影师，在给琳琅满目的动物标本拍摄照片时，他发现了几件“不同寻常”的物件——它们是十多件不同动物的皮毛，其标签上赫然写着“故宫博物院送”，且一部分衬有皇家独有的明黄色里子，头部或还悬挂有精致的红色、黄色的小型中国结。在以当代标本为主要展品的动物博物馆内，它们很特别。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原本是什么用途？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

一连串的问题，令同样困惑的买老师，当即决定领我去标本馆，一来亲眼看看原物，二来想要找寻答案。

推开标本馆皮毛室的大门，扑面而来的不仅有浓重的药水味道，更有强大的视觉震撼。十几个一人多高的架子上，整齐地挂满了各式

■ 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琳琅满目的标本里，这一排皮草可能并不显眼，但却是独一无二的。几十年前，它们从皇宫辗转至此，负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左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标本架。上图为狐狸皮的尾部镶上的明黄色里子，这正是其皇家身份的明证。



皮毛内侧的红色印章痕



上图为故宫转至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白色狐狸皮，与左页图中挂有明黄色里子的皮毛不一样，它很有可能是清宫剩余的衣料，其尾部还写有黑色墨迹，并印有红章，可惜这些都随时间的流逝而漫灭了。

色彩斑斓的动物皮毛。尽管如此，扎眼的明黄色里子，还是让我们一下子便找到了它们。走近，再走近，眼前便是百余年前的皇家用品，在离它们仅一步之遥时，我陡然萌生出一股敬畏之情，甚至都不敢去触碰。同行的朋友告诉我，那是一种柔中带刚的触感，穿越百年，仍富有弹性。

可惜的是，标本馆的略微泛黄的记录本上，蓝黑色的墨迹只记录了中英文的名称，诸如：狐狸、貉、猞猁等，并在其后标注来自故宫，其余再无多字，以至连送来的年代都是个谜团。无奈之下，我只得另寻他途，继续追寻。

我想到了这些皮毛的"娘家"，便找到了故宫宫廷部织绣组的房宏俊老师。由于年代久远，房老师对那段往事也只略知一二。他说，大约是在建国初期，故宫传世的皮毛等文物数量巨大，因保管条件有限，许多都长霉生虫，只能适当地隔离处理一些，并将一部分品相稍好的送至更专业、条件更好的地方保管。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清代皇家皮草才来到了国家动物博物馆。

事实上，统治清朝的满族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因其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宫廷的皮草用度相当大。无论是日用、赏赐还是贸易等等，都十分依赖皮草。这仅从清朝的"贡貂制度"，便能管中窥豹。根据清政府的规定，凡是被编户的赫哲人，每户每年都必须向清政府贡纳一张体大、毛厚、色匀的优质貂皮（以黑色貂皮为上品），此即"贡貂制度"。由是，大量的貂皮等兽皮被进贡到清宫，用来给皇族制作衣服，或者仅为装饰所用。这也能在如今故宫旧藏中得到印证，既有虎皮、豹皮、金丝猴皮等稀有皮草，还有天马皮、海龙皮等写在档案或标签上，却不知为何物的皮草名称。有趣的皮草名称，令我大开眼界，据房老师说，也有已经解决的难题，比如堪达憨皮，堪达憨是满文麋鹿的发音，因而所指即麋鹿皮。

再回到藏于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皮草上来。看到我发去的照片，房老师告诉我，尽管十几张皮子看起来都很相似，却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没有挂上明黄色里子的皮毛，很可能是没有用完的衣料，它们往往会被裁剪、拼贴成不同款式的衣服。当然，制作过程是相当麻烦的，首先要画出版式，裁剪后将其缝制在一起，毛与毛之间并不贴服，也需要有足够的技巧来进行处理。有技巧高超者，还能将不同皮毛按照纹样来进行拼接，在清宫遗留的服饰上就有清晰的用皮毛制成的寿字纹、喜字纹、方块型纹等等。而那些已经挂上明黄色里子，并带有中国结的皮草，则因其浓郁的装饰风格，而被房老师推测为饰物。这些饰物有可能被搭在椅、床榻等家具上，曾为皇宫内的贵族依靠或把玩。也有可能仅是挂在屋内的某处，供



■ 此页的两件衣服(供图/故宫博物院),均是清宫用皮毛制成。用作衣料时,皮毛都会被裁剪后,再进行拼接。况且,皮毛并不服帖,既需要顾及毛的方向一致,还要考虑拼接后皮毛的颜色协调,故做工繁复。如图中明黄暗团龙里双喜皮马褂,全身有46个用皮毛拼接的双喜字,为三种皮毛拼接而成,很是精致。

来来往往的人们欣赏。再猜测得更大胆一些，会不会是北方特有的、用来保暖的袖筒或者套裤呢？

房老师还谈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即故宫对于皮草的保管方法，几乎都是遵循古法——压箱子底。清宫传世有一种非常大的木箱子，里面镶了厚厚的铅皮，密封性很好，如果将皮草放在箱子最深处，便能使其尽量不和空气接触，减少它本身被氧化及损坏的过程。

至此，我心中的疑惑逐一解决，惟有一事无法释然——如今，这十多件皇家珍品，安然无恙，但是，若非偶然，却也无人问津。

责任编辑／戴莹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杨东海



乾隆的两只熊

■ 撰文、摄影／许天笑

“你知道雍和宫里有两只熊吗？听说那是一对母子，为了表示忏悔，猎杀了它们的乾隆将之列入庙堂。”我问了许多去过雍和宫的朋友，然而他们都不记得在里面见过熊。也是，去雍和宫的人，谁会期望在里面看到熊呢？

但它们确实出现在皇家祭祀的场合、与神灵并列。

为了印证对于熊的记忆，我再次进到雍和宫。随着参观的人群由南向北穿过两进殿堂，拐进陈列密宗佛像的东配殿，我再次见到了它们——被分列在殿门南北的两只漆木雕塑熊。不过早先它们是由两张真熊皮做成的熊标本，只因年久腐烂，至少在1979年的时候，这里的熊已经替换为现在的漆木制品了。

殿里的僧人告诉我，它们虽然是现代的漆木雕塑，却与乾隆大有关系。传说乾隆在吉林打猎时猎杀了两只巨熊，一只有1000斤重、一只重800斤。乾隆以此为功绩，将之做成标本，陈列到皇家寺院雍和宫中作为对武力的崇拜，也希望武力之神可以常伴自己。至于熊母子及忏悔之说，几位僧人异口同声表示：没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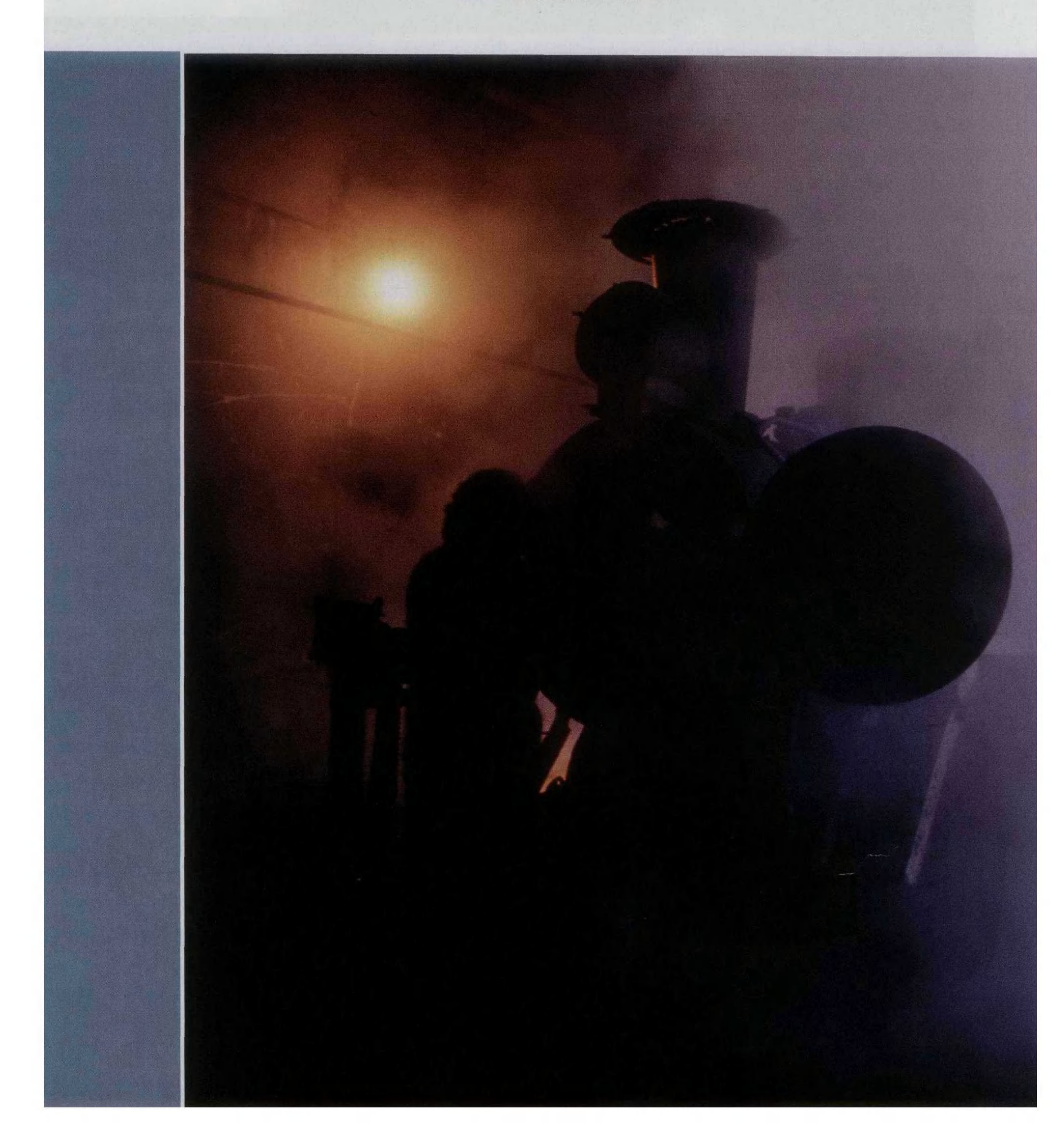
乾隆在位时，曾4次东巡盛京（今辽宁沈阳），其中乾隆八年（1743年）的东巡途中，他经蒙古地区绕道吉林；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东巡又在吉林行围狩猎，停留较久。两只熊必是其中某次（很可能是1754年的这次）狩猎的收获。除狩猎之外，乾隆一生南征北讨，成就了引以为荣的“十全武功”，并由此自称“十全老人”。都说乾隆崇拜武力、擅于标榜自己，果然如此。你看，他连自己猎杀的熊都不放过。

■ 雍和宫的东配殿，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很可能在其落成仅10年的时候，那两只被猎杀的熊就被供奉在了现在这两只木雕熊所在的位置。东配殿中还供奉着5座密宗佛像，右图中红衣游客正在跪拜的为永保护法像（又称大黑天），据说大黑天为战神，礼祀此神可增威德，举事能胜。这也许可以解释两只熊被供奉在这里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张婷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杨东海

蒸汽机车
远去的记忆

■ 口述、摄影／黄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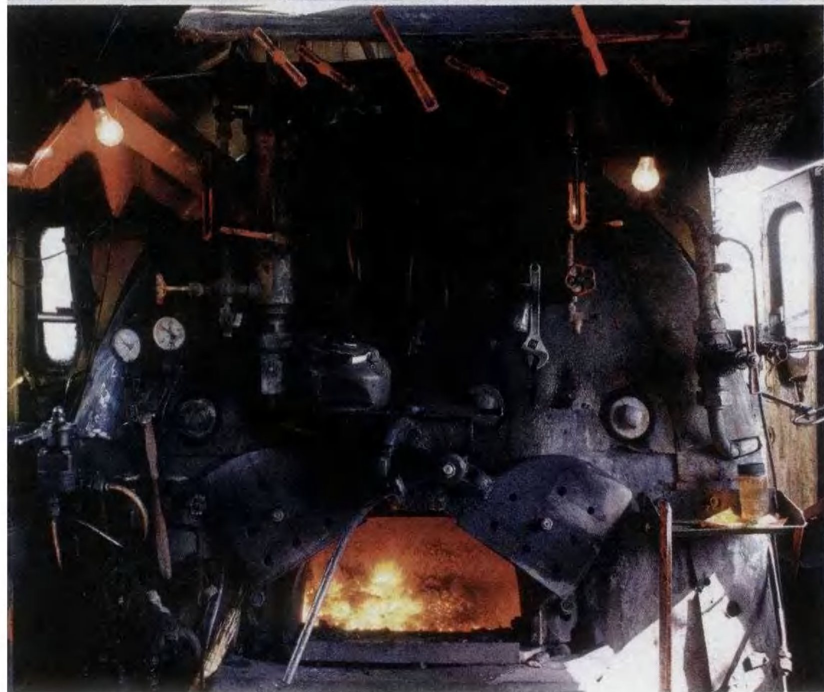


编者按：

从1881年开平胥各庄机修厂用煤矿起重机的锅炉和旧钢材，装配出第一台简易蒸汽机车，到2005年12月内蒙古集通铁路最后一批蒸汽机车下线，124年间，中国人关于铁路的记忆，大多离不开火车远去时漫天弥散的浓雾。多年来专注于拍摄蒸汽机车的摄影家黄庆军先生也是如此。这一组图片，讲述了他和蒸汽机车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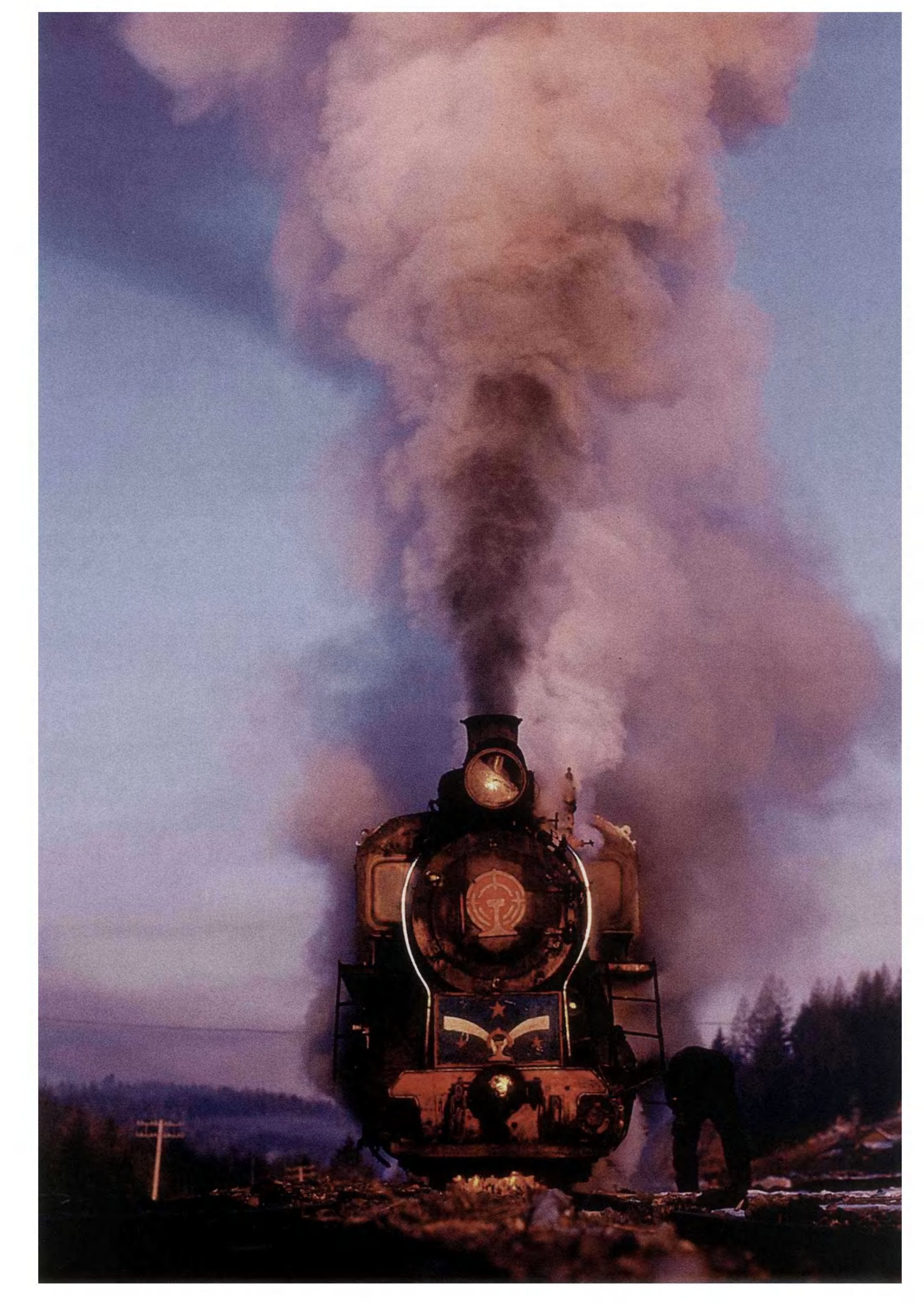


1998年元月，我第一次坐上从黑龙江苇河林场到柳山的蒸汽小火车，它的车厢比内燃机车厢小一半左右，没有电，夜间乘车的旅客就靠蜡烛照明。虽然少了广播中甜美的问候和曼妙的音乐，工人沉沉的鼾声和年轻母亲轻声哼唱着的催眠小曲，却让回忆更感亲切。蒸汽小火车是林区居民与外界沟通的惟一交通工具，我数了数车窗外一晃而过的电线杆，再看了下手表，粗略算出小火车的时速应该在10-15公里之间。2001年，为了用镜头记录下那种缓慢的生活，我再次来到苇河林场，却得知蒸汽机车正在接受定期检查，于是，我才有机会见到这因机车喷气而浓雾萦绕的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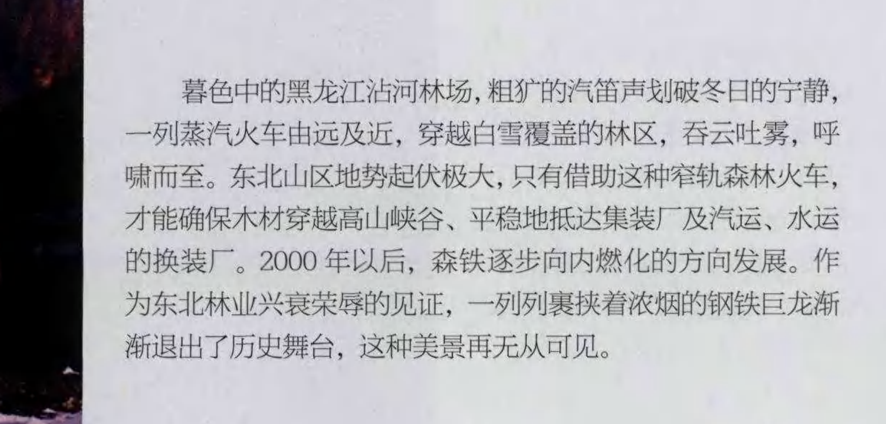


与内燃机车不同的是，蒸汽火车有一个司炉间（见左图），火车在正常行驶时，除了司机和副司机外，另有一个负责给机车添煤的司炉工。1997年，我在黑龙江沾河林场的蒸汽火车上，遇到了这两位正在休息的司机师傅。为了省钱，他们每天从家里带来饭菜，跑完一天的车程，偶尔也会喝些酒解乏。像他们这样驾驭吞云吐雾的蒸汽火车，是一份相当辛苦的工作，却也是那个年代很多在林场长大的孩子梦寐以求的理想。拍摄期间，我见到了很多在小火车上工作的工人，他们脸上沾满了煤灰，但笑容里却透着对生活的喜悦和满足。


31



我扛起摄影包，开始了从一个林场到另一个林场，从一列火车到另一列火车的苦苦追寻。在长焦、广角、鱼眼的各种镜头中，我又看到了那只有一位工作人员的小站；又看到了那提着鸡鸭、背着儿女去看丈夫的大嫂；又看到了那一车车满载的圆木和石油；又看到了那些兴高采烈地跟在森林小火车后面奔跑的天真的孩子……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比不上我在迷漫的蒸汽中，看到的蒸汽火车头那昂然的剪影，还有它绝尘而去时留在身后那冲天的浓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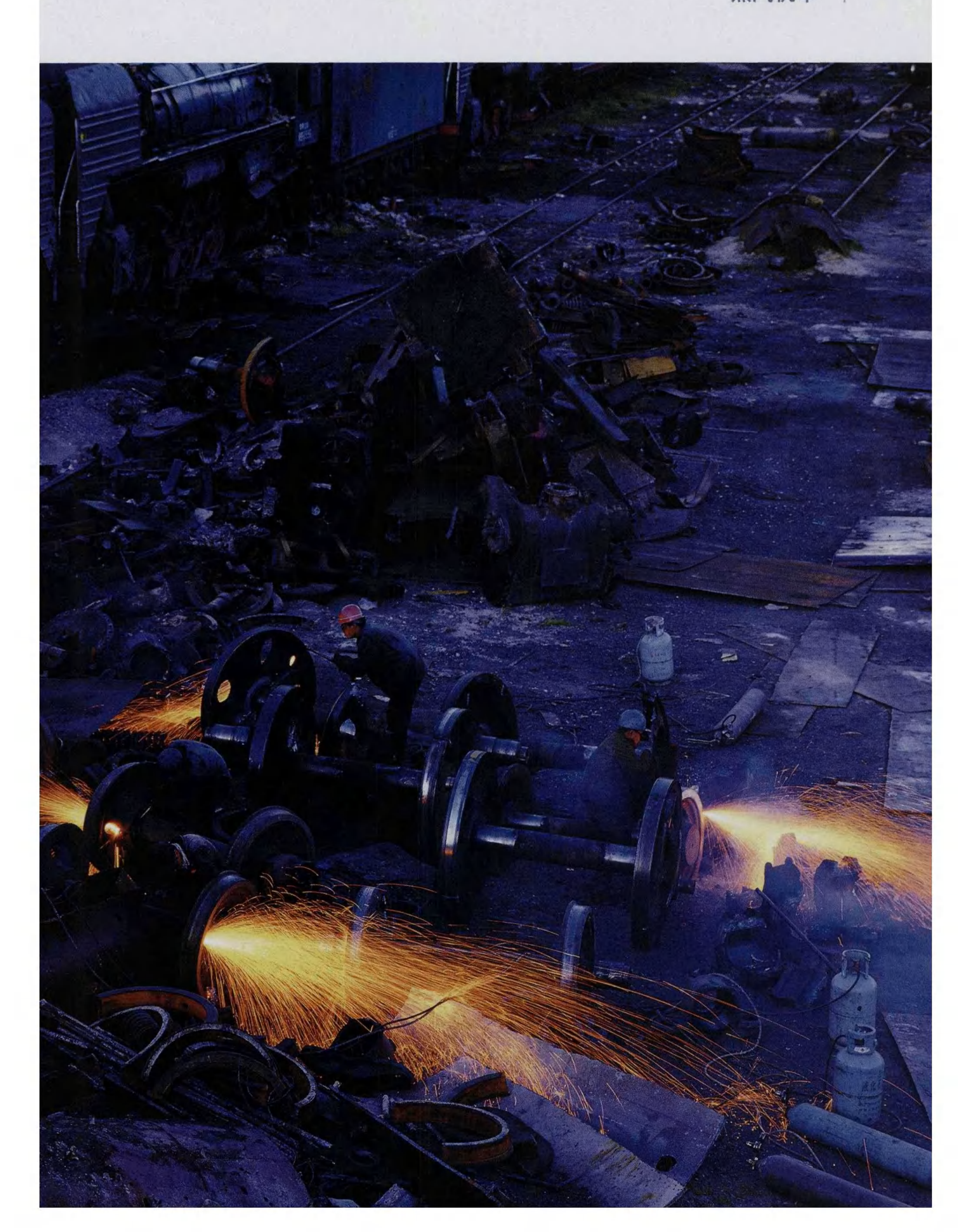


暮色中的黑龙江沾河林场，粗犷的汽笛声划破冬日的宁静，一列蒸汽火车由远及近，穿越白雪覆盖的林区，吞云吐雾，呼啸而至。东北山区地势起伏极大，只有借助这种窄轨森林火车，才能确保木材穿越高山峡谷、平稳地抵达集装厂及汽运、水运的换装厂。2000年以后，森铁逐步向内燃化的方向发展。作为东北林业兴衰荣辱的见证，一列列裹挟着浓烟的钢铁巨龙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美景再无从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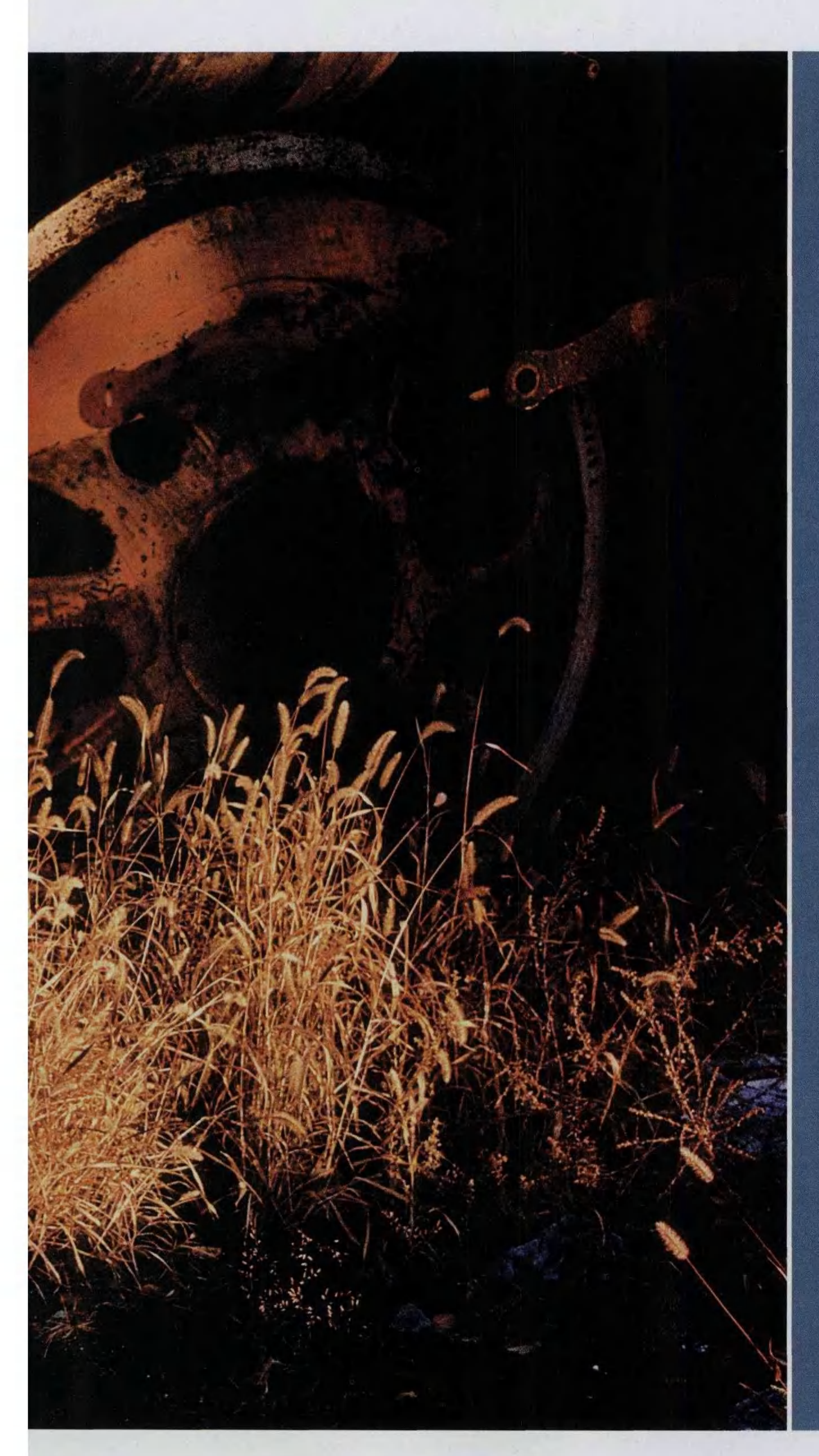
> 第一次见到那喷烟冒火的庞然大物，吓得七岁的我一下子钻进妈妈的怀里。妈妈告诉我，**那是“毛泽东号”蒸汽机车，可以带我们去姥姥家，去看外面的世界**。我顿时忘记了害怕，不由对这黝黑的铁家伙肃然起敬。



退役的蒸汽机车是怎么处理的？2005年7月，我在内蒙古大板机务段找到了答案。拆了车头，卸下车轮，再把肢解下来的钢板、铁皮以废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一辆重达28吨的蒸汽机车大约只能卖3万块钱。负责拆卸的人来自河北，据说他们还曾以相似的办法拆解过某地报废的坦克。面对如此庞大的机车“肢解”工地，我的内心只有失落。难道这就是蒸汽机车最终的结局？东西没了，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又能留存多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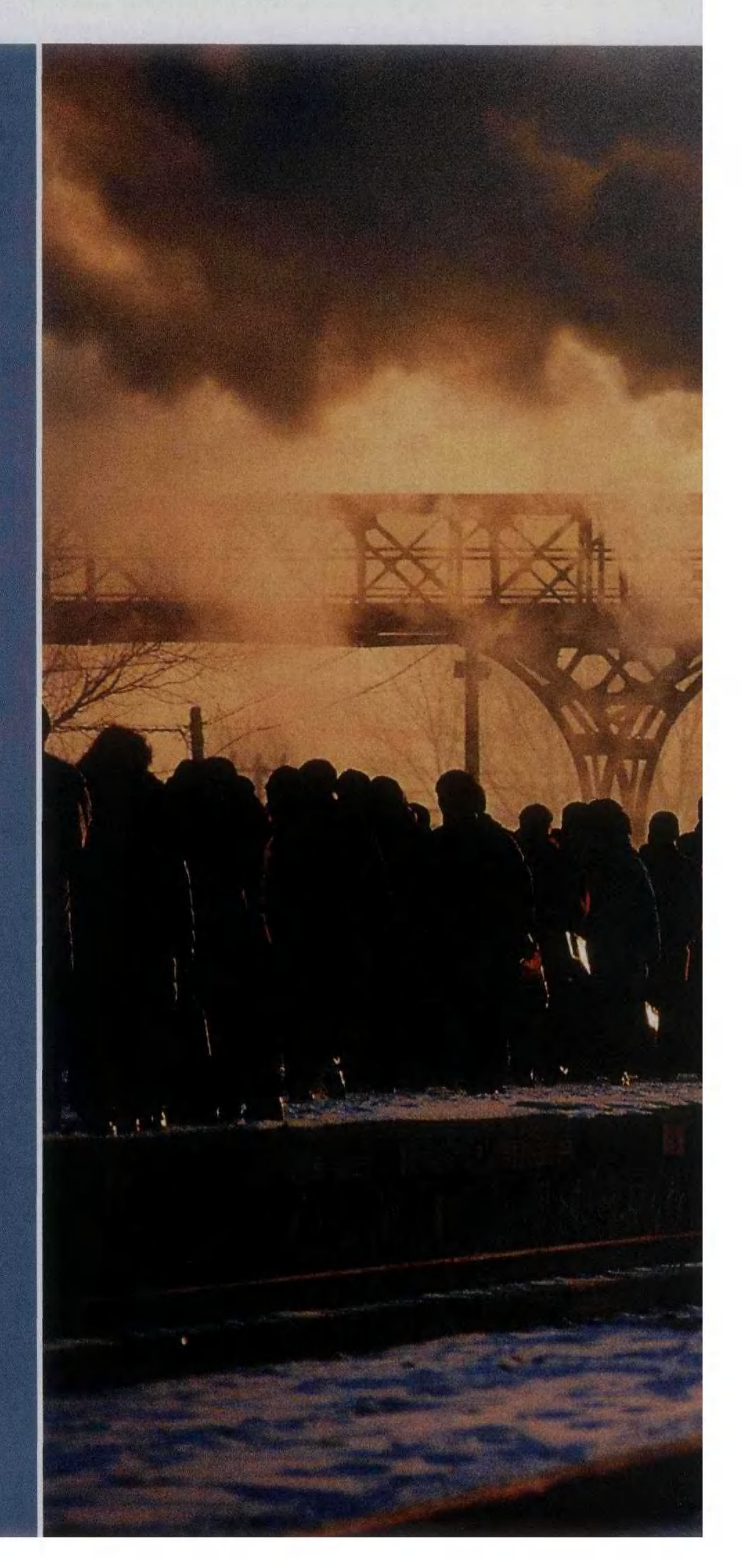
2001年，吉林大安北车站，一辆蒸汽机车静静地躺在露天车库里，四周杂草丛生。除了匆匆走过的铁路职工，这里只有火车迷偶尔会来造访。与那些被肢解的机车相比，它的处境似乎好很多。曾经有一个50人的德国访问团专程赶来吉林，仅仅是为了参观这台被遗弃在角落里的“宝贝”，这份狂热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不解。在西方人眼中，蒸汽机车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因而理应被归入工业遗产得到保护。而专注于速度的我们，却在不经意间忘记了，这曾经是承载着无数人梦想的时代宠儿，它的美不该仅仅停留在童年的记忆里。

责任编辑/郭婷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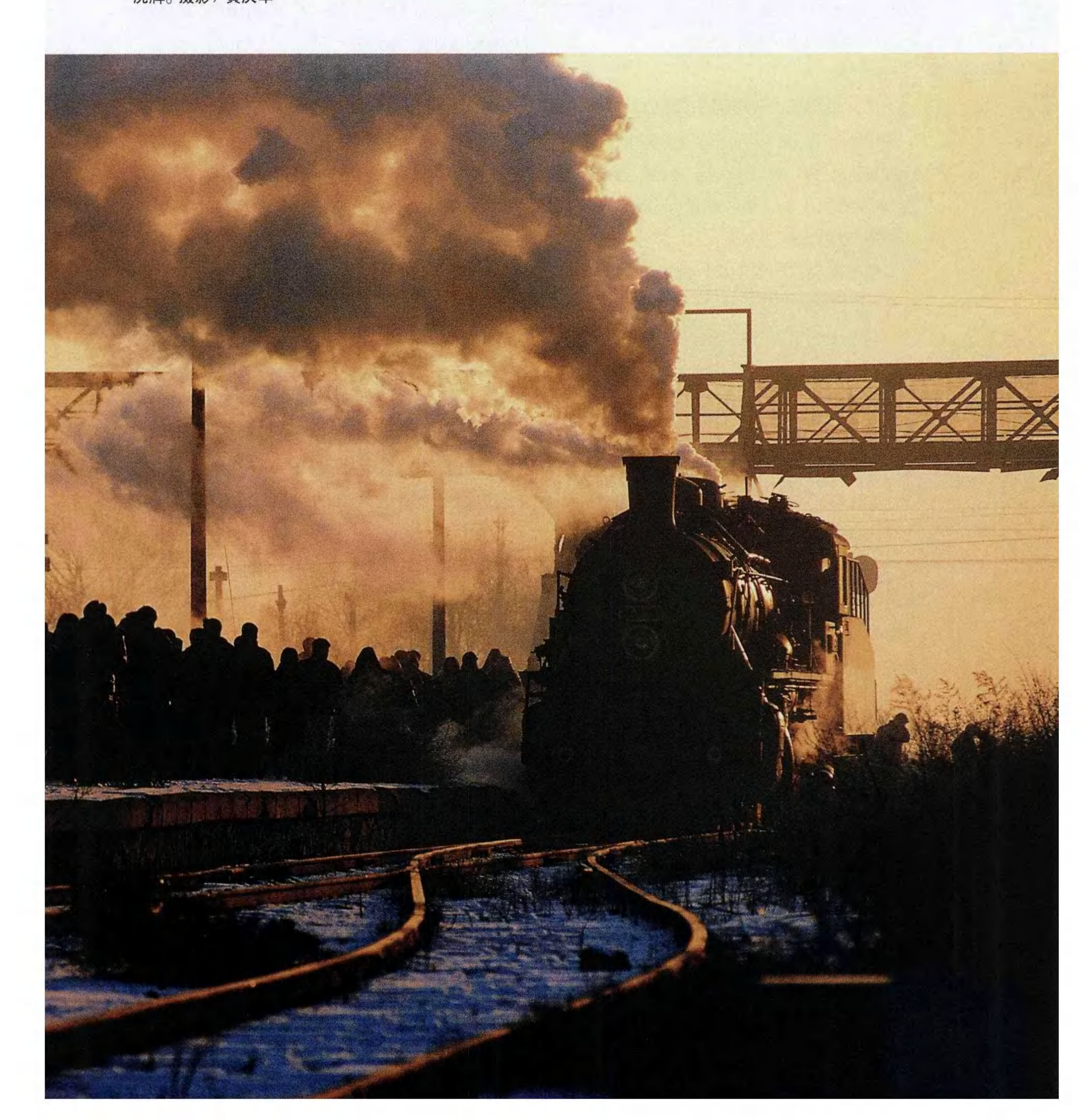
铁路来了
重构一个经济棋局

■ 撰文/张兴军 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铁路来了，中国怎么样了？一百多年前，大清的臣民遭遇这个问题时，莫不是先杞人忧天，后逐步接受。然而，不论是惊慌还是接受，能说服他们的理由却只有一个——国防，这是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最急切的需求。而今，当历史学者江沛再读这段历史时，他发现因国防而构架的铁路网，远离了古老的经济重镇，开辟了一片新的疆场。于是，古镇衰落了，交通枢纽城市兴起了，港口城市也兴起了，经济重心逐步东移——中国的经济格局由此而定。



■ 火车来了，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往前簇拥。这如今司空见惯的场景，出现在中国，却并非易事，其背后承载了近代仁人志士强国富民的期望，也承载了众多城镇的兴衰——火车来了，对中国而言，更是一次经济格局的大洗牌。摄影／黄庆军



从2005年开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副院长江沛和他指导的博士生，沿着华北的重要铁路线，北上、南下、东进、西出，京广、京沪、陇海、胶济……逐条调查。江沛的梦想，是要弄清楚各线路的历史，进而理解整个近代中国的铁路史。

6月的一个下午，北京的一个茶室里，江沛教授告诉我们6年来的研究成果——当铁路来了时，近代中国有什么样的变化?

国防：铁路的生死判官

1880年前后，大清王朝的高官们围绕修筑铁路的利弊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双方是以李鸿章、刘铭传为代表的修路派和以张家骧、周德润、刘锡鸿等为代表的反对派。

激辩的焦点，集中在铁路的利弊上。为了从根本上打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疑惧，直隶总督李鸿章细述了修建铁路的九大利者，强调修建铁路“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转运”，一旦有战事，只要毁其部分，铁路便不会资敌，扣留火车，则全路全废。

1880年底，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呈递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中，也明确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然需要,但关键在于修造铁路。他还建议借用外资，先修清江浦（位于江苏淮安府，为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路，以利漕运。这个奏折也是清廷内部第一个正式提出的具体线路构想。

反对派则对症下药，提出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和“有害者九”，认为当时修建铁路不合时宜，不但体制不济，也会导致民困国乏，财政短缺，天险顿无，洋货纷入，民生不计等惨境。正是这“天险顿无”四字，让慈禧与光绪打了退堂鼓，这场辩论的结果也以反对派的暂时胜利而告终。

“这段史实很有深意。”江沛说。在当时经济民族主义、捍卫主权及国家政治控制的压力下，争论双方的观点及立论依据，都过分强调铁路的行政控制与军事价值，而有意无意地忽视铁路的巨大经济价值。在那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政权的稳定才是压倒一切的选择。也正是出于国防上的考量，清廷最终选择了暂时罢修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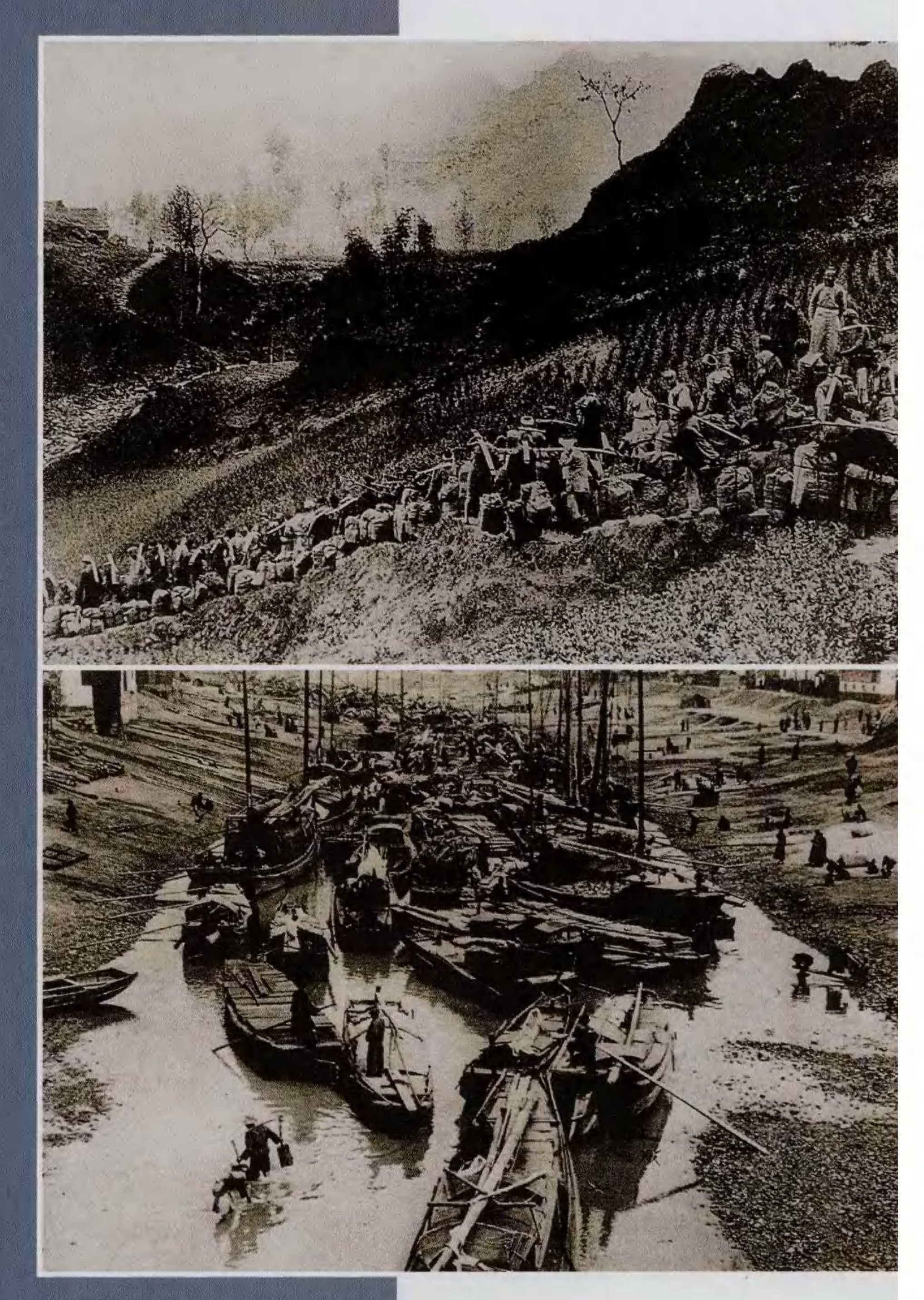
不过，这一论战的过程，实际上也算是为此后大规模修筑铁路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自此,民间舆论与有识之士纷纷建言修筑铁路,铁路于国防、经济利大于弊的认识也逐渐明确。

其实，早在这场辩论发生前8年，洋务派的领袖之一李鸿章就曾敏锐地论及在西北开设铁路的设想：“俄人坚据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既无战守之方。”那时,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西北正是英俄等国觊觎的目标。此时铁路之直接需要，国防较经济更重。

在清廷重臣间那场激烈辩论的一年后，伴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清朝修建铁路的政策开始松动。1881年，在李鸿章的推动下，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的修建提上了日程。“中华铁路，师夷之技，源唐胥始，于龙号起，几多艰难，历经风雨。”这是镌刻在唐山机务段火车头纪念碑上的一行文字，这条曾经只有9.7公里长的唐胥铁路，被称为龙脉之源。1881年11月8日唐胥铁路的正式通车，开启了中国自主修筑铁路的先河。回顾历史，从最初反对修建唐胥铁路，到勉强修建，贯穿其中的重要原因皆含对国防与军事的考虑。

晚年执着于修建铁路的李鸿章，此时也未放过大好机会。在唐胥铁路建成5年后，他“以铁路有裨军事，奏请将铁路事务划归总理海军衙门管理”。原来，之前清政府并无专管铁路的机关，将铁路划归海军衙门后，掌握实权的李鸿章自然能借此实现自己的理想。此后，直到1898年矿务铁路总局成立，铁路都在海军衙门的管辖之下。

1886年年底，李鸿章又有了新的动作。他给醇亲王奕譞写信，想要从大沽修铁路到天津紫竹林，主要是因为自大沽、北塘以北五百余里之间防务太少，如果没有铁路，炮车行进太慢，一旦



□在未有铁路之前，以骡马驴车等为主要运输工具的陆路交通（右上图），与以船只为载体的水运（右下图），是中国最为传统的两种运输方式。而在铁路进驻中国之后，新的运输方式以在当时无与伦比的载货量、速度以及低成本，击败了延续千年的传统，继而逐步改变了中国。

“晚清关于铁路的论战，为此后大规模修筑铁路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自此，铁路于国防、经济利大于弊的认识也逐渐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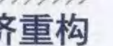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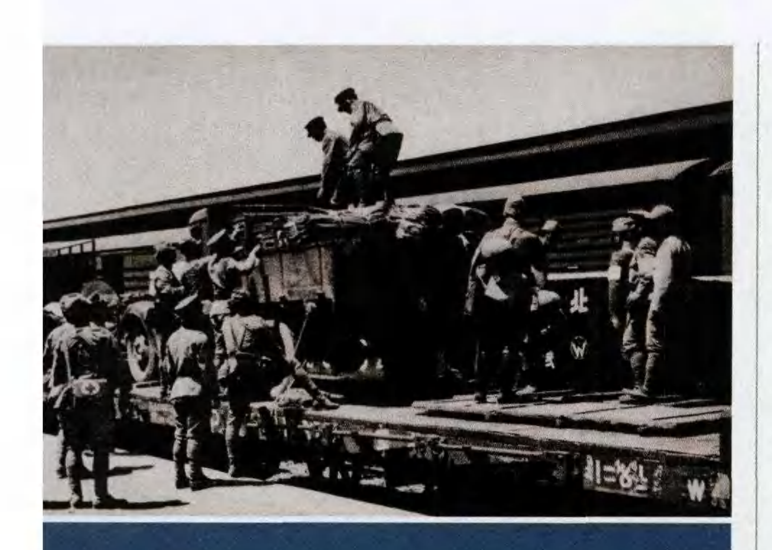
有紧急情况，则无法接济。第二年，李鸿章便主持修建了南接大沽北岸、北接山海关的“唐芦铁路”，落成之后，他甚至有些得意地说：“在此数十里间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

1890年，李鸿章又与海军衙门会奏，称俄国情势紧急，需要修关东铁路。李鸿章忧心的紧急情况，在当时出使美国、西班牙及秘鲁的大臣崔国因日记中能找到印证：“俄人日夜经营，于中国毗连地方兴造铁路，旁观者皆已为中国忧。”一年后，朝廷准了李鸿章的奏折，并派他督办。这条铁路分为关内与关外两段，关内段从津沽铁路上的林西镇出发，展修至山海关（又称榆关）为止，1894年春通车，为津榆铁路。关外段，拟从山海关至锦州，再经广宁、新民屯、沈阳以达吉林，再由沈阳筑支线以至牛庄、营口。1894年夏，这条铁路已修至中后所，因甲午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工，全长192公里。

尚未修完的关东铁路，在1894年开始的“甲午战争”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尽管战争以惨败而告终。据史料记载，当日军深入辽东境内之后，慈禧太后曾询问李鸿章：“修了铁路（指关东铁路），是否反而帮助了敌人？”李鸿章答曰：日军虽有海上运输，但缓不济急，而我军因有铁路运输朝发夕至，在后援方面要便捷得多。正因如此，清廷中还有不少人士认为中国铁路太少，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如张之洞就说：“使铁路早成，何至如此！”修建铁路之必要，已属“昭然共见”。

或许是这次重创的教训，清政府开始重视修建铁路。1895年，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





铁路对国防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我国国防助一臂之力，也能为敌军所用。左图为1905年京张铁路竣工典礼的现场，这条线路加强了我国与外蒙古的联系。但在日本侵略华北的战争中，日军也曾利用铁路调兵遣将、运输物资（上图）。不过，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不认为这是个难题，因为铁路于我方利多，万一敌军来犯，可拆去铁轨或者毁掉火车头以制止。

去，朝廷便奏准了李鸿章修建从天津至卢沟桥的津芦铁路，216 里的铁路只 2 年即通车，其修建速度之快超过了战前同样情况的任何线路，也可见清政府以铁路固国防之急切。据统计，1896 ~ 1903 年，中国共建铁路 4038 公里，其中 32% 由清政府借款自营。

几乎同时开始修建的，还有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手筹划并督办的卢汉（以后有京汉、平汉之称）铁路。张之洞认为："此路南北东西皆处适中，便于通引分布，实为诸路纲领"。如此，既可以通过"根本之地"的直隶，通达"天下之腹"的豫鄂，三晋、关陇，使之得以联系，"西北声息刻期可通"。显然，这一认识既有商业经济上的考虑，也有行政控制、军事便利的成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1905 年京张铁路的修筑，它无疑是中国近代铁路修筑史中一次漂亮的战役。

张家口在居庸关外，地当京师（北京）西北，自古在军事上和商业上均是中国北疆的重镇。清政府决定自修京张铁路，一方面，基于加强与（外）蒙古联系的政治上考虑，另一方面鉴于北京、张家口之间贸易发展的需要。

消息一出，英国和俄国立刻争得不可开交，最后经过中、英、俄商议之后决定，除非中国人自修京张铁路，否则不予同意。这个协议，其实正是英俄的如意算盘，要看中国人的笑话，他们认定中国人没有能力自修京张铁路，最后肯定还得回来乞求他们帮助。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一切建造及管理完全由中国人掌握的京张铁路，从 1905 年 10 月 2 日动工始，历时四年全线通车，实现了与已有的京奉铁路（京师至奉天，今北京至沈阳）的接轨。

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形成的铁路网，呈现出一种"南少北多"的特点，铁路线多分布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方水路交通发达，对铁路的依赖较小。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东北、华北的战事吃紧，国防需求更为迫切。

事实上，除了国防，清政府的铁路规划，还有另一层考虑，即"拱卫京师"。中国最早的铁路规划者薛福成和李鸿章都认为："京师为天下根本，独居中国之北，与腹地相隔辽远，控制甚难，缓急莫助"，如果修建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则"万里之遥如在户庭，百万之众刻期征调，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以下一组数据，能说明清政府正是如此身体力行：至 1911 年，清政府共修国有铁路 4200 公里左右，其中直通北京的 3500 公里左右，占 83.8%。这些从北京延伸出去的触角，能将全国大部分地区牢牢地握在手中。

内外合力下的铁路网

近代中国铁路时代的开始，还有着一个鲜明的印记——内外合力。"内"指的是清政府，"外"

毫无疑问，指的是当年在华的西方势力，这两股力量的交锋和拉锯，对中国铁路的格局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基于对廉价矿业资源、农产品外资的需求和工业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需要，外资利用其政治强势及清廷资金、技术的匮乏，纷纷参与诸条铁路的建设与管理，使得本来作为经济推动力的铁路运输体系，被涂上了一层西方殖民色彩，也直接影响到铁路技术的引进速度及铺设取向。上海的吴淞铁路，即开了此种情形的先河。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怡和洋行以修筑马路为名，偷造了一条从上海天妃宫起至黄浦江入海口吴淞的铁路（全长 14.5 公里）。1876 年，吴淞铁路正式通车，面对新事物，铁轨两旁观众“立如堵墙”，争相睹之。然而好景不长，顶着“中国第一条铁路”名号的吴淞铁路，仅仅一个月就寿终正寝。原因是列车碾死了一名士兵，遂被沿途居民阻止继续行进。本就茫然的清政府为了维护主权，由上海当局出面，照会铁路停止运行，最后经清政府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议定用白银二十八万五千两买回，被拆下的钢轨和机车车辆，在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下，由刘铭传运往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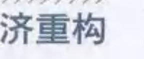
上图为20世纪初刊登在报刊上的漫画，象征日本、俄国等国的人物形象，纷纷高举火车车厢，趾高气昂地走在弱小的清朝官员身后。作者藉此讽刺列强瓜分中国铁路权益。基于此，中国铁路格局有了个鲜明的印记：内外合力而成。右图为1909年中东铁路列车上的内景，浓郁的异国风情正是此印记的明证。

尽管清政府基于经济、政治的多重考虑极为重视铁路权益，也通过对外借款、筹款等方式自主修筑铁路，但无奈国力日衰，无力扭转，相当部分的铁路修筑权及其运营管理权旁落他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与沙俄签订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使俄国获得修筑东清铁路的特权。1898 年 8 月，东清铁路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北部干线（满洲里到绥芬河）、南满支线（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约 2500 多公里，形成了“T”字形的布局，辐射了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1903 年 7 月，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并开始正式营业。日俄战争(1904 年)后，沙俄把南满铁路的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了日本。

相比之下，胶济铁路的修建则充斥着巧取豪夺的殖民背景。1897 年 11 月 1 日夜，十余人闯进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教堂神甫薛田资逃往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12 天后，德国军舰多艘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从此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这一事件被称为巨野教案。

实际上，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的设想早已有之，巨野教案给了德国人一个加速实现其目的的借口。《胶澳租界条约》刚刚签定完毕，德国 14 家大银行就立即组成一个“辛迪加”，成立了德华银行、山东铁道公司和矿务公司等机构，联合向胶济铁路及沿线矿业投资。德国政府还迅速发布《特许山东铁路公司建筑铁路及营业条款》16 条，要求五年内全部建成青岛至济南间的铁



路。从 1899 年至 1904 年间，一条贯通山东腹地的胶济铁路在省会济南与青岛之间完成，德国人紧盯的，便是这条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

不管修筑铁路的初衷是否与铁路的经济属性相符，也不管铁路修建是否为清政府的自主行为，中国铁路的原初框架在一波三折中得以成型。

在 1881 ~ 1911 年的 30 年里，中国铁路从无到有，完成了 9618.1 公里的建设里程（含国有及外资修建铁路），其中华北就占到 1/3。中国东部最重要的几条铁路。如南北向的京汉、北宁（京奉）、津浦路，东西向的京包（平绥）、胶济、道清、正太、汴洛（陇海）路等，都在境内或穿越华北，铁路建设成效显著。民国初期，华北铁路网络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延伸，构成了华北区域铁路网络的基本骨架，并使华北成为联结东北、华中、华东地区的节点。这个代表着中国近代化重要标志的铁路网络，直至新中国建立都未有太大的改变。

棋盘上的此消彼长

美国学者雷麦曾言："除铁路以外，就没有一种其他近代的经济设备，输入中国以后能够产生这样伟大的影响"。

江沛教授是这样来解读此话的："雷麦从宏观上看到了铁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近代中国的长远影响及重要价值，但清末铁路网络初成的进程中，政治与军事是与经济并列的重要因素，正是在多重因素的主导下，中国近代铁路开启了其革命性的影响。"

对"革命性的影响"，江沛的感触也很深，他说，在所接触的许多地方志、政府报告等材料中，

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记载：自铁路建成，“交通便利，商业地位益显重要”，又或者是：由于别处通了铁路，此地受影响便再“无昔日盛况”。因为国防而构建的铁路网，自然对原来的经济重镇会有所忽视，随之在中国版图上，诸多城市起起落落。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经济棋局，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来了一次大洗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河南开封。

历史上的开封，是一个政治与经济并重的都城，但在近代它陡然消沉——不再是省会，仅作为古都而闻名。翻阅资料后，江沛发现了一份可解释开封发展缓慢原因的资料：与平汉铁路有关。

最初，平汉铁路的设计是必经开封的，不仅因其为河南省会，也是中原地区的经济重镇。但在具体线路测量时，经比利时工程师严格测算后，这一方案被否定。原因在于历史上开封一带的黄河，曾几度决口，沙土淤塞严重，是著名的“悬河”，最为要命的是此处土质疏松，极为不利于要兴建的黄河铁桥的桥址。在张之洞的建议下，其西边的郑州历史性地进入了测量者的视野。

平汉铁路就这样绕过了开封，一座因黄河而兴的历史名城，最终因黄河而被弃。相反，郑州则得益于平汉铁路的改道，加之此后修建的陇海铁路，遂成枢纽之城——地理优势再加上交通的优势，其重要性在后来的几十年逐渐居上。

“因铁路而改变的，不仅是开封的经济地位，后来省会也迁到了郑州，古都开封就这样归于沉寂。”江沛说，话语中透着对古都开封的某种遗憾。同样感到遗憾的，还有开封本地的一些老学者和居民，说起开封的地位变迁，他们大抵都会生发“既生（开）封，何生郑（州）”的复杂心情。

旧城衰落，新城兴起，是伴随铁路脉络延伸的一出高潮迭起的大戏。在河南以北，是另一组城市的此起彼伏——山西的榆次、太谷及平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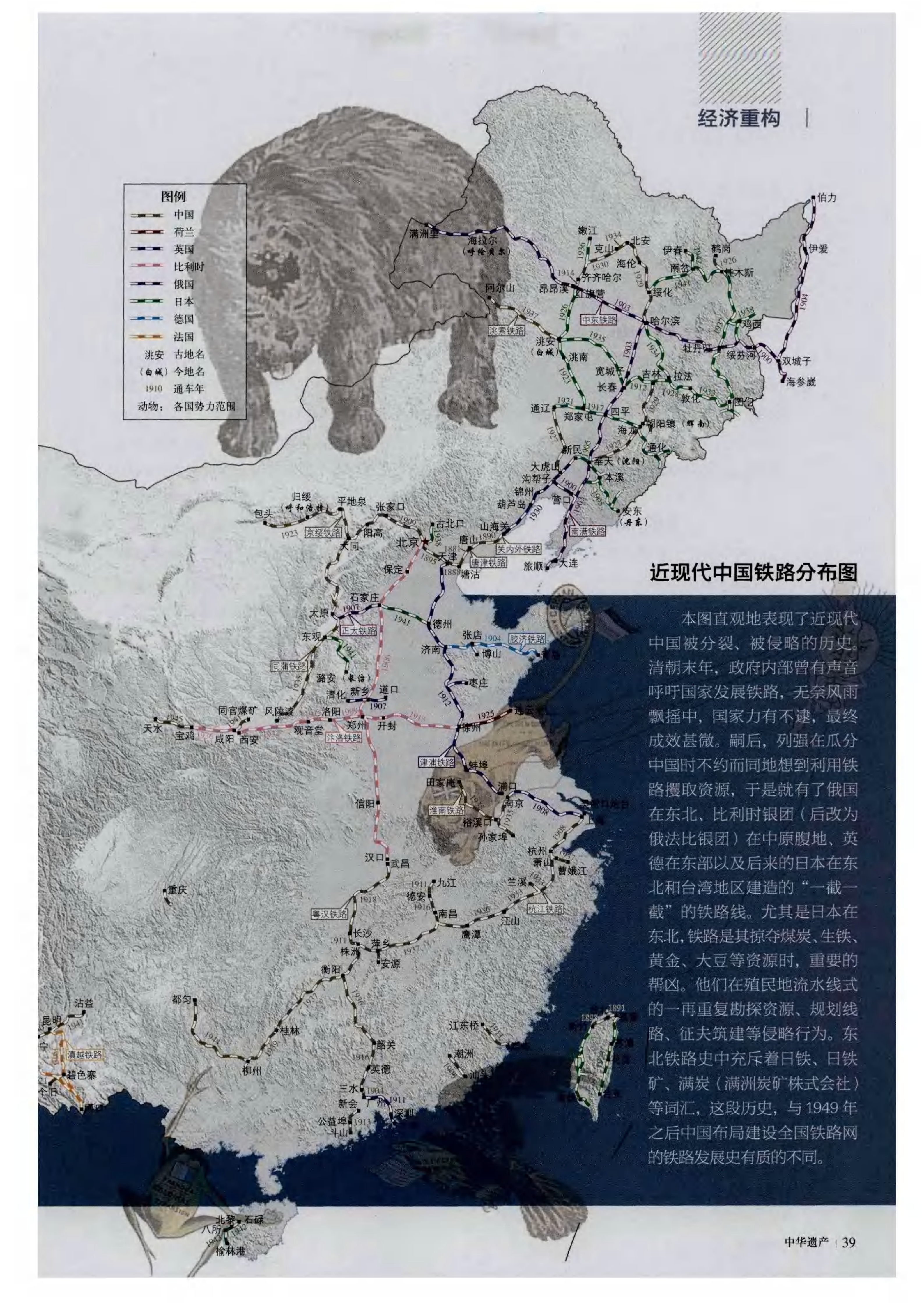
山西水系很少，陆路交通也欠发达，在未有铁路之前，主要以骡马驴车为主要的运输工具，依靠驿道与外界交流。尽管清末晋商已然衰败，但作为其庞大金融势力大本营的太谷、平遥等地，仍然是山西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比如太谷，是山西境内最大的粮食、布匹集散地，每年由天津、汉口运来的洋布，均在这里集散，再由商人运往晋中、晋南各地。而山西产的粮食及农产品，也同样经此运往省外市场。

1907 年，正（定）太（原）铁路通车后，一切都改变了。江沛教授提起了 1936 年《大公报》上署名为洪范的一篇文章：《中国各种运输方式运价之比较》，其中提到：核算起来，每公里每吨货物的成本，用大车畜拽的方式需要 14 分，用骆驼和骡马驮运需要 25 分，用人力背负需要 75 分，而用火车仅仅需要 8.68 分。如此划算的价格，再加上火车在当时无与伦比的载货量和速度，多数商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种运输方式。榆次，又因为处在正太铁路线的枢纽位置上，且与晋南、晋西更为接近，遂取代了平遥和太古，成为了山西省内最大的货物集散地。而平遥和太古，则沦为榆次的二级市场。

对比两组城市，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崛起的郑州、榆次都是铁路交通的枢纽。像这样的城市数量很多，比如河北石家庄、内蒙古的集宁、湖南株洲等等，因其受铁路的影响巨大，而被统称为“铁路拉来的城市”。而逐渐沉寂的开封、保定、平遥、太古，则只是铁路线中不起眼的点。它们地位消长的背后，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格局的变动，还有中国城市类型的变化。

学者林刚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城市的总体性质基本上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消费中心，往往是商业中心，却非生产中心。”但铁路来了以后，中国城市成为商业中心的必备条件之一，即必须同时是生产中心，需要有相关的产业与之配套。像开封，铁路不再青睐之后，只剩下政治中心的身份，而后随着经济每况愈下，最终连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丧失了。

也有部分城市比较幸运，即原本就是商业中心，在铁路来了之后，仍在铁轨上占据了显要位置的城市。江沛说，近代部分铁路的修筑，并



近现代中国铁路分布图

本图直观地表现了近现代中国被分裂、被侵略的历史。清朝末年，政府内部曾有声音呼吁国家发展铁路，无奈风雨飘摇中，国家力有不逮，最终成效甚微。嗣后，列强在瓜分中国时不约而同地想到利用铁路攫取资源，于是就有了俄国在东北、比利时银团（后改为俄法比银团）在中原腹地、英德在东部以及后来的日本在东北和台湾地区建造的“一截一截”的铁路线。尤其是日本在东北，铁路是其掠夺煤炭、生铁、黄金、大豆等资源时，重要的帮凶。他们在殖民地流水线式的一再重复勘探资源、规划线路、征夫筑建等侵略行为。东北铁路史中充斥着日铁、日铁矿、满炭（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等词汇，这段历史，与1949年之后中国布局建设全国铁路网的铁路发展史有质的不同。

非凭空而来，或者完全另起炉灶。比如，平汉路基本上是沿着以前以北京为中心的南向官道展开的，津浦路大致顺着大运河东岸铺设的，北宁路在照顾唐山煤业、天津港口的基础上也大致上是沿着出关官道而行的，正太路则是沿着由太原经娘子关出山西的必由之路而建的，胶济路以青岛为出发点，但过潍县则是沿着旧有的潍济商道而行的，京张路则在原有驿路及商路基础上修筑。这些道路的建设，基本上均联结各地省会及主要行政中心。铁路通车后，这些未被铁路遗弃的经济重镇，便能顺利完成城市转型。

东移的经济重心

在中国近代经济棋盘上，还有一类城市举足轻重，即港口城市。铁路于它们的发展，就像是推手一般。

比如山东青岛。青岛原本只是胶州湾口附近的一个小岛。1898年，中国划定了55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为德国胶澳租借地，次年，德国将租借地内的新市区定名为“青岛”。青岛的崛起，当然不仅仅因为铁路，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旨在建设“东方海军根据地及世界最大贸易场”，现代化的港口建设被放到了首位。为给青岛港航运提供足够的贸易腹地，德国当局决定建设胶济铁路，连接青岛与济南。

铁路开通以后,带动了港口与腹地之间的人流、货流剧增，青岛港的吞吐量也急剧增长。据统计，1905年客运量仅为1.0685万人，至1928年便增至48.9752万人;1899年货运量仅为36.9531万吨，1936年增至287.6131万吨。此外，1934～1937年间，青岛港外贸额已占全国主要港口外贸额的6%，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的全国第三大港口。

在与同样为近海港口烟台的对比中，或许我们更能看出来铁路在其中的作用。明初至晚清山东开埠前，山东的经济重心在鲁西运河流域，运输方式以内陆水运、驿运为主。1861年，烟台开埠后，由于在近海运输线中端的特殊位置，一跃成为山东半岛第一大港口。根据《胶澳志》记载，1901～1902年间，烟台港贸易额是四千五六百万海关两，是1864年贸易额的7倍多，可见其发展之迅猛。而这个数字,比同期的青岛港多三倍有余。此时，山东境内贸易网络及流向，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经济重心逐步东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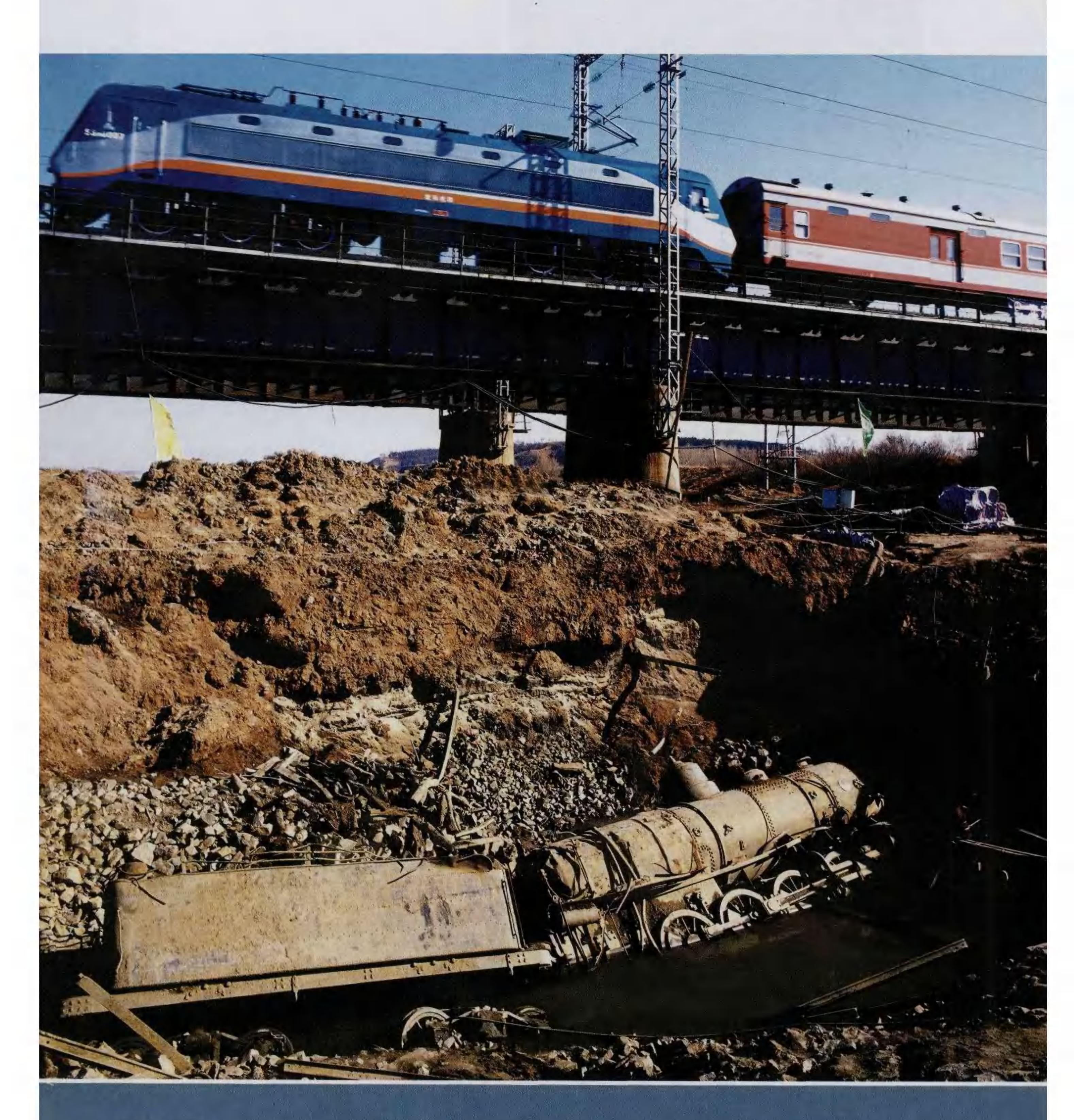
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青岛和烟台作为港口的地位，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仅在通车3年后，青岛直追烟台的贸易额。至1927年，青岛的贸易额已经是烟台港的44倍，而烟台港的贸易额数字自此到1920年代末始终徘徊不前。江沛分析，在当时汽车不发达，且以牲畜为主的公路运输和数量有限的近海帆船运输而言，铁路在价格、速度、数量、安全等方面，无疑都具有绝对的优势。青岛拥有现代化的港口，尤其还拥有贯通腹地并与津浦铁路相连的胶济铁路，令烟台相形见绌。更为重要的是，在青岛与烟台地位嬗变的过程中，山东半岛的经济重心加速东移，贸易网络格局彻底变革。

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而言，山东只是一个缩影。除山东青岛，还有大量港口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崛起，其快速发展，与铁路也不无关系。江沛说，随着近代对外贸易的逐步开放，中国经济重心东移已是必然趋势。而在此过程中，随之配套建立的铁路体系，更大大加速了东移的脚步。

采访结束后，一张近代铁路发展与经济格局变迁的动态地图，在我脑中不断闪现——最早在中国版图上铺就和延伸的，是出于国防修建的铁路，它们多数自北京向外辐射，相互间又有着关联。在主要铁路线上的沿线城市、铁路枢纽城市、港口城市随之成为一个个亮点，而另一批历史名城名镇，却因不在铁路重要位置上而黯淡了下去。变亮或是黯淡之中，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于此间悄然变化。

近代铁路如此，现代铁路的发展轨迹亦如此。

责任编辑 / 戴莹 图片编辑 / 余荣培 版式设计 / 刘扬



□ 2005年3月，一辆深埋地底的蒸汽机车头在哈长线沿线被发现，与其上飞驰的现代火车来了次穿越时空的对话。如今火车穿行的哈长线，是老蒸汽机车头所行驶的中东线的一段，自1903年由俄国修建通车后，即已连接了哈尔滨与长春，路线至今几乎未变。两座城市的命运由铁路改变，东北经济格局也由此而定，整个中国亦是如此。摄影／王福春



■ 飞速奔驰中的京沪高铁。摄影／罗春晓

你的家乡能停靠多少次列车?

编者按：

当中国迎来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时代，慢车，就成为被淘汰的首选对象。所谓“慢车”，是指中途停靠车站较多、全程行车时间较长的车，而并非仅仅因为速度特别慢。在西部一些地区，慢车尤其之多，经停的站点往往更多，甚至有些两站之间的距离，感觉比公交站的间距还要近。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对此恐怕难以想象和容忍。对他们而言，有铁路、公路、民航等各种交通方式可选择，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比如，京沪间已经通行了12对列车（含8对动车），若算及民航，则每天更有80多班航班可供选择。但是在西部，很多地区则尚未开通铁路，那里的人走到最近的火车小站可能需要步行半日或更久。因此时至今日，所谓的“慢车”仍是许多人出行的惟一选择。

但是经过6次列车大提速以及迎接高铁而做的列车运行站点的调整，许多地方连慢车都被取消。火车从家门口呼啸而过，也只能望而兴叹。有铁路，还要有车站，才有幸福。有人说，幸福的多少，要看可供你选择的机会有多少。对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而言，在每一个车站经停的列车数量的多少，决定了人们选择机会的多少。从一天2趟到最多的一天600多趟，这数字上的差异，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看一看，你的家乡、你所居住的城市，每天经停的列车有多少趟呢?

中国铁路客运站繁忙程度示意图

经停车次为15～49次的车站

据铁道部2008年统计，中国铁路车站共5470个，若将其平均列布，则每1755平方公里有一处车站。实际情况却是，站点高度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一地就有10几处车站，而西部地区则严重被冷落。铁路发展更加剧了这种分化，电气化线路、动车组、城际快车、高铁等资源继续向发达地区集中，西部很多人依然仅仅依靠一天一对的慢车出行。凸显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状更拉大了这种不平衡。



资料来源：铁道部运输局编《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2011.1（2011.2重印）

铁道部运输局、中国铁道出版社出品“极品时刻表”（2011.5.5版本）

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公布客运营业站站点

资料截止日期：2011年5月

图中数字均表示经停该站的旅客列车车次数



经停车次为50～99次的车站

客运站点分布的总规律是大、中型车站周围聚集起了中小型车站，遗憾的是，从本页这三张图可见，中国广大西部地区的站点基本上是缺席的。



经停车次为100～199次的车站

对普通旅客而言，图中车站的便利程度怎样？且看湖南郴州，停站车次179次，虽然乘火车从郴州至北京只有三趟直达车可以选择，但在郴州的经停车至广州有89个选择，至武昌22个，长沙67个，岳阳31个——这座京广线上的大站，是南方地区有一定规模的人流集散中心。若在郴州火车站去往周边省市，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走，出行的便利与周边经济的高速发展相辅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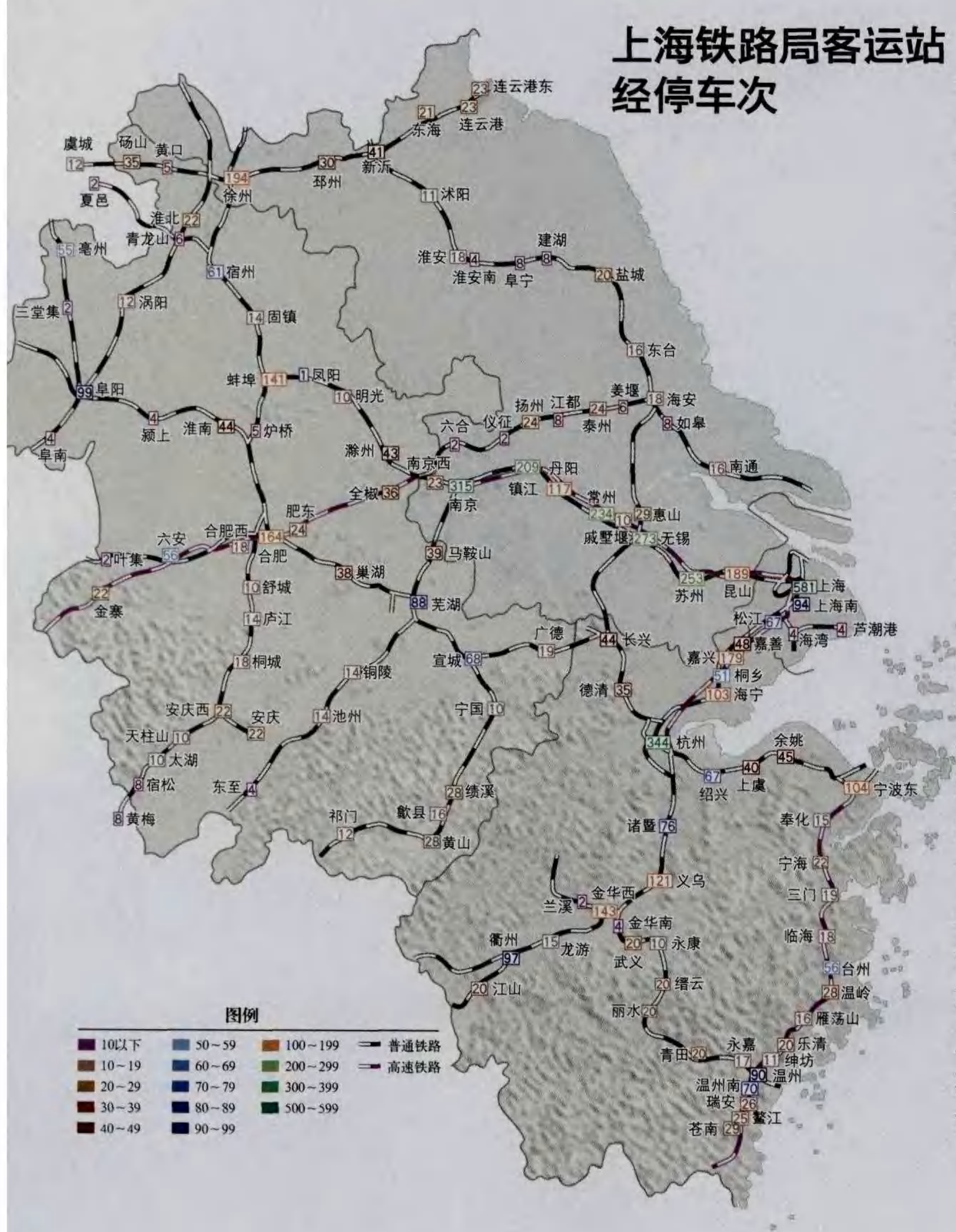
经停车次为200～700次的车站

人们戏称的“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集中了中国的人才与资源。国家在宏观布局时会优先向这几座大城市政策倾斜，从图中可以读出，北上广（及其周边地区）也集中了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最繁忙的站点，人才的集中与铁路资源的集中，高度一致，孰因孰果，耐人琢磨。

乌鲁木齐铁路局客运站经停车次

图例
10以下
10～19
30～39
40～49
普通铁路

乌鲁木齐的停站车次与上海地区的嘉善相当



在一本官方列车时刻表的陇海方向示意图上，新疆自治区有十多个站点在列，与东部的站点分布差不多，而若仔细检索，则二者的繁忙程度有天壤之别。比如乌鲁木齐站——乌鲁木齐铁路局辖下最重要的客运枢纽，其停站车次为48次，与东部车站相比，萍乡（江西）为其两倍，商丘（河南）约为其3倍，好多人闻所未闻的樟木头（广东东莞）站居然是它的4倍。新疆地区其他站点也如此萧条吗？更甚于此。伊宁、喀什、阿克苏，每天只有几趟列车在此停靠，更多的站点旁边我们标注了数字“2”——每天只有一对对开的慢车在此停站。

图中大部分“清闲”小站有个共同的名字——乘降所。其意为它们没有道岔、到发线、客运工作人员，不办理行包装卸，只在路边有个停车标牌。严格地说，旅客乘降所不是车站，只是为铁路职工或出行不便的沿途群众所设的上下车处。在不通公路的地方，它往往是人们通往外界的惟一途径。据统计，乌鲁木齐铁路局管辖着22处车站（平均停站次数14次／日）和57处乘降所，而上海铁路局管辖138处车站（平均停站次数52次／日）和9处乘降所，两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西部之萧条、东部之繁忙。

城镇

兴衰就在火车来去之间

历史上有这样一些地方，它们曾因为火车的到来而繁华，又因为它的离去而萧索。对于一座城市而言，铁路是否从这里经过，注定影响它的沧桑命运。中国铁路发展变迁的背后，是小城镇里各式各样的悲喜故事。遗憾的是，火车来了又走了，被火车遗弃的小站，在这片国土上越来越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黑龙江三河屯的工人正在检修蒸汽火车。从1865年英国人把蒸汽机车带进北京的那天开始，中国城镇的命运，就在这一钢铁巨龙的操控下，变得跌宕起伏。摄影／王福春



河北正定
一座贵城的陨落

■ 撰文／倪瑞锋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说到赵云在长坂坡单骑救主，杀个七进七出，所到之处，威不可当，直教山顶观战的曹操大惊失色，急问左右：此人是谁？赵云应声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当时就看得热血沸腾，倾慕不已。本着"地灵方能人杰"的朴素想法，我对"常山"——今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下辖的正定县——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去年八月，我决定前往270公里外的正定探访一番。那时每天尚有两班火车从北京发往正定，而从2011年1月1日起，已有109年历史的京广铁路（曾经被称为卢汉、京汉或平汉铁路）正定站停办客运业务。于是在那个盛夏的清晨，就像是去搭乘"末班车"一样，我踏上了古旧的绿皮火车。

从下车到出站，铁道上便有两趟动车组和一列空调列车呼啸而过，丝毫没有为这个小站略作停留的意思。走出简陋而呆板的老式站房，眼前的小广场挤满了拉客的"蹦蹦车"，再往外，是尘土飞扬的马路和热闹而混乱的街市，看起来有些"山寨"的商店里，不时传出当下流行的"神曲"。那个骄傲地把籍贯挂在自己大名前头的英武逼人的少年将军，在我脑海中忽地黯然神伤了。眼前的一切，实在与历史上那个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的正定相去甚远。史书上的正定，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晋而清，它一直是郡、州、路、府的治所。宋人吕颐浩在《燕魏杂记》里记载："真定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富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公元十三世纪，途经真定的马可波罗兴奋地把它描述成一座"贵城"。他在游记里写到："又南行4天，到达一座白色的城（即真定）。这座白色的城是一贵城，居民……是大汗之臣民，使用大汗的纸币（至元宝钞）。

持工商为生。盛产丝织品，能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此城领治广大地域，所辖环墙之城及村镇甚多。”

为什么一个繁华扰攘的北方重镇，会沦落成今天这个普普通通的冀中小县？正定人脱口而出：“因为铁路。”

天上“掉下”个火车站

百余年前，路经正定的本该有两条铁路。一是卢汉铁路，一是其支线正（定）太（原）铁路。

光绪十五年（1889年），洋务派高官张之洞在奏章中对卢汉铁路做了规划：“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铁路取道，宜自保定、正定、磁州，历彰、卫、怀等府……”此时的张之洞，刚刚坐上湖广总督的位子，他所效力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交困挣扎，面对随时可能引爆的危机，位高权重的张之洞不得不小心提防。为此他盘算着：如果用铁路把这些军事要地串联起来，一旦战乱爆发，便可在最短时间内筹饷运兵，以解朝廷之围。于是，北方重镇正定便成了张之洞设计卢汉铁路线时不可跨越的一个重要地点。

怎奈国库空虚，朝廷每年拨款200万两银子修筑卢汉铁路的承诺，只兑现一年便夭折了。卢汉铁路修筑计划被迫暂停。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上书朝廷说：“山西煤铁之富为华北各省之冠，……而晋省境内山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故请开办太原到正定支路，以接卢汉铁路。权衡了利弊，清政府才下决心继续修筑卢汉铁路，并以该路为干线，在邻省修建支线与之衔接。正定的命运就在修建这条支线时，发生转折。

今天作为正定“顶头上司”的石家庄市，在卢汉铁路修筑前，还只是正定府获鹿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面积约1.5平方公里，除了村西口通向获鹿县城和振头镇的两条道能走马车外，其余的小路窄得只能容人步行。根据清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编写的《石家庄保甲册》记载，当年的石家庄全村只有94户人家，男女共计310口。村民皆以种地为生，若需添置家用，便得凑时日到振头这样的大镇去赶集。

石家庄原本没有机会和铁路扯上关系。当时的获鹿知县谢鉴礼是个颇有远见的人物，他深知“车站为交通之枢，商贾云集，工商为繁盛之媒介，富庶之基础”。于是，谢氏特意指派获鹿本地的士绅葛朝刚、王字润重金贿赂负责该项目的法国总工程师埃士巴尼。没想到，两人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修铁路会坏了获鹿县城的风水。于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便落在了三十五里外的石家庄村。卢汉铁路落成时，在石家庄村所在地设了站，却因为其村小无名，遂以7公里外的振头镇命名为“振头车站”，并在管理上隶属于其北边14公里的正定火车站。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的李惠民教授曾考证了正太铁路规划选址过程中的官方文书——主要是奏折与合同，他发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当山西商务局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柳太铁路借款合同》时，只确定该铁路的东端起点为“滹沱河南柳林堡相近卢汉铁路车站之处”。柳林堡当时在正定府南，其北是滹沱河。后因种种原因，铁路计划暂时搁置，直到1902年，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和华俄道胜银行才重新签订了《正太铁路借款合同》。但是第二年，当法国总工程师埃士巴尼测勘路线时发现，原来计划利用滹沱河水路运输建设材料的方案实不可行，后来又为了压缩开支，线路取直，遂又将东端起点进一步南移至振头车站，因为这样与卢汉铁路的连接最为方便快捷。

李教授的考据从文献上来看似乎无懈可击，但铁路的规划设计，从来不可能出于单纯的技术考量。按常理和惯例，一条铁路的规划，总是起止于业已存在的重要市镇，沿途走向除考虑地形、地质之外，也总要尽量兼顾成熟繁华的聚落。张之洞规划卢汉铁路时，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个原则。那么，为什么区区一条不深也不急的滹沱河，十几公里的平原路程，就能阻止正太铁路落户正定城呢？这就得从当时全国铁路规划和建设的大背景来说了。

清政府当时的铁路建设原则是“干线国办，支线商办”。虽然山西巡抚胡聘之提出修建正太铁

路计划，但以山西商绅的财力，并不足维持修路开销，胡聘之适时地提出借洋款修路。时值朝廷财政窘迫，卢汉铁路就是跟比利时银行借款修的。消息传出后，俄国为争夺借款权，通过其与法国联合在华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推荐法国工程师越黎等人勘查线路。而当时的中国，懂铁路建设的官员、专家寥寥无几，在山西恐怕更是凤毛麟角，自然对洋专家的勘察结果言听计从。把东端起点选在柳林堡，很可能就是在这时埋下的根子。因为在山西省官员和外国银行派遣的工程师眼里，重要的是把山西的资源通过这条支线快速运往卢汉铁路，再继续南下、北上，至于东端在何处与卢汉铁路相连，并不重要。很快，山西商务局便与道胜银行签订了《柳太铁路借款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此段铁路应由何路经过、铁轨之宽窄、何处应设车站以及车站何处应大、何处应小、火车客货车辆之多寡各等事，均由银行代为酌核，商明商务局办理。"这等于进一步剥夺了中方的话语权。不过，第一次签约之后，却迟迟未能动工。先是1898年，山西巡抚胡聘之被调离，之后接任的两任巡抚何枢和毓贤都是保守派。他们视现代化如洪水猛兽，战战兢兢地向朝廷上奏说："铁路一开，生机立蹙，万民待命，人心惶惶……所有车马行店，以及肩挑负贩，皆成无用"，恳求"天恩饬即停止……将山西铁路、矿务作为罢论。"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又勃然兴起，借洋款办洋务修铁路的事自然就被搁置了。

转眼到了1902年，沉不住气了的华俄道胜银行，拿着几年前的合同找到山西省府，要求开工修建柳太铁路，并比照当时已经建到石家庄村的卢汉铁路合同，对原合同进行了修改。此时的山西巡抚岑春煊，是个思维活跃的维新派，他知道一旦山西没了铁路，则"办赈难"、"通商难"、"运兵转饷难"，于是岑春煊上疏奏请将原来商借、商办的柳太铁路，归并于直属清廷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改为官借、国办，由正二品工部左侍郎盛宣怀负责督办。尽管如此，在铁路总公司与华俄道胜银行新签订的《正太铁路借款合同》中，还是赋予了华俄道胜银行用人、管理、购料等一切权利。这实际上是把包括规划设计在内的一切事务"一揽子"外包给了外国银行，而清廷及其铁路总公司则漠不关心，不闻不问。

最能体现这种"不作为"态度的，莫过于正太铁路的轨距之争。由于合同中规定包括轨距在内的各项事务皆由银行指定的总工程师定夺，所以直到1904年开工前夕，中方才赫然发现，法国人设计的正太铁路是1000毫米宽的窄轨，而即将通车的卢汉铁路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正太是卢汉的支线，若轨距不统一，将来就无法衔接，势必会造成极大的麻烦和浪费。铁路总公司和外务部赶紧向华俄道胜银行交涉。银行指定的总工程师声称，由于地形复杂，道路险阻，只能建窄轨。如果要改建准轨，就要追加六千万法郎的造价。而银行又坚决不同意追加借款。双方相持、扯皮长达一年之久，最后还是中方打落门牙和血吞，接受了窄轨的现实。

连轨距统一这种事关全程的大事清廷都受制于人，还有谁会去追究正太铁路东端接点是在河这边还是河那边呢？既然总工程师埃士巴尼说以石家庄村的振头车站"最合经济"，那就听之任之吧。三十里外的正定城自始至终沉默无言，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的机遇在锃亮的铁轨上悄然滑走。在探究正太铁路规划决策细节的过程中，我发现，在铁路从奏议到开建的八年中，两地的地方官惟有山西一任巡抚反应积极，直隶省或正定府或获鹿县任何一级政府皆哑然无声。地方的士绅阶层、商贾组织对这件即将切实影响到自身利益和命运的大事，也极其冷漠。这种冷漠，也注定了正定的没落。

双城记：命运顺着铁道分叉

石家庄的命运几乎在一夜之间被铁路改写。1904年4月，正太铁路动工，作为起点站的石家庄，"不仅是施工队伍的大本营，又是施工设备和器材的集积总站"，"据《石门指南》记载，此时开办的主要旅店有：1904年开店的春元旅馆、1905年开店的大兴栈、1906年开店的晋义栈、广利栈等。"由于一批负责铁路修建的外籍专家、职员驻扎在石



家庄，一些常用的外国食物在中国铺号很难买到，所以没过多久便出现了专卖洋货的商店。

1906 年，卢汉铁路全线通车。次年，作为支线的正太铁路也通车运行。石家庄从此就有了两个火车站，西边的正太铁路窄轨车站，和东边的卢汉铁路标准轨车站（位于今石家庄火车站附近）。考虑到在两条铁路之间转车的旅客、货物，不得不在石家庄两个火车站之间接驳、装卸，嗅觉敏锐的商人们便纷纷办起了货运业务，把从一个车站卸下来的货物，送往另一个车站装车运出。

此时，石家庄村周边的大片耕地已被铁路占用。1904 年的《京汉铁路购买地亩粮户过割清册》，详细记载了京汉铁路（即卢汉铁路）在石家庄村收购 12 户农民 118.69 亩土地的情况，小的仅 0.1 亩，大的将近 27 亩，最多一户人家一共被买去了 9 块土地。原本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卖了地，不得不寻找新的谋生出路。于是，很多人充当起脚夫的角色，穿梭在石家庄两座火车站之间，靠拉人卸货度日。据说大清朝专管交通行政的邮传部曾明文规定："开各站脚夫均归土人承办，其承办之夫头及所雇夫役须土著民人充当，不得越境滥雇。"正太路和京汉路脚行的夫头于志文、殷百鹭还在呈给官府的字据上承诺："该脚行均须雇用本庄贫民装卸货物"。被石家庄村民垄断的脚夫生意，每天能给每个脚夫带来 120 文工钱的收入，很多外乡人看了眼红，争夺脚行的纠纷不断。

从满清到民国，从法国人经营到中国人接管，石家庄两座相距不远的车站都是这样将就着，忙碌着。一直到日寇占领石家庄、控制正太铁路时，为了更加疯狂地掠夺攫取资源，才把正太铁路改为准轨，并赶修石（家庄）德（州）铁路，使其与正太、京汉铁路联通起来。这是后话了。



□ 铁路把石家庄这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小村，变成了今天高楼林立、人口近300万的特大城市（图1 摄影／冯涛）。它的崛起，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火车创造的神话。而不远处的正定，在丢了铁路的同时，也把区域中心的政治地位一并拱手相让。这座曾经令马可波罗无限感慨的“贵城”，终于在铁路的来去之间，悄然陨落（见图2）。摄影／苗卫钟

孙中山先生曾说：“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正定与石家庄的此消彼长，就是这句话最恰如其分的注脚。1925年，石家庄村和休门村合并，改名为石门市。1947年石门解放，又被更名为石家庄市。1968年初，石家庄正式成为河北省会。而原来的正定府，却在1913年被废府存县，以后虽一度升级为市，却最终在建国后被划入石家庄的管辖范围。

历史容不得后悔。石家庄快速崛起的同时，正定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在那个夏日的午后，我在这寻常县城的巷陌中走走停停，眼前的正定与追求摩天大楼的省城石家庄是如此不同。它看起来或许有些破落，但当我慢慢沉入它的肌理，感受它沉重的呼吸时，我突然醒悟过来，少时的想象并没有错。这小小的县城内，竟暗藏着八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文庙就有两座，在全国县城中独一无二。这一处处躲在深巷里的宝贝，诉说着正定城非同寻常的历史。正定古城墙至今还挺立着，横亘在青灰色砖瓦院落和墨绿色的玉米地中间，披覆着茂密的灌丛野草，盛开着各色野花，即使被岁月剥蚀得只留下大半截夯土，却依然无法掩盖其高大宽厚的体量。我站在急雨之后湿滑的城墙头，见天上的残云急速奔走，残阳穿过云层照得漫天金碧辉煌，仿佛一道巨幕正在拉开，一台大戏正要上演。听着远处迅速接近又迅速离去的火车鸣笛，看着一寺两庙四塔那曼妙的身影，慢慢隐没在炊烟和暮色之中，我恍然觉得，自己脚下是一个巨大的标本，一个在枝头盛放时被迅速采摘、风干、压制而成的标本。它的辉煌戛然而止，但也正因如此，它迷人的旧时风物得以长久保存。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更好的结局？

责任编辑／郭婷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刘扬

昆河、蒙宝线铁路线路图



■ 图中由昆明至河口的铁路即是当年滇越铁路的滇段部分，而个碧石铁路已在1959年消失，碧色寨至蒙自的寸轨路段被拆除，其余的寸轨也大都改造为米轨，名称变更为蒙（自）宝（秀）线，作为个碧石铁路支线的鸡个线，也在1991年停运。在图中的放大区域里，还能看到当年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的一些站点。

云南蒙自·碧色寨
“喧腾是短命的代名词”

■ 撰文／和中孚 摄影、供图／邢毅 等

云南第一个海关、第一座邮局、第一家洋行、第一个驻滇领事馆，这众多的“第一”全部指向一个地方——蒙自。然而，滇越铁路的偶然改线，却使盛极一时的蒙自县城瞬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所取代。而那个原本只有十几户人家、被称为“壁虱寨”的地方，也因为有了铁路，在几十年间无限风光……

云南的钱袋子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前后，云南临安府来了两个希腊人——哥胪士兄弟。与很多扎堆奔向蒙自、蛮耗的洋人一样，他们背井离乡远渡重洋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

蒙自，历史上曾是边关要塞，经济不甚发达。红河岸边的蛮耗是云南唯一的水陆运输中转码头，但那儿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因此不远处的县衙所在地蒙自，就成了洋人首选的落脚地。18世纪末，即有西方的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学者、政府官员、皇室贵胄等纷纷飘洋过海东渡而来，他们大多在蛮耗弃舟登岸，然后沿古老的“蒙蛮路段”直驱蒙自。这段路长约140里，峡谷异常炎热，逐级攀登“万级阶梯”，一般要走上两到三天。滇越铁路开工前夕，每天大约有12000匹骡马穿梭在古道上，蹄花飞溅，轿舆云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企图以越南为跳板，利用红河入侵云南，于是从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1885年）间，中法战事频发，到光绪十三年六月，法国使臣恭思当就已心满意足地在《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的文末署上了大名。这一条约打开了中国西南边境的门户，云南蒙自、蛮耗遂成了中越通商口岸，法国商品经此进入中国，一律享有减税特权。而蒙自县城东门外的大片土地也被划为了通商租界。随后而来的便是由外国人把持的蒙自海关，意、日、德、美领事馆，再然后，电报局、邮局、洋行、银行、商号、教堂、妓院争相涌入，好不热闹。

1898年3月，法国驻华公使吕班照会大清总理衙门，要求由法国政府或法国公司出面，修建一条自越南边界海防通往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清廷答复：“可允照办”。

希腊人哥胪士兄弟俩就是为修建滇越铁路而来的，任务之一是给筑路工人采购货物。这让他们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1906年，哥俩凑了些银元，在蒙自东村路边盖起了一个小店，贩售日用品和五金零件。几乎同时，沙厘耶洋行、普利洋行、巴黎百货公司也纷纷进驻这座边陲小城，蔚然兴起的还有本地颇具规模的48家商号，其中著名的顺成号、泰来号等八大巨头，号称“八大号”。本地商号不仅把触角伸向了港、粤、沪，甚至还有人把生意做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欧、亚、非大陆。除了经营锡、锑、钨沙、茶叶、鸦片和皮革外，还进口棉花、棉纱、石油、机械、日用百货，并输出多达60余种的云南土特产。从蒙自海关进出口的货物曾一度占云南对外贸易额的85.7%。金融业也不甘

落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中国富滇银行等都在蒙自设立了分支机构，蒙自一度成了整个云南的钱袋子。

在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开放通商的蒙自，几乎创造了一夜繁华的奇迹，但是这块土地上乡民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却并不能一夜即变，面对满城的外来面孔，他们难以平静，始终以各种形式抵抗和斗争着，而这一抵抗，最终导致蒙自命运的大转弯。

宁死也不让铁路进来

从昆明到越南的滇越铁路，原计划从蒙自县城穿过，并在此建枢纽站和铁路公司。1905 年，工程已经开工两年，花去二百多万法郎，铁路通讯线都架进了蒙自县城，毛路也修到了距县城 30 多公里的阿三寨。就在此时，几桩突发事件却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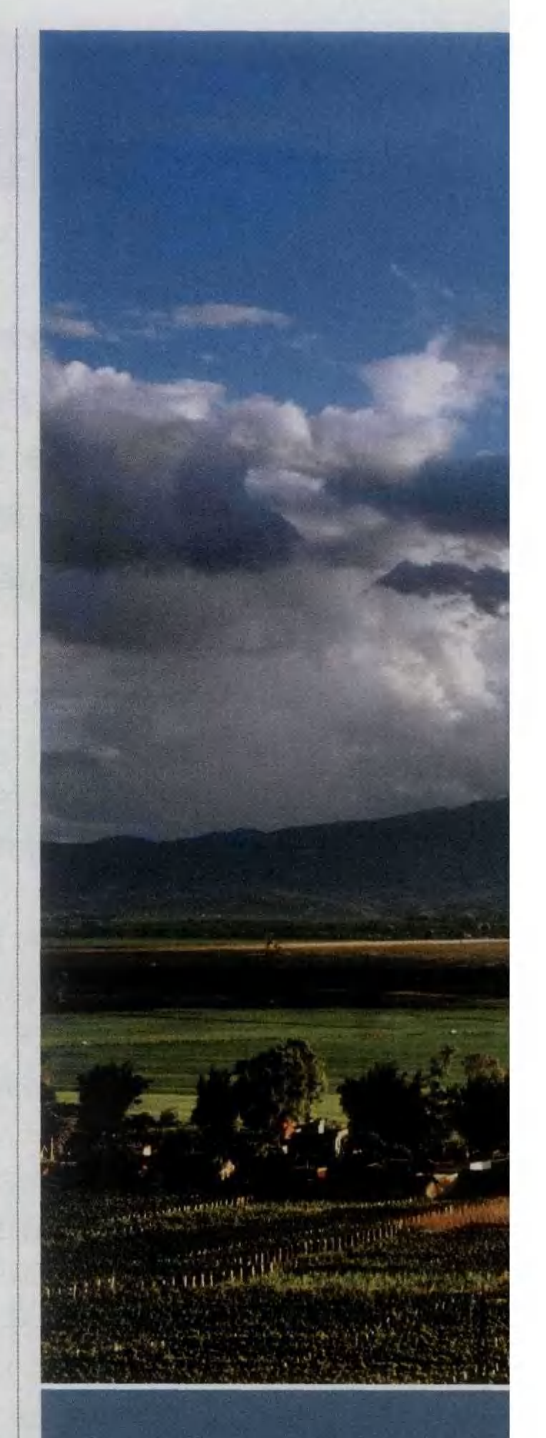
1900 年前后，法国工程师吉理默等人在蒙自、临安一带勘测路线，沿途百姓不知道这伙到处东瞄西量、挖坑打桩的洋老咪（当地人对洋人的称呼）究竟在搞什么鬼，纷纷传言他们是要借铁路谋夺个旧矿山，一时间群情激奋，法籍勘测员被杀事件时有发生。

蒙自大屯坝杨家寨的杨自元是当地锡矿上的一个小老板，早年因矿山归属一事与蒙自知县结下宿怨。1899 年六月的一天，他召集李弯三等一千多个矿工和农民，夜袭蒙自县城，因城内官兵把守严密，未能如愿，只从府衙劫去库银二万五千两，便转攻蒙自海关和法国驻蒙自领事馆。毕竟只是临时起意，领事宋嘉铭和海关税务司斯必立稍作抵抗，杨自元等人便招架不住，眼见黎明将至，胜负未卜，他就一把火烧了税务司署，命人拔下铁路勘测桩，扒毁施工便道，然后率队逃回杨家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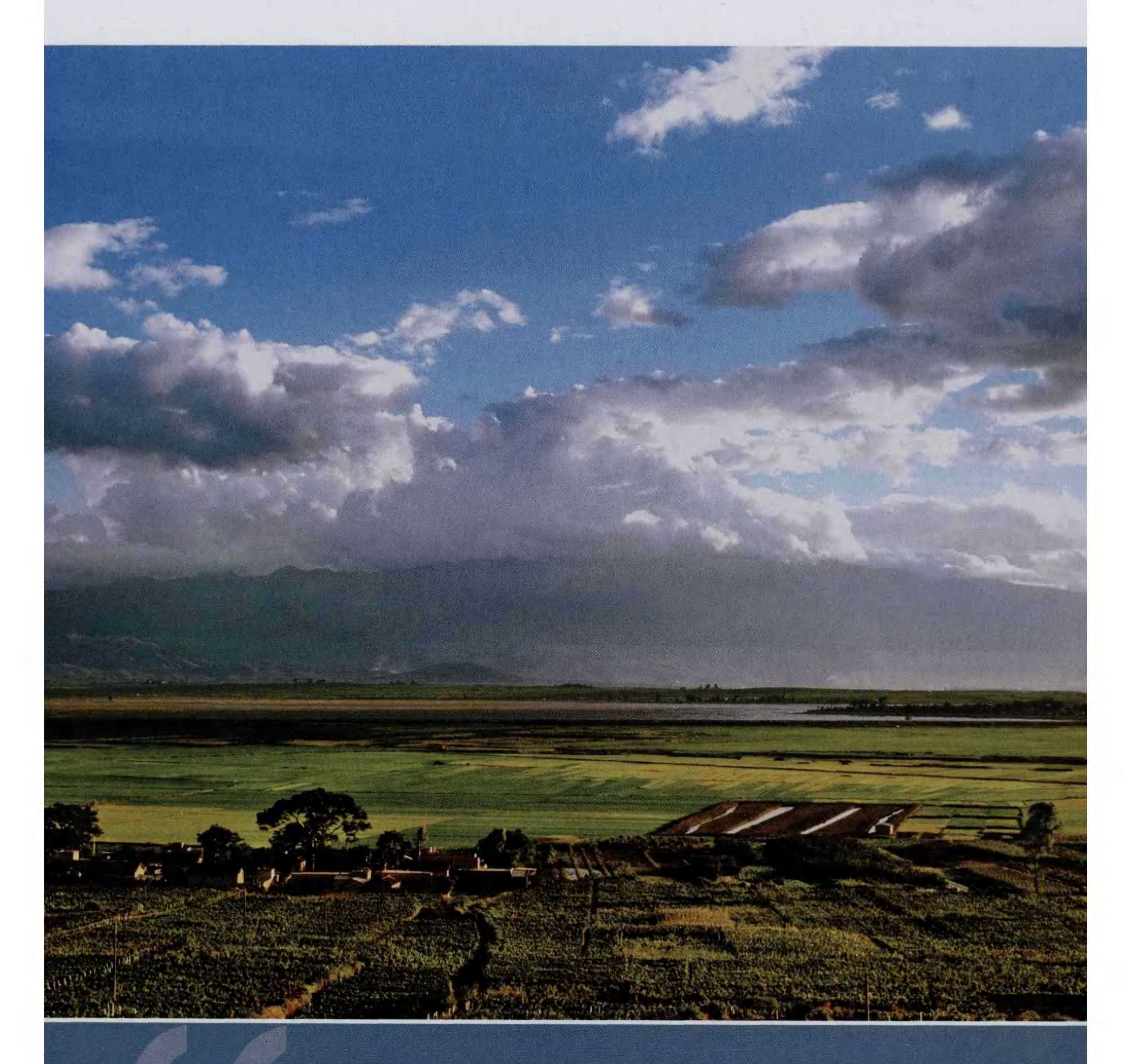
第一次冲突可谓小打小闹，但第二次的起事，就是风起云涌了：四年后，在矿商朱渭卿的暗中资助下，保查队长周云祥率领个旧锡矿工人造反，响应的矿工、乡民竟迅速膨胀至数万人，势力波及今红河州和通海、玉溪、文山、元江、峨山、师宗、宜良、昆明一带。他们占领石屏、建水，攻打蒙自、临安，砸毁了蒙自海关和外国洋行。云贵总督丁振铎、巡抚林绍年担心时局难控，便张皇失措地上报朝廷。慈禧太后听闻，火速调派云南按察使刘春霖率军围剿，官兵所到之处，死伤无数，哀鸿遍野。

蒙自乡绅原本就不赞成修铁路，他们既怕火车的汽笛声惊扰了祖宗的英灵，又担心铺设铁轨会占了自家的田地。此时乡民造反，官府、洋人焦头烂额，他们倒乐得作壁上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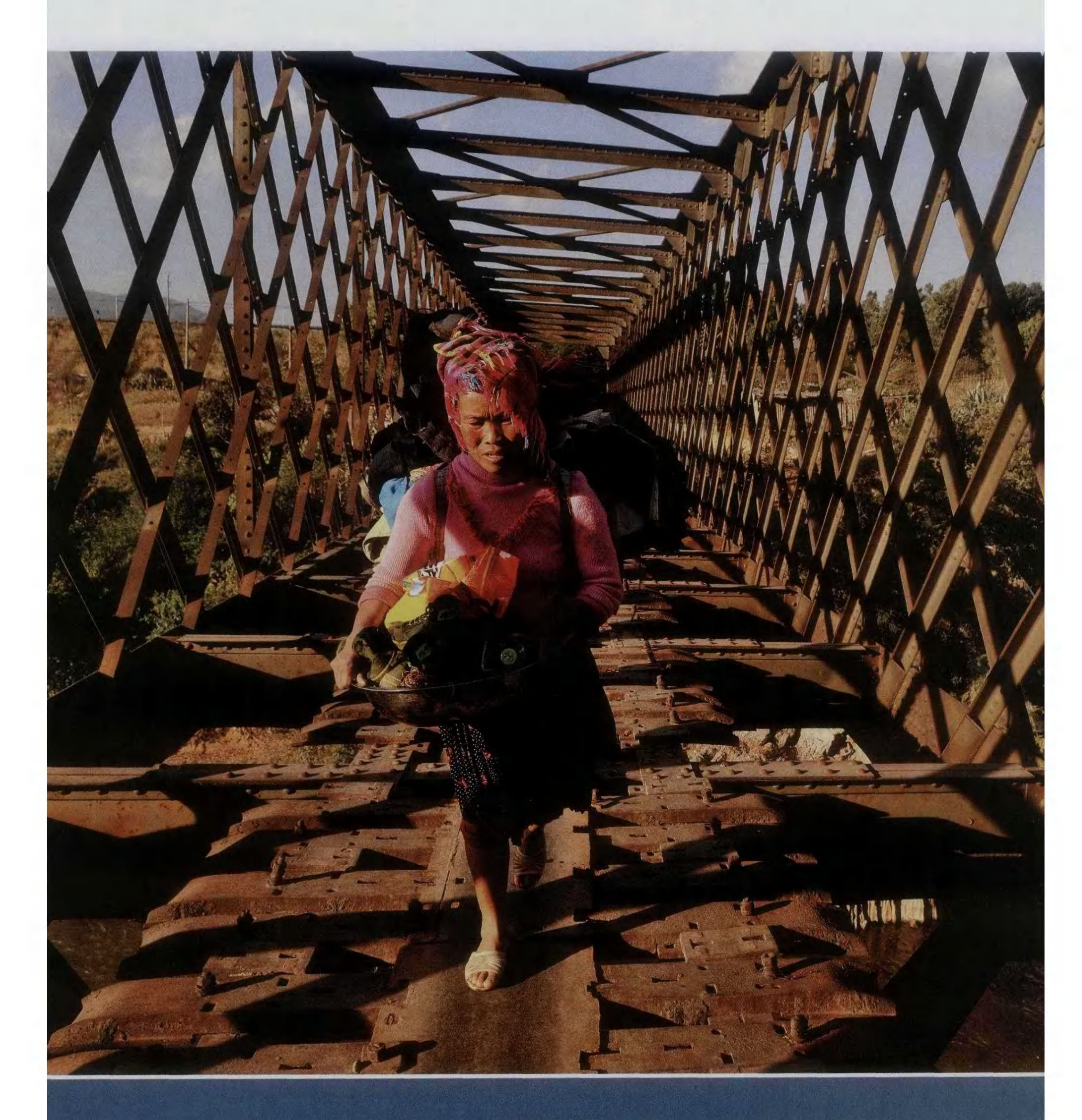
个旧锡矿工人造反平息后，周云祥的头被砍下来挂在昆明三市街示众。法国人则被吓怕了，法国领事带着法籍馆员、传教士和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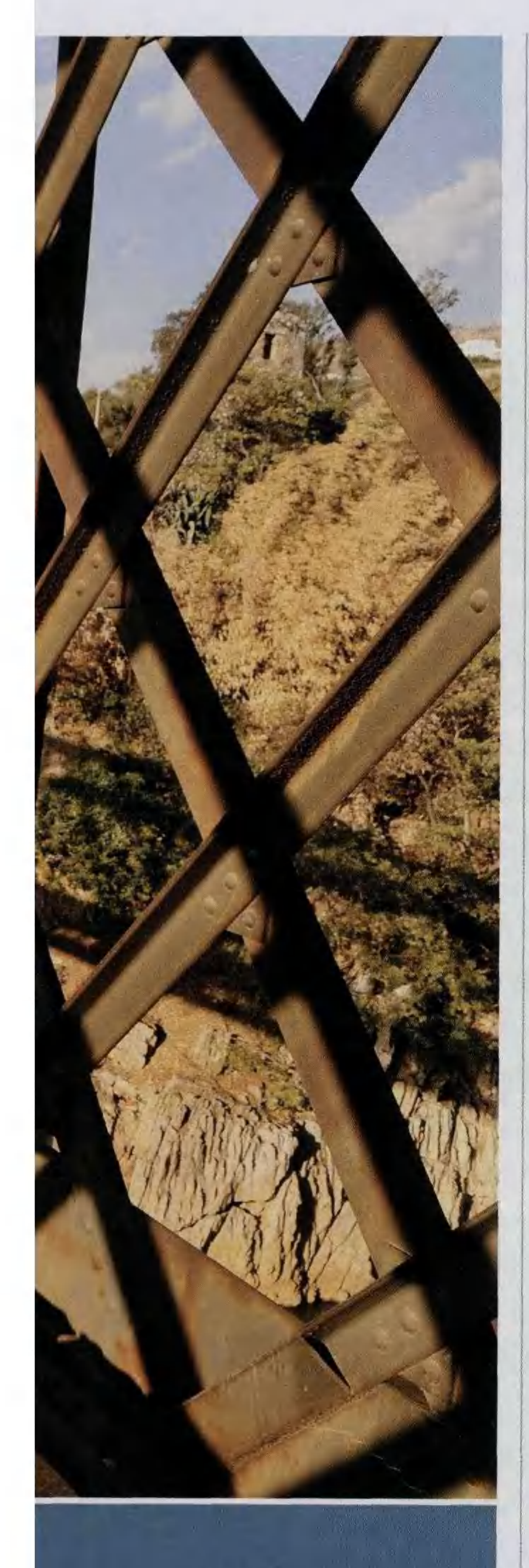
□ 蒙自，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东部，是滇南第一大坝子。这个在历史上曾经煊赫一时的边关要塞、通商口岸，在经历了火车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曲折后，最终归于平静。摄影／邢毅



杨自元等人眼见黎明将至，胜负未卜，他就一把火烧了税务司署，**命人拔下铁路勘测桩，扒毁施工便道**，然后率队逃回杨家寨。



□ 花桥，是半封闭式的钢铁大桥，两头开口，火车从中间穿过。滇越铁路小龙潭车站附近的这处花桥是当年法国人监工修建的，目前已经随铁路的停运而废弃。一些铁板被人拆掉了，住在附近的苗人时不时从这长方形铁笼里穿过。透过脚下铁板的缝隙，便能望见湍急的南盘江水。摄影／王牧



越铁路的法方负责人、工程师，纷纷逃往越南避难。法国政府也终于在 1905 年痛下决心，更改了滇越铁路的设计路线，把原先打算设在蒙自县城的枢纽站，挪到了距县城东北 11 公里的碧色寨。

有意思的是，在记录改线事件前因后果时，法国人回避了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保留在法国的档案是这样说的：铁路沿古驿道抵达蒙自，固然径路最短，但线路高差甚大，从河口 0 公里处到新现山口 150 公里处，海拔由 90 米上升到 1616 米，平均每公里提升近 11 米，这段路素有“万级阶梯”之称，还有“一系列的塌陷坝子的地形地貌”，不少地段“布满了深陷漏斗状凹地”，“土质承载力不好，存在异常的危险”。1910 年法国人撰写的《云南铁路》，也把改线的原因归咎于地形地貌、地质结构、设计难易等技术层面的因素。

事实上，滇南边陲的地形、地质大体一致，并无孰优孰劣之别。相反，改线后线路海拔高差更大，碧色寨海拔就比蒙自县城高出 223 米。铁路有 80%穿行在巉岩峻岭间，需凿山洞 150 处，架桥梁 425 座，工程实甚艰巨，且沿线瘴疠苦毒，人烟寥落。明知如此，法国人却无所顾虑，毫不气馁。在我看来，滇越铁路改线只为省事，力求快通。法国人的目标并不在沿途各地，而是要直驱昆明，打造联结扬子江流域的交通网络，抢先将中国半壁江山划入殖民版图。

不管是何种原因，滇越铁路最终还是甩开了蒙自县城，选择了远离平坝、田园和城镇的荒山野岭。乡民们屡屡用武力阻洋修路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只是让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铁路走远了，蒙自县城的区位优势也跟着一落千丈，原来的滇南物资集散地日趋惨淡。相反，一个名不见经传、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碧色寨却很快取代了蒙自的地位，开始了它的新命运。

大山深处的特等车站

1898 年底，41 岁的法国人奥古斯特·费朗索瓦带着 7 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从广西启程，前往昆明。中国人称呼他“方苏雅”，虽然这略显柔媚的名字实在与费朗索瓦鼻下那两撇八字胡极不搭调。据说这是他在龙州结交的一个“苏”姓中国人按发音给他取的，费朗索瓦自己相当满意，还为此专门刻了一方印章。他一路乘船、骑马、坐轿，用了 11 个月才终于到了昆明。但此行的目的，却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自己的摄影癖好。法国政府把这个从里昂铁道专科学校毕业的勘探专家派到昆明，同时委以法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的重任，就是为了让他深入云南腹地勘测铁路线，为架设铁轨做准备。

碧色寨是一个彝族山寨，原名“坡心村”，但城里的汉族士绅则叫它“壁虱寨”。这个小村庄只有几条坑坑洼洼的红泥土路，一到雨

季，地上就像抹了层油，湿滑难行。路边零零星星散落着几处石头房子，茅草盖顶。1905年前后，法国人避开了蒙自县城，打算在这里建造滇越铁路的特等车站，级别比当时属一等站的昆明火车站还高。

身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的费朗索瓦亲往考察,他问身边的翻译:"'壁虱'是什么意思?"翻译是云南当地的汉族人，熟知寨名的由来，便老老实实回答道："我们管蜱虫叫'壁虱'，别看这个村寨面积不大，墙缝里却塞满了草爬子。"初来乍到的费朗索瓦，自然是见不到细节处的肮脏龌龊，在这个浪漫的法国人眼中，这分明是个碧色葱茏、繁花似锦的好地方。翻译灵机一动，附和着说出了"碧色寨"这三个字。从此，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彝族村落，就带着"碧色寨"的名号，写进了云南跨国铁路的历史。

1909年碧色寨车站落成，这里瞬间就涌来了大批的投资客，南来北往的旅客和货物在这里进进出出。原来个旧的大锡要出口，得先由骡马驮两天到蛮耗口岸,再用船沿水路运走。碧色寨通车后，蛮耗海关搬到了碧色寨，个旧锡商就直接将大锡驮到碧色寨，用火车运出国，既缩短了到香港销售的时间，资金周转也相较从前快得多。

一条铁路，让碧色寨成为充满商机之地。仅在1929年，碧色寨车站货物发送运量就达到了10万吨左右。原本聚集在蒙自的外资公司、洋行和商号跟着铁路一道陆续搬进了碧色寨。曾经属于蒙自的"速成奇迹"再一次在碧色寨上演。享誉世界的美国三达美孚公司、法国亚细亚水火油公司、德国德士古公司在碧色寨抢先设点，海关、税务、邮局、洋行、货栈、饭店、酒楼、咖啡馆，甚至鸦片烟馆、赌场、妓院……随后跟到。希腊人哥胪士兄弟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一时机，他们曾借着乡民火烧海关的机会，烧了自家小店，栽赃给起事的乡民，然后从中国政府那儿骗来了4万银元的赔款。拿着这笔钱，兄弟俩不仅在蒙自南湖边上盖起了一座占地3.5亩的洋楼，还把分店开到了碧色寨，兼营百货、酒吧和饭店，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哥胪士洋行。

碧色寨这个原本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突然间也有了定期的集市。方圆数十里的百姓都聚集在"街子天"，纸伞布棚四撑，摊点栉比，炊烟如缕，牛马遍地。西装革履的洋人和长袍马褂的土著你来我往，八方口音纷扰嘈杂，这个云南边陲的山坳，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激荡和碰撞里，绘成了一副怪异的中西合璧风俗画。据说，当年的碧色寨号称"小巴黎"，仅国内就有18个省、108个县的乡民和商人在这里闯码头，附近的百姓都知道，"蒙自城买不到的东西，碧色寨买得到。"我的老朋友韦凯说，那时碧色寨每天停靠两对寸轨旅客列车，大约有600-1000人上上下下，远在100公里外的盘溪农民也坐车赶来卖菜。最令他难忘的是碧色寨的小吃，中西混杂，粤味的浓郁、下江菜的清淡、川味的麻辣、滇肴的多彩。越南小卷粉、昆明烧饵块、石屏烘豆腐、建水汽锅鸡，还有蒙自的过桥米线……在车站及沿线阵阵飘香。

火车已不是当年的火车

出资金、出技术、出设备、出管理人员，法国人会如此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铁路?做赔本生意?铁路，从只有荆棘、乱石的荒山野岭中大摇大摆向前延伸，呼啸着改变了沿途各地的模样。而碧色寨在瞬间的崛起，也让云南士绅暗暗觉察出浮华背后隐藏的危机。

《云南通志》这样记载：同治初年，法国富商奥塞氏和张比德氏沿红河潜入云南，考察山川形势和资源矿产。一支由拉格里率领的探测队在云南蹲守数月后，向法国政府提交了《云南矿说》、《云南铜矿》、《云南银矿》三份报告。一时间，云南几乎成了法国人眼中的新大陆，不少人惊呼："云南就是座新金山!"而红河北岸的个旧原本就是享誉世界的"锡都"。早在滇越铁路开工前，就有不少法国商人慕名前往考察锡矿。想必是对大锡垂涎已久，法国人在起草《滇越铁路修筑章程》时明



□ 在铁路通车前，云南的茶叶、烟草、矿产主要依靠人背马驮向外输出（见上图）。滇南一带山高林密、气候湿热，马帮队伍不仅要穿越峭壁深涧，还需随时提防猛兽和土匪的袭击。1887年签署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使蒙自正式成为中越通商口岸。海关、领事馆、电报局、邮局、洋行、银行、商号、教堂、妓院一时间纷纷涌向这座滇南小城。下图即是民国时期人流涌动的蒙自县城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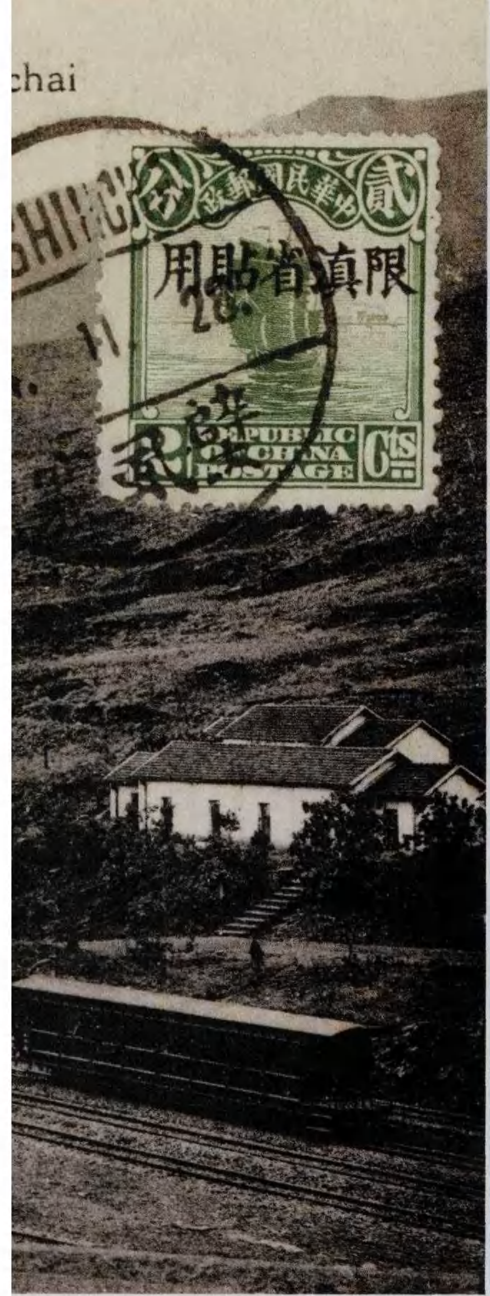
Edit. S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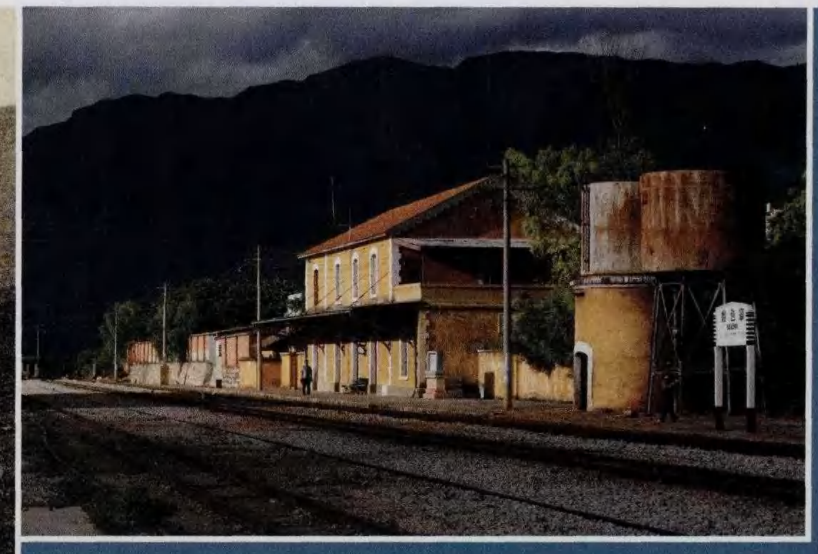


确提出:"滇越铁路完成后可筑展支线。"如此一来,借着架设铁轨掠夺锡矿便轻而易举了。

1910年五月,滇越铁路刚刚全线通车,锡矿商人李光翰就从个旧、建水、石屏等地召集了一批有识之士,联名上书云南政府,要求自建个(旧)碧(色寨)铁路,以赶在法国人之前守住矿山。但因筹款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这项计划拖了三年,终于在云南都督蔡锷的鼎力支持下排除众议,云南省政府也表示要"出资补助,以示提倡之意"。

个碧铁路线起初打算由碧色寨北上,沿长桥海,旁经雨过铺,终到个旧。这样不仅便捷,成本也较低。但戏剧性的是,这一主动避开蒙自县城的铺路计划,这回又招来蒙自士绅的强烈反对——因为蒙自人终于明明白白地瞧见了铁路由蒙自改到碧色寨的利弊。出身蒙自纳更土司的广东督军龙济光,深知此次修路计划绝不是个单纯的工程问





> **出资金、出技术、出设备、出管理人员，**法国人会如此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铁路？做赔本生意？

■ 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后，碧色寨车站的年旅客吞吐量达到22.8万人次。在这张法国发行的明信片里，可以看到火车通过碧色寨车站时的情景，而左上方的邮戳，还保留着当年汉人对这里的称呼“壁虱寨”。右图是今天的碧色寨车站，作为一个四等小站，这里早已没了当年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喧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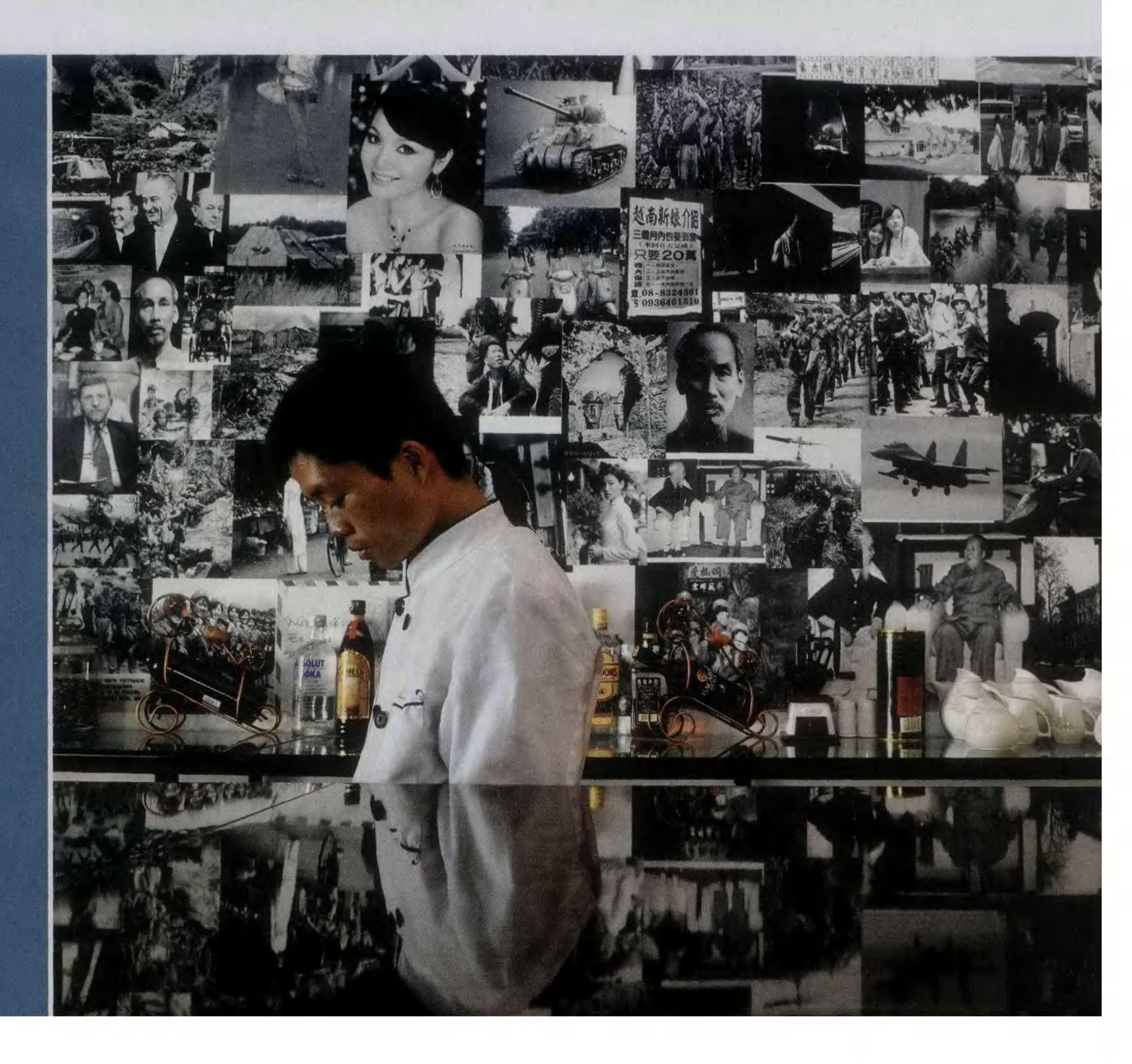
题，拿到路权就等于掌握了个旧大锡的矿权。于是，他联合十八个有声望的名士和企业家，上书云南省政府，历数铁路“三过其门而不入”——多处过境却迟迟不进蒙自县城的历史，强烈要求把个碧铁路线架进县城，否则通商口岸必然更加萧索。

个碧铁路采用“官督私办”或叫“公私合营”的形式起步，个旧、建水、石屏籍股东人数占了总锡商人数的 80% 以上。龙济光的提议遭到他们的坚决抵制，因为如此一来，就要绕一个长达 25 公里的大圈子，成本自然增加许多。县与县之间的轻视、隔阂和矛盾借

着铁路设站问题一并迸发，这场争执闹得沸沸扬扬，地区间相互牵制，设置障碍，导致工程被延误一年。后来，还是云南省政府出面解围，要蒙自绅商交40万两股金（实际只交了一半），各方才同意请法籍工程师尼复礼士重新勘测路线。而建水、石屏的矿商股东也不甘心利益受损，主动要求追加股本，将铁路线延至建水、石屏两地。

最终，个碧石铁路从碧色寨坡头直下7公里，到山麓的多法勒，往前4公里抵达蒙自，再从蒙自城经由十里铺（龙头寨）回到原设计点雨过铺，绕了个180度的大弯后，由鸡街岔路分别到个旧、石屏。1921年11月9日，个碧石铁路个碧段通车，蒙自县城结束了10余年来只闻汽笛声、不见火车影的历史。当小火车开进县城时，有多少人生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欣慰！但蒙自城却从原先拟建米轨国际铁路干线及枢纽站的位置，跌落到寸轨铁路的中间站。正应了那句老话：逝水已远，流水不再是当年的水流。

寸轨与米轨铁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宽度的不同。个碧石铁路要修多宽的轨道，一度引起士绅们的强烈争论。有人主张修米轨，以便和同为米轨的滇越铁路衔接，利于货物运输。而有的股东则有异议。个碧石铁路毕竟靠的是民营资本，财力有限，600毫米寸轨的修筑费用可比米轨节省40%，同时又避免了和法国人的滇越铁路相通，保持了主权的独立。不过时任个碧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鹤亭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按米轨建设，但先铺寸轨，留待将来时机成熟再改米轨。



于是在碧色寨这个枢纽站内，相隔200米之间，一边是滇越铁路的米轨车站，另一边是个碧石铁路的寸轨车站，两种轨距铁路并存，两座同名车站并立，铁路史上或许仅此一例。个碧石铁路通车后，碧色寨年运量从10万吨节节攀升至88万吨。而两车站中间相隔的这200米地段，也成了滇南一带响当当的客货中转地。人和货到了这儿要换车转乘，硬是催生出一批经营转运业务的商号，鼎盛时期曾经达到30家。每天有十几对列车经停碧色寨，大锡、皮毛、烟草、茶叶、大米……堆满仓库，等待转运出国。曾任碧色寨营业所主任的晋云龙先生，今天已年逾九十，回忆往事他说，车站周边最多时曾聚集了1000多个搬运工，拉人装货，洗车加水，每人每月能挣十几块大洋。即便是到了晚上，碧色寨也依然人声鼎沸，汽笛声、号子声不绝于耳。商店、饭馆、酒家夜不闭市，前来光顾的不单是洋人富商，还有上夜班的车站工人。当年的碧色寨，是滇南一带首屈一指的不夜城，“小巴黎”的名号就是打那时起流传开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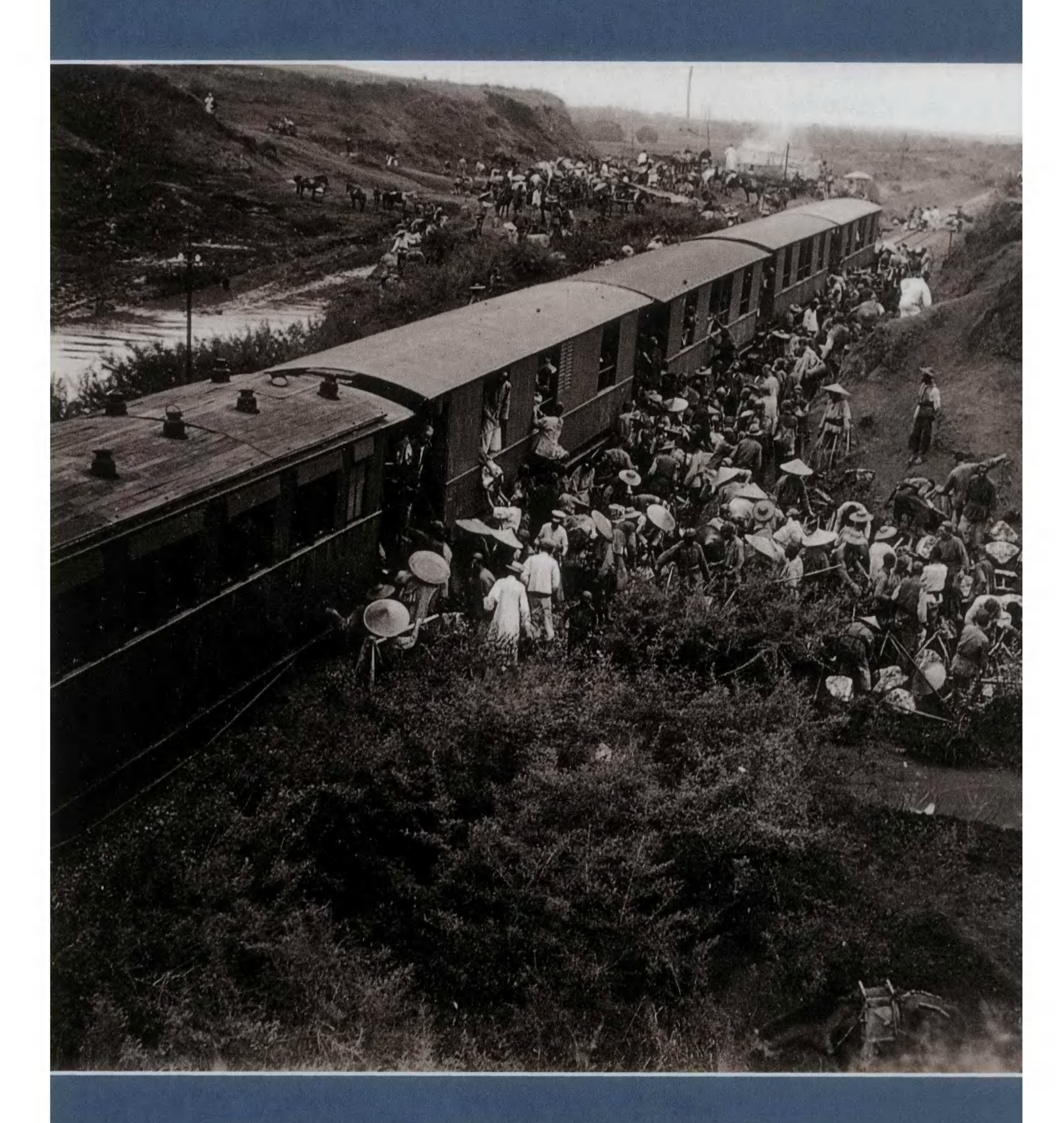
连接碧色寨和蒙自县城的个碧石铁路通车，使原本仅有10余公里的路程显得更短。外商富贾云集的碧色寨，对蒙自县城的辐射作用不可小觑。据统计，到了1932年，蒙自人口已经突破13万，与昆明市区仅仅相差万余人，县城又逐渐恢复了往日洋货林立、商贾云集的繁华。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对台湾诗人余光中来说，关于铁路的记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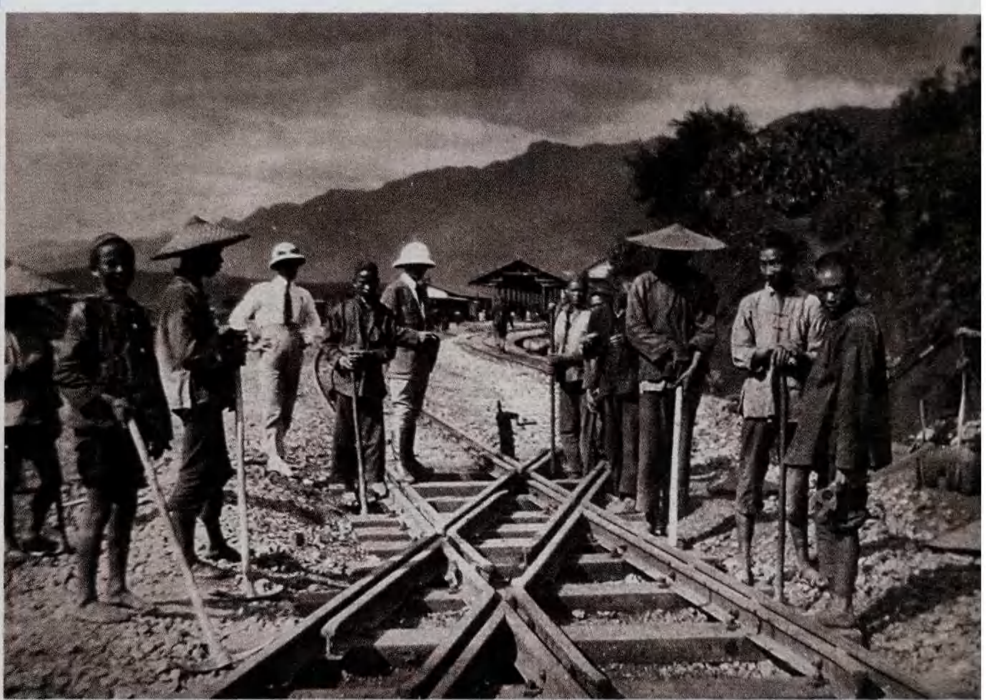


□ 滇越铁路碧色寨车站通车后，希腊人哥胪士兄弟把洋行的分店开进了碧色寨，兼营百货、酒吧和饭店。这是其中的一处店铺，现在由一个越南华侨改成了咖啡馆，吧台墙壁上装饰的老照片里呈现了各式各样的越南风情。20世纪初，法国人出资金、出技术、出设备、出管理人员，无怨无悔地在中国西南边陲修建铁路，只是因为这里有世界上第四大贵金属——锡。工业革命后，西方对锡矿的需求量猛增，云南个旧丰富的锡矿资源正是法国人历尽艰险修建滇越铁路的直接诱因。左图摄影／王牧



□ 滇越铁路的开通，使原本主要依靠骡马输出的云南商货，通过铁路直接运往国外，大大缩短了资金周转的时间。上图是民国时期火车到站时人们蜂拥上车的情景。而起初对铁路存有抗拒心理的蒙自乡民，也慢慢觉察到火车带来的好处。他们强烈要求将铁路修进蒙自县城，于是在碧色寨，这边是滇越铁路的米轨车站，两百米外则是连接蒙自与碧色寨的个碧石铁路寸轨车站，两种轨距并存而不相通。右图为施工人员在两种轨道交汇处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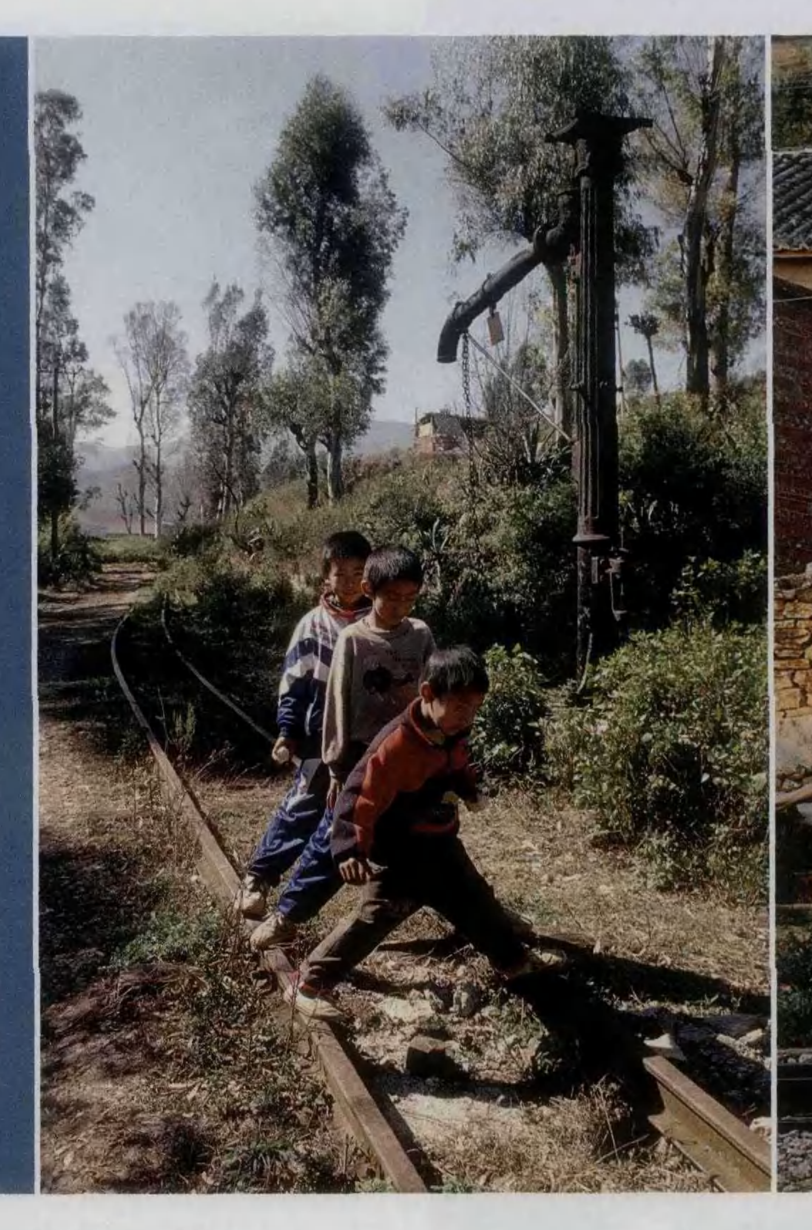




是从滇南小火车开始的。抗战第二年，母亲带着十岁的他从上海乘船到越南，然后乘火车北上昆明避难。他在散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里这样写道："滇越铁路与富良江（即红河）同行，依着横断山蹲踞的余势，江水滚滚向南，车轮铿铿向北，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大陆作家宗璞的年龄与余光中相当，年少不识愁滋味的她，抗战时期也曾有"逃难逃到了花园里"的感叹。

在国土沦丧、硝烟和血腥弥漫中华大地的时候，蒙自因铁路而来的交通便捷、物质充裕，也成为如桃花源般的避难所——当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落脚时，大举迁入的人流，让昆明一时难以接纳，于是文法学院便暂时选择在蒙自安家落户。大批的师生，先乘小火车抵达碧色寨，再由碧色寨换乘更小的火车转往蒙自。这是一群令蒙自熠熠生辉的文化精英，在蒙自的历史上，此前没有，此后也再不会有。他们是闻一多、陈寅恪、钱穆、冯友兰、刘文典、赵元任、朱自清、沈从文、潘光旦、叶公超、吴晗、王力……县政府出面安置，本地士绅们更是主动把蒙自南湖边最好的房子让给师生落脚，上课和办公的地点就设在海关大院里，单身教师和学生也就近住进了哥胪士洋行。

那时哥胪士洋行存有大量洋酒待售，一些教授们见了，兴奋地当场畅饮。闻一多在洋行楼上如沐春风，终日伏案写作无暇下楼，郑天挺教授劝他："先生，外面的风光好得很啊！何妨一下楼呢？"



□ 1958年，铁道部将滇越铁路滇段更名为昆河铁路。自2003年6月中旬起，昆明到河口、蒙自、宝秀等地的米轨客车全部停运，仅保留货运。碧色寨车站偶尔会有几趟火车经过，却早已没了往日的繁忙。熟悉了列车过境时间的村民，习惯坐在铁轨边上唠家常。而对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长满了杂草的寸轨轨道就是他们消磨时光的游乐场。

为此，便有了闻一多"何妨一下楼"的别号。叶公超教授曾任驻香港迁校接待站主任，后来他离校从政，官至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说蒙自的西餐最地道，他的告别宴会就在蒙自南湖举办。冯友兰则发誓蓄须明志，在作品《新理学》中，他以哲学家、思想家的超前意识，认定日本侵略者一定失败！他的呐喊从蒙自发出，震撼华夏山岳。钱穆教授在蒙自开始撰写《国史大纲》，终稿完成于滇越铁路线上的宜良。这部烙上蒙自印记的专著，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峡两岸一版再版，被公推为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社会学家陶云逵博士、语言学家邢公畹博士、哲学系代主任冯文潜等组织师生搞勤工俭学，做修建石佛铁路（石屏到佛海）的先期调查工作，在边疆社会状况、民族分布、宗教信仰、语言分类、山川风貌等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

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滇越铁路成了外援物资入境中国的惟一通道，其中包括重庆国民政府从欧美进口的大量战备物资。1940年6月，法国面对希特勒的步步紧逼，已丧失了招架之力。在向德国投降的前两天，法国屈从了日本的要求，封闭滇越铁路，禁止物资流入中国。

而同时，日军欲借道滇越铁路北犯云南的意



图也昭然若揭。一旦他们攻下越南，云南这个大后方就危在旦夕。为此，不得不拆毁滇越铁路。同年9月1日，国民政府下令炸毁南溪河上的中越铁路大桥和河口隧道，并火速组织拆轨队，日以继夜地拆除了从碧色寨至中越边境河口县的177公里长的铁路。文法学院租住的房屋被蒙自机场扩建工程征用。师生们遂搬回昆明。

临行前，很多教授依依不舍。钱穆和几位同事"皆惜蒙自环境佳，不忍离去。"陈岱孙在为《西南联大在蒙自》撰写的序言里这样说："当小火车缓慢地从蒙自站驶出时，我们对于这所谓'边陲小邑'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绪。……固然环境宁静，民风淳朴是导致这一情绪的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敌人深入，国运艰难的时候，在蒙自人民和分校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切的，同志般的敌忾同仇、复兴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才是我们间深切感情的基础。"

堂皇转眼凋零

这些年，我偶尔因琐事途径碧色寨，却总是无法把眼前破落的村庄与当年那个浮华喧嚣的"小巴黎"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即便是坐下来跟村

里的老乡聊上几句，也很难再寻到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不难理解，那毕竟是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事了。如今的碧色寨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坑坑洼洼的路边上，还有用石块堆砌成的简陋民房。忙完农活的村民，会三三两两蹲在铁道边，细数家长里短。走进一座雕刻着“大通公司”字样的门楼，云南第一块网球场就安静地躺在院子里。而第一个用火车通邮的邮局也早已改作它用，住在里面的人家在当年的邮政柜台里塞满了杂物，若不是还保留着那条20厘米长的投信口，我几乎找不到关于那段历史的证明。值得庆幸的是，站台上的法国式站房，虽然与周边的一切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却还安稳地被保留下来。墙上黄色涂料早已斑驳，只有墙面上挂着的双面钟还能清晰地瞧见英文Paris（巴黎）的字样。

时速慢、运力不强的小火车和寸轨铁路最终还是淡出了人们的生活。1959年，碧色寨至蒙自的寸轨路段被拆除，原来个碧石铁路蒙屏段的寸轨也被改造为米轨，并更名为蒙宝线（蒙自－石屏宝秀）。个碧石铁路与滇越铁路的连接站，由碧色寨迁往几里外的草坝。与此同时，汽车运输的优势开始显露，个旧的大锡用火车运到碧色寨要4个小时，竟是汽车运输耗时的两倍。20世纪70年代后又有了成昆铁路、贵昆铁路，锡矿运输更不必经由碧色寨车站。碧色寨从此人去楼空，从特等站沦落为四等站，回到了历史的原点。

火车走了，交通运输的优势没了，生意人自是不会久留。原先靠着铁路吃饭的乡民也只有拿起锄头回到田间。时至今日，碧色寨早年的建筑大都墙体剥蚀，有的梁柱倾斜，门窗不整，如同古陶器的豁口缺边，蚀痕斑驳。只留下南国的扶桑花、本地的甜石榴、巴西的叶子花开得如火如荼。站房墙体上刻记的北回归线标识还在，告诉人们这条神奇的23度27分纬线在这里与滇越铁路交会。每个夏至，太阳直射到地球最北端的那天，似乎是大自然给予世人的预言：碧色寨曾经如日中天，但这辉煌却十分短暂，成了昨天的太阳。

蒙自的状况也颇为相似。以锡矿运输为主的蒙宝铁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见衰微。如今的外省人要到蒙自，大多先到昆明，而后转乘汽车前往。在詹姆斯·希尔顿的名著《消失的地平线》里，曾描写过一条从东南亚乘坐火车直上滇、川、藏，朝拜香格里拉的“蓝色通道”。让人稍感安慰的是，詹姆斯70多年前的诗意幻想即将成为现实。一条铁路由昆明、玉溪逶迤而来，预计年底前修抵蒙自，还将延伸至河口，与未来的泛亚铁路网相连。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皆与道路交通息息相关，在蒙自与碧色寨咫尺之间，铁路就像一根神奇的魔杖，一指一点，便主宰了两座小城一个世纪的兴衰变迁。

责任编辑/郭婷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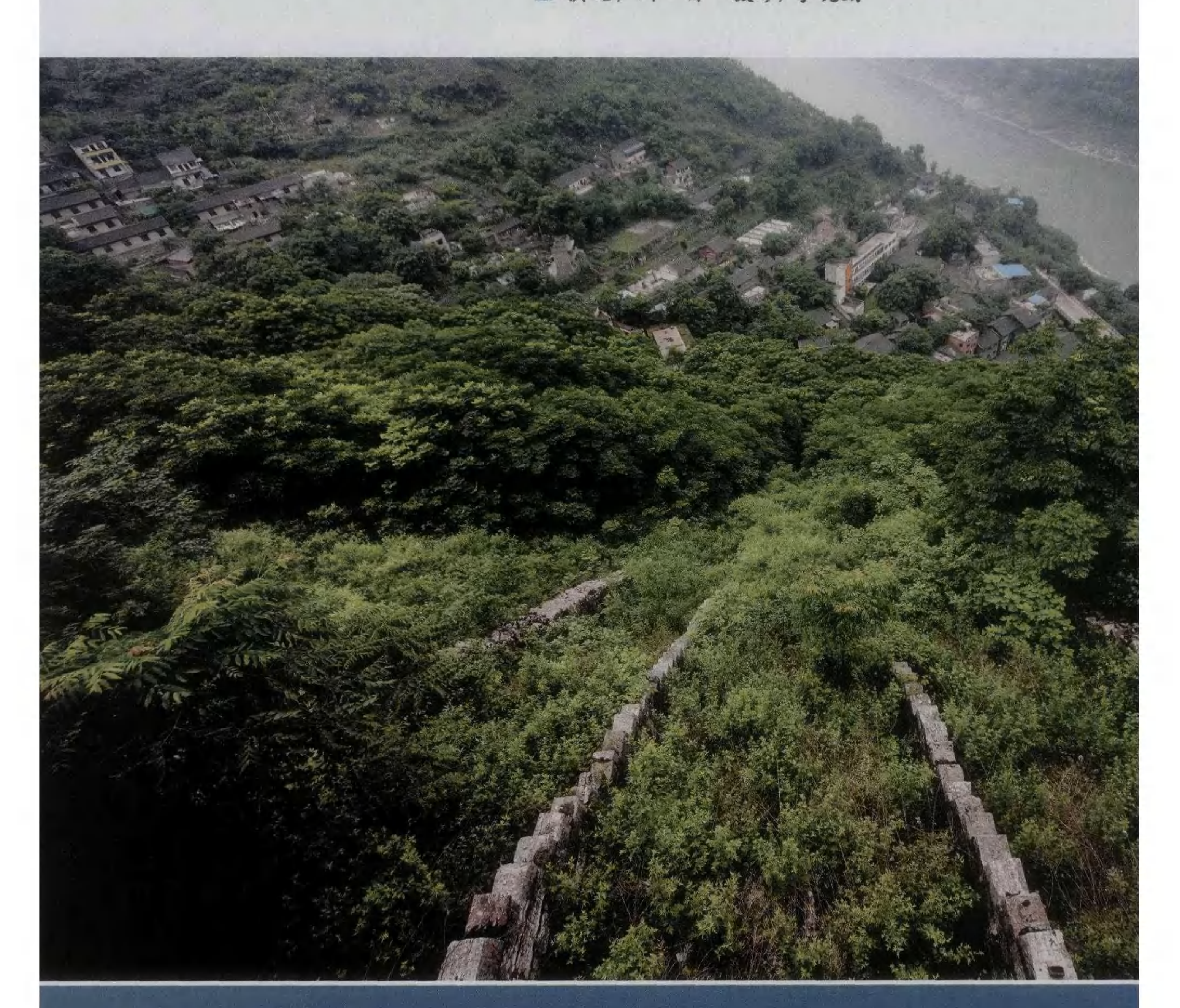




□ 从特等站到四等站，车站外墙上挂着的这件法式钟表，见证了碧色寨一百多年来的兴衰变迁。空荡荡的轨道，人去楼空的洋行，一个曾经属于碧色寨的浮华时代，悄然结束。摄影／王牧

重庆北碚
文星场的美丽与哀愁

■ 撰文／刘一苗　摄影／李晓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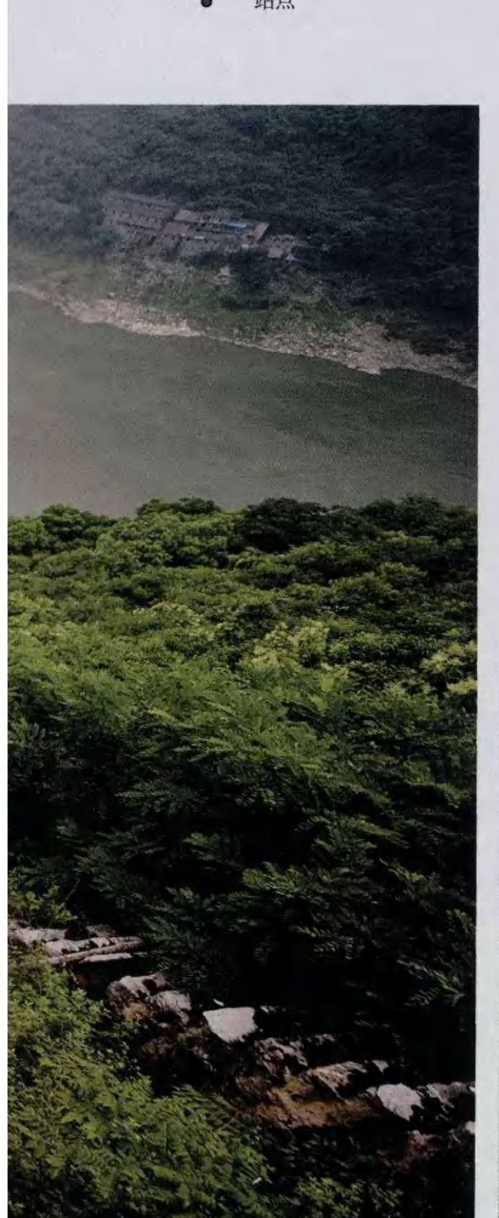
□ 从重庆白庙子码头边矗立的绞车站向窗外望去，运送货物的梭槽早已被郁郁葱葱的灌木丛覆盖，山脚下是静谧的民居。更远处则是依旧湍急的嘉陵江，只有它才知晓，七十多年前，这里曾是名噪一时的老北川铁路的终点，这里曾经是多么的繁华与兴盛。

北川铁路路线图

图例

- 当年铁路
- 现有铁路
- 站点





太阳难得地灿烂了一回，它柔和的光芒洒在身上感觉暖洋洋的。

走在去文星场的路上，76岁的吴四海（化名）还穿着厚厚的棉衣。

这是2011年的3月，春天刚到，乍暖还寒。

文星场，位于重庆北碚，是清末建造的一个集镇，离北碚大约10公里，因该地有座文星庙而得名。

我遇到吴四海，是在文星场一条已被废弃的窄轨铁路边。我们都为这条铁路而来。

与这条铁路相连的，是我童年哐当哐当的一段美丽记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乘坐那吐着白雾，冒着黑烟的蒸汽小火车，是正年幼的我最快乐的生活。那时，每逢节假日，我们一家人便会从北碚嘉陵江对岸的黄桷树坐火车到代家沟，然后又走路去文星场看我父亲的姑妈，也就是我的姑婆。当时，通往文星场的火车早已停运，从黄桷树到代家沟，是这条铁路上惟一一段还在运营的线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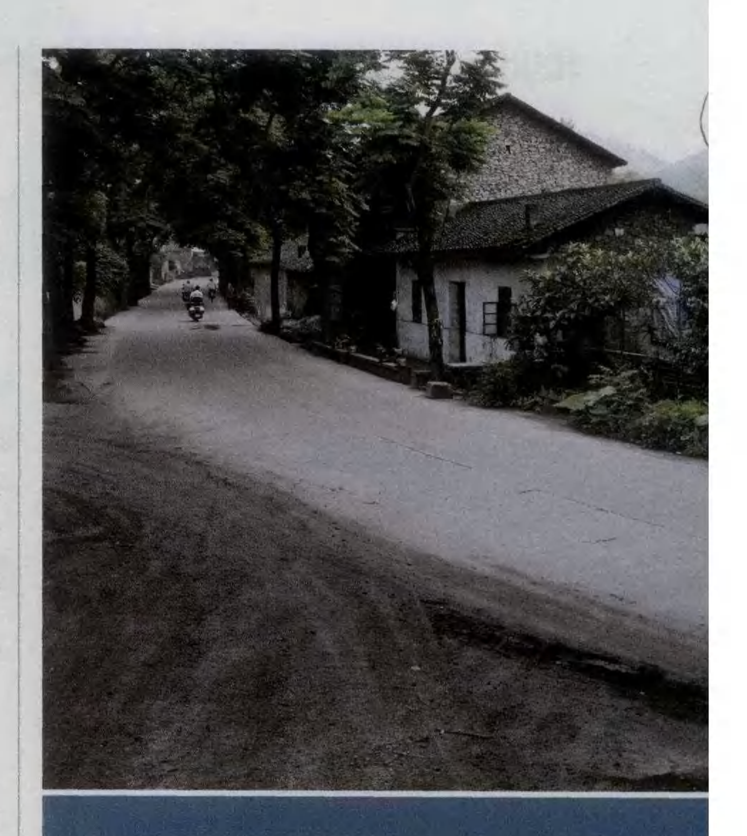
文星场和这条铁路对于吴四海来说，远比我有着更深刻的情感与更鲜活的生活片段。因为，文星场是他的故乡，而这条铁路又曾是他工作的地方。

走在今天的文星场，时间仿佛止了步，一切如昨，街上的房屋还是几十年前的旧物。穿行在众多老旧的建筑里，吴四海向我仔细介绍着它们的年代。写着伟人语录的矿部办公楼、职工宿舍锈蚀的

管道和脱落的电缆、柱廊上隐约可辨的革命口号，还有图书室小黑板上的借阅规定。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的兴盛和稠密。

已被拆除铁轨的火车道，在碎石中若隐若现，路基已变成一条机耕道，积水成潭，荒草萋萋。吴四海用手拨开草丛，突然，“扑楞楞”飞出几只小山雀，箭一般冲向云霄。

谁能想到，这条静静在荒草中蜿蜒的铁路，曾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卢作孚主持修建的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它记载着一代人的工业强国梦想。在历史的转弯处，这条铁路来了，又去了，而它沿线城镇的命运，以及许多与此相关的普通人的命运，都被这条铁路改变。



□ 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总能让人萌生许多感触。右上图为1942年天府矿业有限公司水岚垭火车站，车上满载着煤炭，一派繁忙的景象（供图／重庆天府矿业）。上图是从代家沟到后丰岩的公路，它正是建在老北川铁路的路基之上。铁路来了又去了，它沿线的城镇与人的命运，便随之起伏。

起点与高潮

北碚原属于巴县，位于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之间。因为盗匪出没，四县特设峡防团务局以资整治。1927年春，34岁的卢作孚接掌峡防局。

那时的北碚，河运梗塞，商贾难行，街道脏乱狭小，没有工厂作坊，烟馆赌场横行。怀着实业救国、改革出新理想的卢作孚，决定将此地作为自己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实验平台。

北碚文星场地区，地处华蓥山脉以西，已有200多年的煤炭开采史，煤藏量极为丰富，据当时已探明资料表明，其煤储量位居四川之首。上世纪20年代初期，有大小数十家企业在此开采，年产原煤60万吨左右。煤矿资源虽然丰富，但大大小小的煤矿都分布在深山老林之中，开采出来的煤，全靠人力肩挑背扛运输。当时每天有6000多名挑夫穿行在山间小道上，要走20里才能运到嘉陵江边，每年仅运费一项，就占了煤业成本的大半。

为了开发峡区，发展煤业，卢作孚意识到必须改变煤炭运输的落后状况。于是，他极力促成组建起了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并被推选为董事长，定股本总额为30万元。1928年11月6日，北川铁路破土动工。原胶济铁路总工程师丹麦人守尔慈被聘请为北川铁路总工程师。

整个工程分三期进行，建成一段通车一段。在修建铁路的同时，卢作孚还邀集了6个较大的煤场组成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路矿合一，将生产与交通联系起来。

1934年4月1日，随着一枚金色道钉被钉入铁轨，全长16.8公里的北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一列轰隆隆的火车，拖着长长的煤厢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长长的汽笛声，打破了华蓥山脉的寂静。从大田坎、大岩湾、代家沟、土地垭、郑家湾、后丰岩、文星场、万家湾、麻



> 1934 年 4 月 1 日，**随着一枚金色道钉被钉入铁轨，全长 16.8 公里的北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一列轰隆隆的火车，拖着长长的煤厢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

柳湾、水岚垭，直到嘉陵江北岸观音峡山岭上的白庙子，沿途 11 个车站的站台上都聚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看稀奇的乡民。

煤业和其衍生的铁路运输事业，是卢作孚继民生公司之后，在北碚组建的另一个大型企业集团，也是他提出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有力实践。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北碚从一个穷僻山乡被建设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缩影”的美丽城市。1936 年，黄炎培先生到四川考察后，在《北碚之游》里写道：“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

抗战时期，国府迁渝，北碚成为文化迁建区，陶行知、梁漱溟、老舍等大批文人学士云集，国民政府有近 200 个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迁建，还有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迁入，人口猛增，热闹非凡，被称为陪都中的陪都。去北温泉、缙云山，乘船游览嘉陵江小三峡，到天府煤矿去乘坐铁路火车，一时成为当时重庆各界人士的旅游时尚。

1979 年，梁实秋在台湾“雅舍”里写下了一篇怀念北碚雅舍的文字，字里行间也有北川铁路的影子：“……有时看到下面稻田之间一行白鹭上青天。有时看到远处半山腰呜的一声响冒出阵阵的白烟，那是天府煤矿所拥有的川省惟一的火车……”



北川铁路建成后，带给北碚的繁华，在来往北碚的人影中即能看出。当年，亦是因为重庆成为陪都，北碚成为文化迁建区，大批文人学士云集，图1即为茅盾、老舍、于立群（从左至右）在北碚的合影。此外，北碚还有大批与铁路有关的外国技术人员进驻，图2为1934年北川铁路总工程师丹麦人守儿慈全家在北碚的合影。供图／重庆北碚区政协

北川铁路的轨距仅 732 毫米，被称为“寸轨”，只有普通列车轨距的一半左右，其火车堪称袖珍。然而，就是这样的小火车，在时局动荡的年代，为战时的中国输出了宝贵的能源。

据 1943 年的陪都国民政府统计，大后方的能源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北川铁路。其中兵工占 55%，航运纺织占 85%，发电占 60%，由天府煤矿从北川铁路输出。源源不断的煤炭经由这条铁路向外运输，以文星场为核心的天府煤矿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

文星场的春天

北川铁路的建成，在当时的四川乃至全国都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它不仅系私人集资所建，而且是在地处穷乡僻壤的山沟里修建起来的。它让铁路沿线一个个的小乡场从几户人家，发展成近千户的热闹市集，闭塞的交通被打通了，普通山乡民众的生活被铁路照亮了。

山林深处的文星场，原本场镇规模很小，只有一条老街，破破烂烂。街上一律是两层的穿斗房，整齐但沉闷。北川铁路和天府煤矿初建时，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场所，只得将这里的文星庙利用起来，用作工程技术人员的办公室。煤业和铁路运输兴起后，文星场发展很快，人口也渐渐增多，老街延伸出了几条偏街，纷纷开设了布店、诊所、旅店、饭店、茶馆、副食杂货等，还修建了不少供职工住宿的工房。

自从北川铁路通车后，天府矿区所辖的所有煤矿的煤都由文星场调运。铁路傍文星场街边而过，寸轨铁道上跑着黑乎乎的蒸汽小火车，它还



未到，就能远远地听见它震动铁轨的垮垮声音和它激昂喷气的隆隆声响，带着劲，挟着风，急匆匆地奔向远方，把个山间和村镇喧闹得生气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北川铁路虽为运煤而建，但又不完全只具运煤的功能，它同时还开有客运专线，方便沿线的民众出行。小火车的客运车厢比普通火车车厢小，车厢与车厢之间没有可以通行的走道，而是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木制的长椅分布在车厢两侧，简陋而生硬。逢赶集的时候，沿线的村民会乘小火车前往集镇采购或者贩卖生产、生活资料。那时在各个车站很容易看到赶猪上车的情形，即便体型更为庞大的耕牛也是小火车的“乘客”。当时，乘坐这样客货混装的小火车，也是岳池、广安等地百姓到重庆城的主要交通工具。

交通运输的便利，使得“进来”和“出去”在文星场变得容易。1952 年，17 岁的吴四海就是从文星场的家门口乘坐北川铁路的小火车来到外面的世界当兵。

在北京卫戍区服役 5 年之后，吴四海转业回乡。当时的他本来被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但当他听家里人说，天府煤矿有招工名额，并且是开火车的司机时，他毅然放弃了公安局的工作，回到了熟悉和热爱的铁道边。

“现在的人肯定觉得不可思议，为了当一个火车司机，丢掉那么体面的工作，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开火车对我更有吸引力的事了，因为我太热爱火车了。”

在那个年头，能当上火车司机是许多男孩子的梦想。而窄轨上扑哧扑哧跑着的小火车，在吴四海心里留有最温暖的印痕。在很多个睡不着的黎明，因为一声悠远的汽笛，那些尘封的往事一一被惊醒，栩栩如生，直逼他的内心。它们象小火车头那样，牵引着昔日重来，让人不能自已。那时的他，会和父母一起清扫从车上散落下来的煤炭，会飞身吊到车上，尝试铁道游击队的风姿，还会坐着它到后丰岩去玩耍。铁轨，也是他散步清闲的好去处，站在一条窄窄的铁轨上，一摇一晃地在上面行走，比谁走得稳走得远……

原来，那个铁路边的少年，一直不曾离开。

吴四海终于开上了蒸汽火车。在火车头里，炉膛里的火焰映红了师傅和他的面庞，狭小的空间洋溢着温暖的气息，他拉响汽笛，如此近距离地触摸它、亲近它，像握着多年未见老朋友的手，那份欣喜、满足无以言表。

民国老铁路之殇

上世纪 50 年代，文星场对面的山坡是简厂沟煤矿，出煤的井口类似于如今常见的隧道，井口段是水平巷道，一列列运煤车出出进进，十分繁忙。

运煤车经缆车接驳，将煤倾于车站旁的储仓，

储仓底是一个斜面，前面是闸门，打开闸门，滚滚的乌金流入专用的运煤车厢，经火车头牵引，转赴白庙子车站，经嘉陵江由船运往重庆市内外。

那时的嘉陵江岸，上百座煤坪堆积如山，成百条运煤船遮住了半条江。吴四海驾驶的运煤火车到白庙子后，他会将闸门纷纷打开，那乌黑的煤炭，沿着山岭上的几道数百米高的输煤梭槽，如洪水向下倾向江边。山上机车轰轰隆隆，车笛声声；江上波翻浪滚，船笛阵阵。每年白庙子有50万吨煤炭，通过嘉陵江这条“黄金水道”运到江津、宜宾、乐山等沿江几十座城市。

如此壮观的输煤场景可谓当地一景，不过，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后,受煤矿产量减少的影响，嘉陵江上这样的场面就日渐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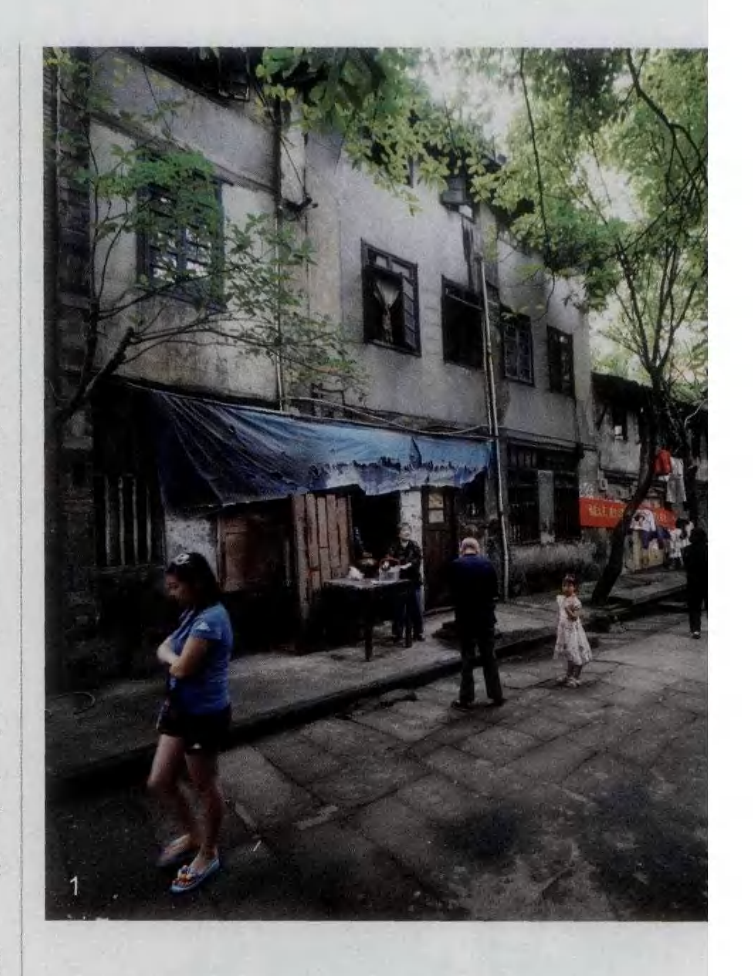
矿井的萧条，出乎意料的快，井一封，工人和设备相继转移，剩下的是许多空无一人的工房。随着天府煤矿新矿区的开发，北川铁路沿线原有的许多煤矿失去了开采价值，受此牵连，沿线铁路开始被逐步拆除。

1979年的新年刚过，吴四海接到领导的转岗通知，要他准备到采煤队上班。当时的天府煤矿刚刚开始进行重组合并，新成立的天府矿务局还未正式挂牌。吴四海尽管已经有所预感，但当事情真的降临时，他还是傻眼了，因为在七八个同事中，他是第一个被通知转岗的，那年他44岁，从火车司机变成采煤工。

退休后的吴四海常常邀约当年一起工作的老伙计，回北川铁路上走走。小火车走了，但布景还在——曾经有小火车驶进驶出的山洞黑漆漆的，仿佛神秘的时光隧道入口；走着走着，路边出现几节车厢，七零八落地躺在那里；有的铁轨已经被拆除，有的则被埋在黄土之下……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离北川铁路不远的地方，1979年年底通车的襄渝铁路一派生机盎然，一列列货运列车满载乌金穿矿区而过，运煤通道大开。

吴四海望着国铁上飞驰而过的一趟趟列车，眼神不无羡慕。



1

谁的痛与伤

奔跑在窄轨铁路上的小火车消失了，文星场又归隐于宁静之中。如今，在它周围的山沟里，早已关闭的简厂沟煤矿敞着黑黑大口的井口还静卧在那里，如山般的煤矸石堆像长龙似的铺在山沟中。天府煤矿能生产煤炭的矿区，早已离此地几十里外，在一切事物与物质条件紧密相连的今天，文星场已失去了必要的依托。

火车走了，但它带不走的，是因多年开采而在这里留下的矸石上重新改造的含硝的贫瘠土地。又由于煤矿的深层挖掘，使得地下水断流。

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黄玉清尤其怀念小时候的文星场，“那时候，这里山青水秀，河沟里的水捧起来就可以喝。但是现在，水源早就被破坏了。”



□ 火车来去之间，北碚也随之经历了兴与衰。老照片上，抗战时期的北碚是何等的繁华，道路宽敞，规划齐整，高楼林立（图2 供图／重庆北碚区政协）。这与如今北碚的日渐萧条、冷清（图1），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没有了水，庄稼也无法成活，原本草木茂盛的青山如今变成了荒山，地里的庄稼只能是"望天收"。文星场已变得颜黄肌衰。

危害接踵而至。经过多年的开采，文星场已成为沉陷影响较重的地区，其地下已经被挖得四通八达，场镇一带地下基本成为采空区，很多房子都成了危房。

吴四海的家就在文星场正街的丁字路口附近，是50多年前修建的工房。他发现房子出现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水泥地面被扯出十多道裂缝，床头、厨房的墙壁都出现开裂"。

2000年，吴四海在成都工作的儿子担心父母的安全，强行将他和老伴接去成都生活，老房子空了。

"这里的社区全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没人修新的。"黄玉清说，镇上有能力一点的或者年轻人，都已经陆续搬走了，街道开始变得冷清。

不只是文星场，北川铁路沿线的场镇几乎都有着共同的遭遇。它们最初因煤和铁路而兴盛，后来，又因煤和铁路而衰败。但这是它们最终的命运吗?

"北川铁路所到之处，不是在大山里就是沿江峡谷，可以说沿途都是风景，如果搞旅游业应该是很有价值的。"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利用西南第一条铁路旧址这一历史资源，整合天府煤矿片区、白庙子片区等，打造国内知名的工业旅游地、矿山文化展示地……"北碚区规划分局制订的《北碚天府采煤沉陷区生态景观恢复规划》，似乎向人们展示了北川铁路未来的重生之路。

不过，这个规划从2009年就开始对外宣传了，但直到今天也没什么动静。

责任编辑／戴莹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刘扬

山东即墨
是否寂寞？

■ 撰文／张兴军 摄影／王凯 等





胶济铁路路线图

图例
现有铁路
站点

“这是一个铁路线上的小站，只有慢车才停靠两三分钟，快车一转瞬间疾驰而过，旅客们甚至连站名还来不及看清楚。就在这一转的瞬间，你也许看到一间红瓦灰墙的小屋，月台上几根漆成淡蓝色的木栅栏，或者还有三五个人影。”

这是入选过小学课文的袁鹰的《小站》，曾感动了很多人，也唤起过无数人的记忆。然而，从 1997 年至 2007 年的火车大提速，却让众多小站连这两三分钟的停靠，都变得奢侈。

山东胶济铁路线上的即墨，即是如此。2007 年 4 月 18 日，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胶济铁路正式运行“子弹头”——动车组，提速后，胶济铁路即墨至高密区段，客车时速达到 250 公里，为全国铁路最高时速。高达 250 公里的时速和胶济线缩短到两小时的旅程的结果是，有 20 个小站被甩掉，其中之一，便是即墨站。

即墨距离青岛仅 40 公里，也许这样的路程难以使 D 字头的列车在此停留，或者是即墨城市的地位本身，难以与济南、青岛这样的大市相提并论，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即墨终究是作为一个四等小站而被停办了客运业务。想去即墨市的乘客，就只能先到青岛，再转乘汽车。

停运后的即墨站真的寂寞了，每天它以“守望者”的姿态，为经过的 27 对客车和 12 对货车通行提供信号引导服务。寂寞的还有，车站出站口附近的小卖部。提速前，小卖部的生意极好，店主杨大娘说：停的车多，人来人往，和老伴儿都忙不过来。但随着提速的到来，生意也像那一次次被减的车次，越来越少，越来越淡。如今，老人干脆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上了蒜苗、菠菜，养了十几只小鸡，一派农家风光。

晚清山东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是 1899 年至 1904 年间德国人耗费 5920 万马克，修建的贯通山东腹地、联通省会济南与青岛的

□ 百年即墨站，真的寂寞了。当我们的摄影师，费尽周折来到这个已经废弃多年的车站时，感受到的只有满目荒凉，甚至许久都等不来一个人影。数次铁路大提速，已然抛弃了小小的即墨车站，也抛弃了即墨这座古城。

胶济铁路。历史资料显示，为了牢牢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人在胶济铁路上的设站相当密集，全线近400公里设站达55个。平均下来，站与站之间的距离也很短，一些地段每隔8公里就有一个站。即墨，正是胶济铁路最早的车站之一，始建于1901年。与胶济线上别的站不同，德国人之所以设站于此，应当还与其辉煌的历史分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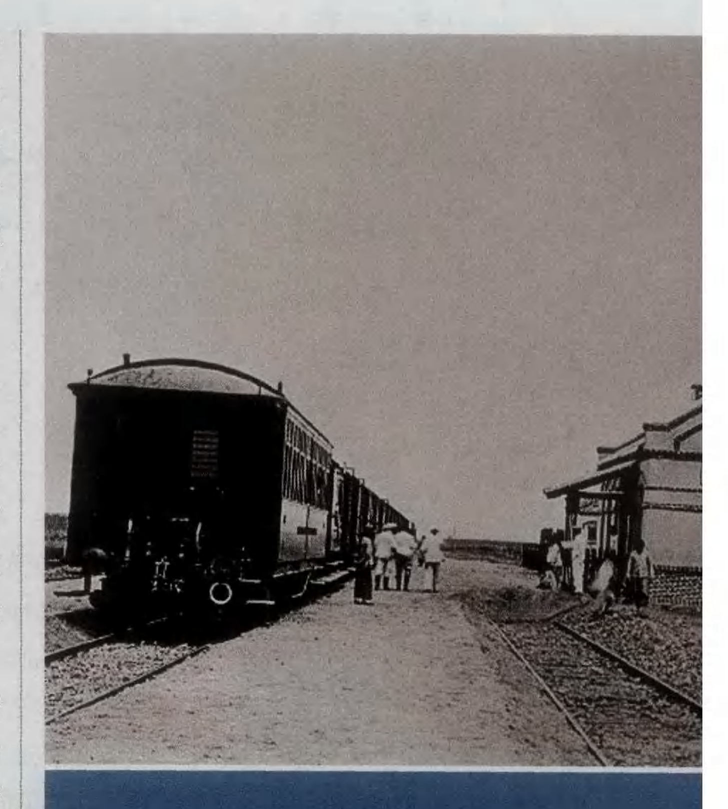
即墨古城，曾因坐落于墨水河之滨而得名，春秋时属齐国。至秦时，设即墨县。《战国策》、《国语》、《史记》中均见其名。1901年，随着青岛到胶州段的建成通车，即墨就以“南泉”为前身，在历史的周转变革中走进了现代的视野。直至1994年老南泉站拆除，在原址西边一百多米处建立了今天的即墨站。

历史上，即墨分别归属于青州、莱州、青岛、烟台。鲜为人知的是，今日铁路、航运更为发达的枢纽城市青岛，历史上一度归属于即墨管辖，然而风水轮流转，青岛因为地理优势，使二者地位逐渐转变，并且自1958年即墨改属青岛后，其行政归属至今再无变更。

有铁路之后，即墨在这种速度快、成本低的交通方式的影响下，经济、文化、旅游等事业，一度皆盛。即墨的庙会盛事就是与交通联动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文化项目。

即墨多山，其一曰东京山，面临鳌山湾，西与东崂之秀鹤山毗邻，风景优美，海光山色得天独厚。每年山里均有庙会，为其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客运列车经停的时候，每逢庙会，凌晨开始，就有游客陆续上山，商贩以及外地的游客则从周边各地赶来，最多时一天可达5万之众。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踩街”，来自本地的居民与外地的游客多达十万。

百年铁路史，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在全国百强县里，它还占有一个名额，甚至在福布斯的中国县城排名上，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在青岛五市里，即墨地位排名第一。这些都和交通的便利密切相关。



□ 1901年，随着胶济铁路青岛到胶州段的通车，即墨车站就以“南泉”为前身诞生了。老照片里，荒野上的即墨车站格外引人注目，乘客上下井然有序（供图／王栋）。而如今，一张铁门将即墨站与高铁时代分离，铁门上的告示十分醒目：本站停办客运业务。

然而这一切，在火车不再经停即墨之后，便有了变化。据即墨市公开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在2007年提速之前，即墨市的经济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基本都维持在20%以上。但提速之后，这个增长率减低到15%左右。此外，招商引资在2007年提速之后，也步入低谷，比如2006年外资到账1.75亿美元，但至2009年这个数字仅仅提升了0.13亿美元。

三四等小站不再经停所带来的影响，也并非一朝一夕就可显现殆尽。比如出行的成本与便利性，便打了折扣。打个比方，倘若要从即墨出发去青岛，只能选择乘坐汽车，2.5元的票价变



> 站在弱势的城市角度上看，那些地图上不太明显、不具资源优势的三等、四等小站，**正以所谓的“小小代价”，成就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成了8元，舒适性也不如火车；而如果要去济南，坐汽车需要承受从20多元涨至70多元的票价，或者要先乘坐火车到蓝村或青岛转车。

诸多不便，会让想来的人或生意因为要多费些周折，而望而却步，这其中损失，大概也只有即墨人才有深刻的体会。

但凡一地经济、文化的繁盛，无不与交通、政策紧密相关。比方说有着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其内水路异常便捷的三镇：武昌、汉口、汉阳，都因建构在一个便利的交通之上，方有今日之地位与荣耀。而小城镇，受本身资源、地域、规模等限制，本已不具经济、政治等战略要地的位置，若再失去交通的便利，无疑会更加拉大其与周边重要城市的差距。

在经济发展的成本和小城自身的客观条件等的考量上，即墨显然是火车提速的牺牲者。不过，也有迎来火车恢复经停的幸运儿——花园火车站。

距离即墨千余公里的湖北孝昌县花园火车站，2007年也是曾被提速的火车甩掉的百年老站，被宣布甩站几个月后即恢复少量列车停靠。其中有段颇为曲折的故事——得知提速后花园火车站将会被彻底甩站，孝昌县的吴涛先生在当地网站上写了一段文字，请大家关注此事，引起较大反响。不到十天，孝昌县支铁办公室回复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称："百年老站停办客运业务，县委、县政府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沉重的，其对孝昌经济社会发展、军民共建等方面必将产生消极的影响……保留客运列车停靠，也是地方政府的迫切需要，……对此项工作的争取，县委县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或许，正是这万众一心的诚意和努力，才又让百年老站恢复了生机。

其实，讲述小站的故事，并不复杂——几个摊贩，数位路人，一个商场从喧嚣到沉寂，一个行人的切身体验，足以构成小站被人忽略的局部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在如今对铁路更多关于速度与经济的考量中，显出了一丝悲凉意味。

从 1997 年 4 月到 2007 年 4 月，在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进行 6 次列车大提速，而如今火车也已正式步入时速 300 公里的"追风时代"。2008 年，高铁又进入了"大跃进"时代，我国每年新增铁路投资 3000 亿到 7000 亿元。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几年间，又有多少三、四等小站被牺牲了呢？据了解，第五次提速以后，全国数以千计的四等小站就已经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第六次提速，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

对于铁路提速，有赞同，也有反对，争论的主体既有关乎着切身利益的当事人，也有全盘思考的学者。有说铁路提速进而甩站，无异是嫌贫爱富，终将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城镇格局；也有人说提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现有的条件下，这是相对最为科学的选择，不得不让一些人做出牺牲。

但是，作为公共事业的铁路，嫌贫爱富地选择站点停靠是否应当？对小站的遗弃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阵痛代价，还是一种盲目的厚此薄彼的行为？这类问题，始终充斥于列车六次提速的整个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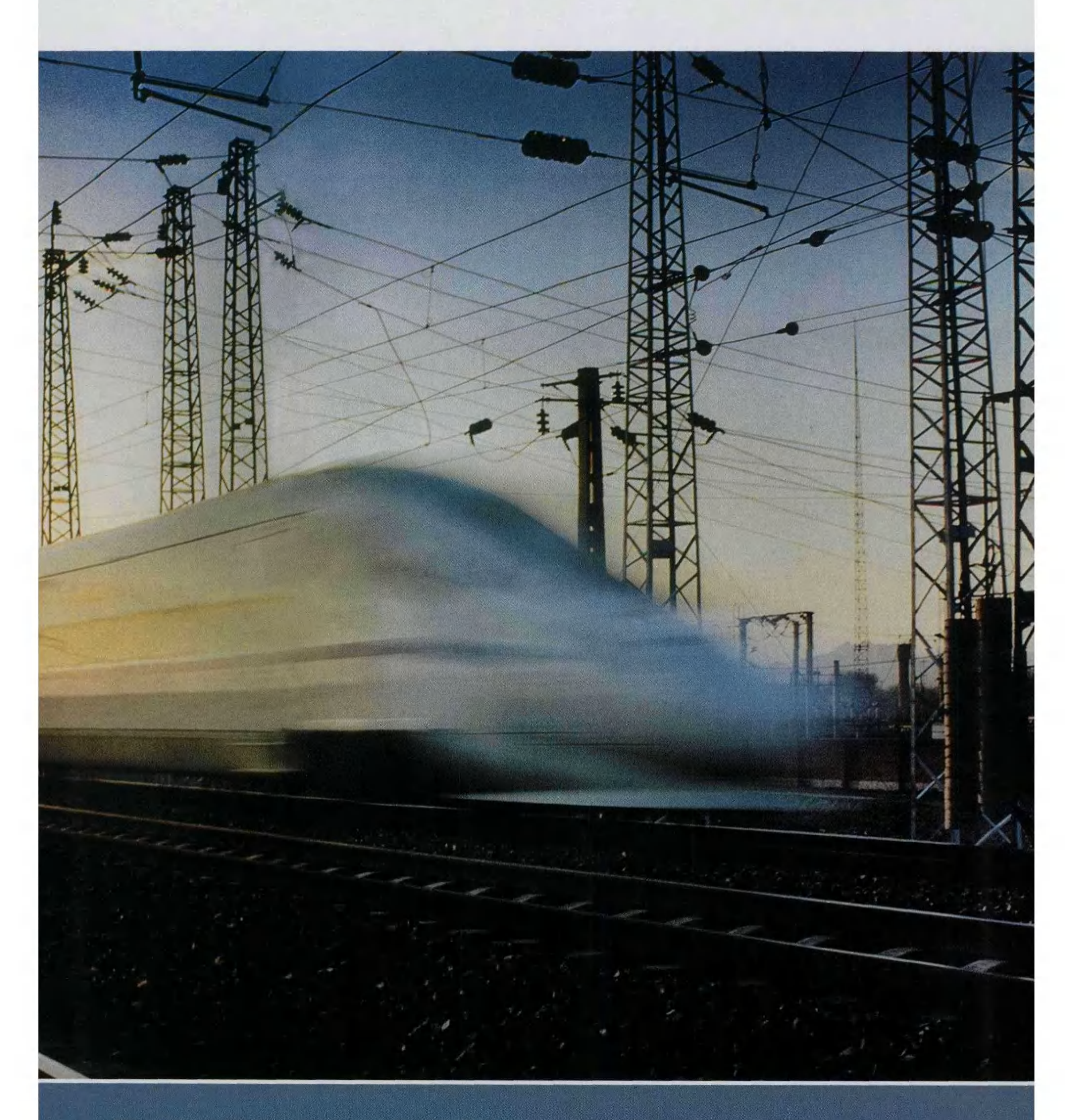
百年以前，出于经济联系、资源联运、国防与战事需要等综合考量相结合的原因，使铁轨穿山越岭，在联结了大城市的同时，也延伸至静谧的小镇和边缘的小城，在带给这些小城镇以前所未有喧嚣的同时，也给小城镇带来兴旺的机会。然而，跨越百年的战争、内乱之后，列车在和平年代却选择从它们身边呼啸一声，疾驰而过，不再停留，且异常决绝。这难道是社会的正向发展？

戏剧性的是，就在 2007 年第六次列车提速的同时，某直辖市的铁路局委员会还曾举办过一次"铁路提速，让生活更美好"的征文比赛。那些被甩掉的"相对不重要"的小站、小城，生活会更美好吗？

站在弱势的城市角度上看，那些在地图上不太明显、不具资源优势的三等、四等小站，正以所谓的"小小代价"，成就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责任编辑 / 戴莹 图片编辑 / 余荣培 版式设计 / 刘扬



□ 飞驰而过的高速列车，每日繁忙地穿梭于全国各地，被它们抛弃的三、四等车站和小城镇不在少数。这值得世人深思，难道我们真的要牺牲所谓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人们的利益，去换取更大的经济发展吗？摄影／邹毅

芭石铁路
慢下来的风景

■ 摄影／王福春



山民们各自抱着心爱的动物，倚在火车完全镂空的车窗前，由是构成了一副和谐的画面。这趟全国仅存的窄轨蒸汽机小火车（也称嘉阳小火车），每日开行4趟，接上沿途的山民。实际上，它每一站的间距都不长，其中芭沟站到焦坝站的距离仅1400米，火车只需不到两分钟便能走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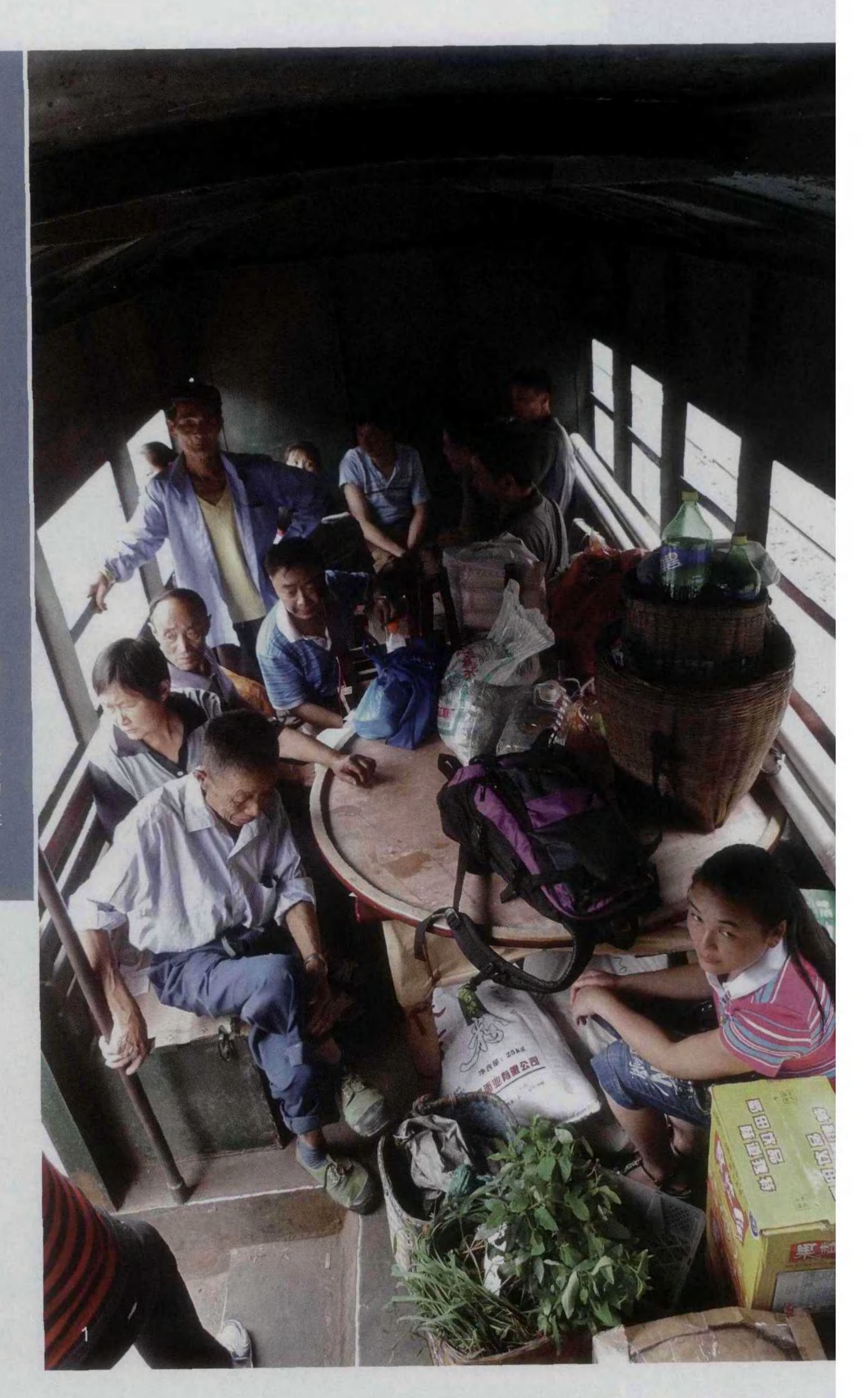
编者按：

30迈的时速，带来一窗和煦的风，伴随着哐当哐当的声响和摇晃的车厢，能看到窗外缓缓掠过的绿树翠竹、古朴民居、层层梯田——这是摄影师王福春在芭石铁路的小火车上，领略到的慢下来的风景。芭石铁路位于四川乐山犍为县大山深处，是当初四川嘉阳煤矿为运送煤炭而修建，后来成为这里山谷丘陵地带的人们走出大山的惟一交通工具。它从1958年开始运营，连接了从石溪到黄村之间的8站，全长19.84公里，单程仅有80分钟。王福春将这种与高铁上的极速体验大不相同的感受，延续到了照片中。慢下来的风景怡人，慢下来的节奏也能顾及到山区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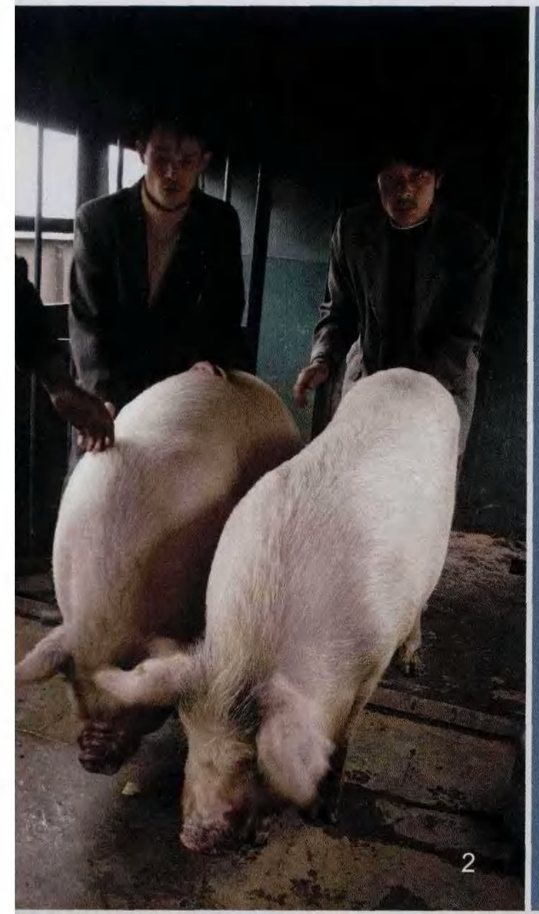

2

□ 由于火车的速度很慢，所以住在附近的人们，会搬张桌子摆在站台上打麻将，等车的人们即在一旁观战（图1）。甚至还有人挑着蜂窝煤上火车（图2）。图3中，赶去上学的孩子们也会选择乘坐火车，不然路途过于遥远。一旁的售票员则在不慌不忙地检票。据了解，当地山民仅需3元便能达到沿途各站。


ANG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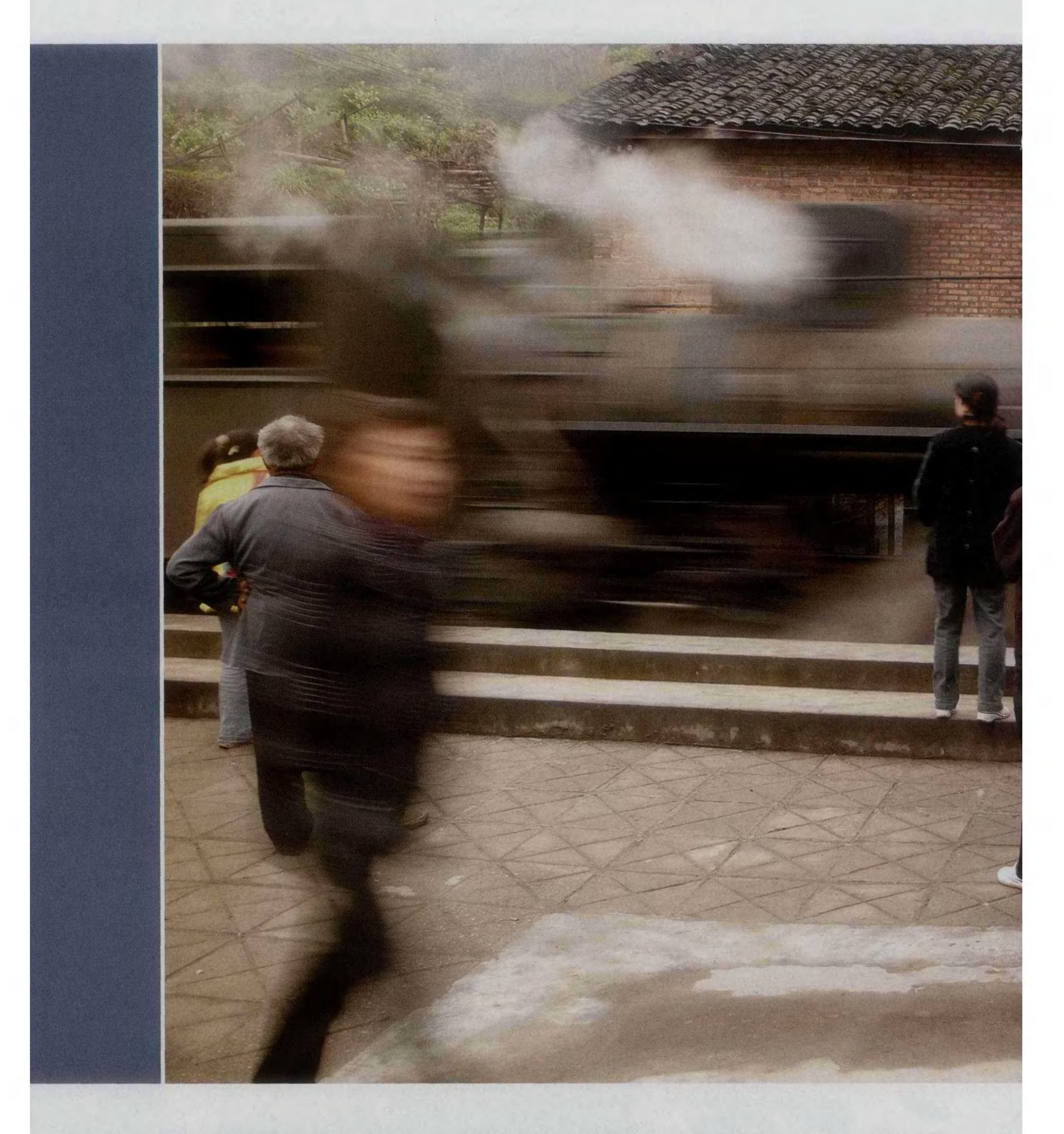


□ 小火车车厢内，即是一个小小的社会——或坐或立的山里人，淳朴而安静；竹篓、新鲜的山货、赶集采购的物资，拥挤却齐整地摆放着；甚至谁家吃饭的圆桌，也出现在了车厢内（图1）。人畜共载，是芭石铁路的另一特点。图3中的猪、狗、鸭、鸡等，都安然“坐”上火车，在王福春的镜头里，显出一种别样的“人”味。有意思的是，火车还为大型的牲畜设置了“雅间”，图2中的人们正将生猪赶出火车上特定的猪圈。



当我看到那原始、古老、冒着黑烟的蒸汽小火车，拉着破旧的铁皮车厢，载着背篓里装满新鲜山货的山里人，缓缓穿行在山间田野时，真是兴奋不已。**特别看到牛马羊猪和大包小裹的货物与人同车时，让我忘掉了每天连续往返四五次行程的疲劳，一拍就十多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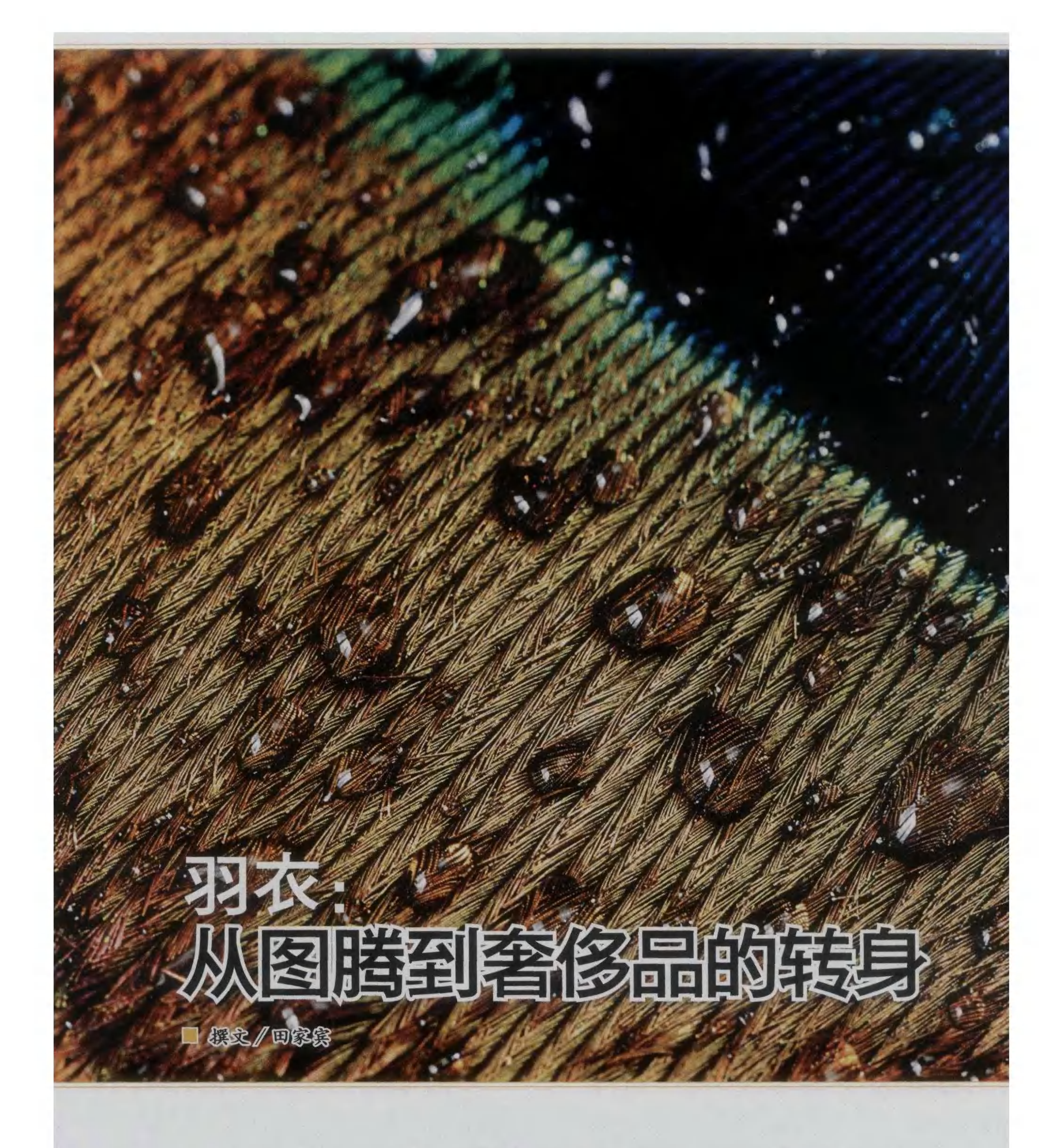
——王福春



■ 蒸汽机车头，喷吐着白烟，从站台出发，驶向下一个车站。没有赶上车的乘客，依旧在小站里徘徊。这慢悠悠的小火车，行进了50余年，解决了众多山民的出行。然而，摄影师在拍摄中也听到这样的声音：小火车速度太慢，有时间限制，不如拆了修更快捷的公路。那么，芭石铁路上的小火车，作为一个时代的背影，还能坚持多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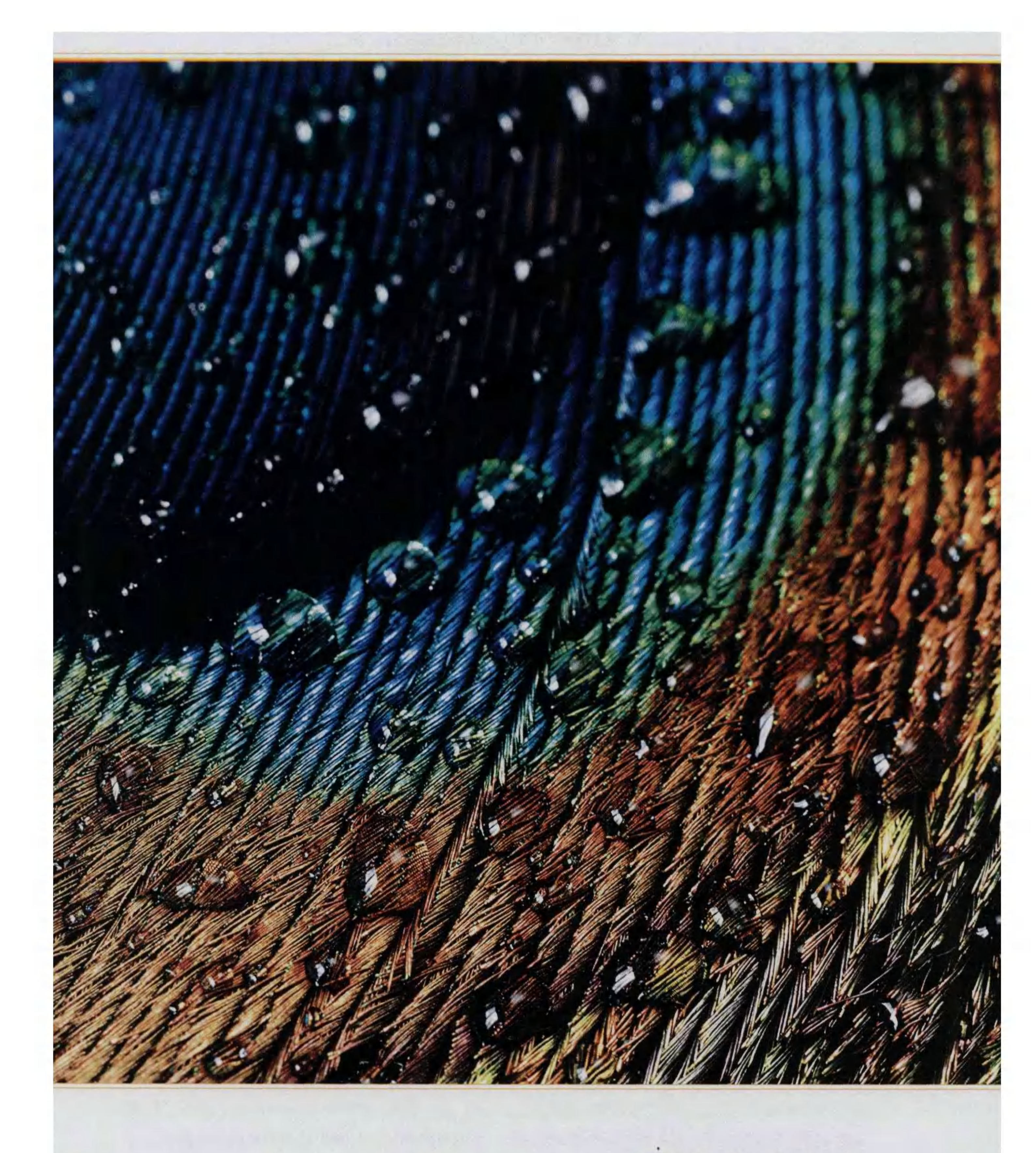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戴莹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刘扬



羽衣：从图腾到奢侈品的转身

■ 撰文/田家宾

究竟自何时起，人们就将羽毛穿戴在身上？这似乎是个谜。然而与后世人们对羽毛的喜爱相比，谜的答案已不再重要。看，汉代为数众多的精灵般的羽人，唐代轻盈美丽的霓裳羽衣舞，明清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孔雀华服，以及今天与时尚并行的各式羽衣，哪一样不让你动心呢？正是在这演进的历程中，羽衣，完成了从图腾到奢侈品的华丽转身。



美轮美奂的色彩与图案，正是孔雀羽毛的一部分。崇尚和喜爱羽毛的人们，想方设法地将它们穿戴在身上，演绎出了别样的风情与故事。

天刚蒙蒙亮，荣国府内还很安静。由于要出远门，宝玉轻手轻脚地来到祖母的房门外，等着给她请安。不一会儿，房门便打开了，贾母疼爱地看了看宝玉，觉得天气有些凉，便让侍女鸳鸯拿出了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给他，并笑着说："这叫作雀金呢，是哦（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就剩下这一件了，你糟蹋了，也再没了。"

这一幕出自《红楼梦》的第五十二回。文中提到的雀金呢，作者曹雪芹用了八个字来形容——"金翠辉煌，碧彩烱灼"，即在金光浮动的地子上，用孔雀羽线织成的深翠花纹，莹莹烁碧，看上去异常华丽。如此之美丽的羽衣，连见多了奇珍异宝的贾母也声称"就剩这一件了"，足见其珍贵。

一直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家即以曹家为原型。而曹家又曾任江南织造，掌管着皇家最高等级服饰材料的制作。那么，被曹雪芹形容得如此华贵的羽衣，或许正是当年他亲眼所见。如此说来，用羽毛做衣服，应该算是古代贵族服饰的一种风尚。而这风尚的形成仅仅是因鸟类羽毛珍贵吗？还是因制作时需要复杂工艺？要解答这些疑问，得先追根溯源，看看究竟从何时人们开始使用羽毛？为什么要用羽毛？

鸟类的后代？

人类使用羽毛的原因无外乎两种，首先是图腾崇拜，其次才是美观漂亮。遍翻历史文献，《诗经》中记载的"玄鸟生商"，可能是最早与鸟类崇拜有关系的典故。

据说，在尧帝统治时期，有一年春分时节，娀（sōng）氏的几个女儿在玄丘洗澡。突然天空飞来一只玄鸟，即燕子，嘴里衔着一个五彩斑斓的卵。一不小心，卵掉到了水里，几个姑娘顾不上洗澡纷纷去争抢。最大的姑娘简狄身手灵巧，一把将卵抢在手里，然后迅速放在口中，以免被妹妹们抢走。就在姑娘们打闹嬉笑的时候，简狄不慎将卵吞入肚中。待回家之后，简狄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不久即生下了一名男婴。

这名男婴自然非同凡响。简狄为他取名为契，并教他掌握天文历法。契长大后，曾辅佐大禹治水，得到了舜帝的奖赏，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叫做亳的地方。至契的后代汤时，家族部落兴旺，成为天子，建立了商朝。如此一来，契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商族的始祖。也是从契开始，商族人才有了以父子相承为主的惯例，真正进入父系社会。也正因如此，商族开始祭祀简狄，并将玄鸟当作自己的图腾加以崇拜。

类似的故事也被记载在几千年后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上，其中写道：有一天，努尔哈赤的母亲喜塔腊氏来到长白山上，看见一只神鹊嘴里衔着一个小红果站在佛像的佛衣袈裟上。突然，神鹊将红果丢给喜塔腊氏，喜塔腊氏深感是神灵所赐，就将红果吃了下去。谁料回去后便怀孕了，十月之后生下了努尔哈赤。当然，这些因神鸟而怀孕生下君王的故事，或许是后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但也充分体现了古人对鸟的崇拜和信仰。

仅凭这些传说和记载来说明古人认为自己是鸟类的"后代"，似乎有些太勉强了，那么考古的证据如何呢？1976 年春，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100 米处，大型商代墓葬妇好墓的挖掘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考古工地上有一个忙碌的身影，那就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振香先生。为数众多的青铜重器、玉器、石器、陶器的发现令郑振香无比高兴，不过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他——有一天，郑振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出土的器物中，用写实的笔法描绘鸟类形态、羽毛的非常之多，所涉及鸟的种类之广也令人称奇，有鹤、鹰、鸮、鹦鹉、鸽子、鸬鹚、燕子、鹅等。如此多的鸟类器物，在商代墓葬中发现尚属首次，这说明其中包含的古人对鸟类的崇拜意识。

对鸟类的崇拜之情，使古人在穿衣打扮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将羽毛装点在自己的衣服上。我们在众多的展示原始文化的仪式上，还能看到这样的穿着，而这大概就形成了最初的羽衣。不过，这种崇拜到了汉代，却演变成了另一种心态。



图为藏于美国亚瑟·赛克勒美术馆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亚兽鸮尊，其盖子为鸟首形，眼睛圆圆的，尖尖的喙略微上翘。鸮身为尊腹，尾翼着地，与两爪形成尊足，器形设计较为巧妙，看起来像一只憨态可掬的鸮鸟。这件器物，折射出了那时的人们对鸟类的崇拜——他们甚至将祭祀的礼器都铸造成鸟儿的形状。
供图／文物出版社



从羽人到羽衣

1966年，陕西西安西关南小巷一处西汉窖藏被发现，有一件出土文物尤为引人瞩目。这是一个小巧的跪坐青铜人像，小人儿竖长型的脸上，有尖鼻阔嘴，眉骨、颧骨微微隆起，头顶上还竖立着两只耳朵，脑后梳有锥形发髻。它身着无领紧袖右衽长衣，束带，赤足。这些可能都不算奇特，小人背后长出的双翼才是令人称奇之处，不仅如此，它膝下还有鳞状的垂羽。因其有羽翼，考古学家将这件器物称为羽人。

事实上，羽人在汉代的出土文物中很常见，除了青铜羽人，墓葬中的漆绘棺、漆器、青铜灯、青铜镜上皆有羽人的形象。甚至在许多汉画像石上，也有羽人。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睢宁县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就有一幅表现羽人的石刻。画面上一个采摘仙果的羽人，头戴冠，身穿短衣，长发飘扬，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

大量羽人出现在汉代文物中，绝不是一种偶然。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山海经》中记载有羽人国，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会死亡，得道之后身体就开始长出鸟一般的羽毛。《楚辞·远游》也有这么一句话："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东汉文学家王逸给这句话的注解是：人如果得道之后，身体就会长出羽毛成为羽人。王逸的解释，正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对羽人偏爱的原因——原本便十分崇尚道家的汉代，大批的贵族、士大夫等等都十分向往得道成仙，这些向往最终都幻化在那些羽人的身上。

除了寄情于各式的羽人器物，古人希望得道升仙的愿望，也会被诉诸现实，即穿上羽毛制作的衣服来昭示自己的精神向往和物质充裕。《汉书·郊祀志》中记载了一个名为栾大的人，栾大原本是胶东王刘寄宫中的药剂师，学了一点方术，经人推荐至汉武帝处时，受到了重用。后来汉武帝授给栾大"天道将军"时，曾派使者手持玉印，身穿鲜艳的羽衣，站在白茅草上。而栾大也身披羽衣，站在白茅草上接受玉印。两件用羽毛制作的衣服，在月光下散发出迷人的光芒，让人们觉得，羽衣与得道升仙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联。不过，栾大的羽衣却没能让他升仙，在其招摇撞骗的行径暴露之后，他落得了个"腰斩"的下场。

那么，此时羽衣所用羽毛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是不是所有鸟类的羽毛都可以穿戴呢？答案是未必。据汉代郑玄在注解《周礼》时所说，羽衣大多用到的是雉鸡羽毛。这或许与当时的射雉之风盛行有关，此风至魏晋时愈演愈烈。据《南齐书》中记载，南北朝刘宋元徽（473~477年）时曾专设"射雉典事"一官，射获的雉鸡除了将尾巴上的翎毛装饰在镳（biāo）服上以外，其头部的羽毛还被用来制作裘衣，称为"雉头裘"，简称"雉头"。

此时的羽衣，减少了对祖灵与神仙的崇拜，更多的是物质奢侈的追求。

南齐东昏侯萧宝卷也曾设立多处射雉场，除了制作雉头以外，还制作了鹤氅、白鹭縗（shuāi）等羽毛制作的衣物。白鹭縗是一种头巾，应为古人男士束发之用。而鹤氅就是一种用仙鹤等多种鸟羽制做成的外套，宽袖大身，穿上有一种飘逸感。鹤氅最早见于《晋书·恭王传》，据说恭王经常披着鹤氅在雪地中散步，被后蜀嗣主孟昶看到，说：他真是神仙中人啊！可见鹤氅穿在人身上能够给人一种多么美好而神奇的感受。但是，让千家万户了解鹤氅这一服饰的，还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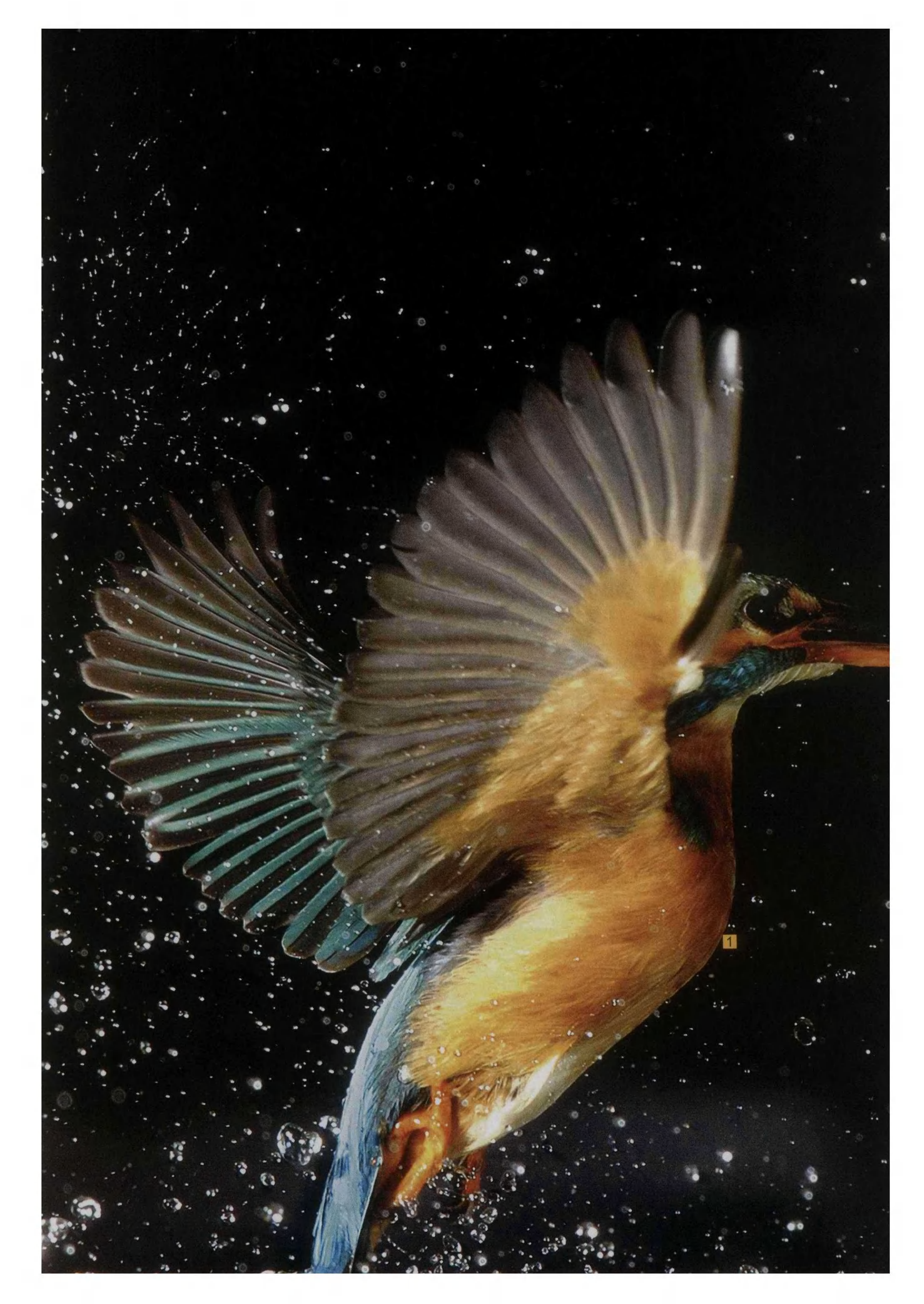
羽扇纶巾、身披鹤氅，是诸葛亮在罗贯中笔下的经典形象。据统计，《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服装有 18 处，穿有鹤氅的描写就有 11 处之多。正是这鹤氅，衬托出了诸葛亮的儒雅、足智多谋、潇洒飘逸、堪比神仙的特点。只是，诸葛亮所着的鹤氅，却并不是真正的羽衣，仅是将团鹤图案的纹饰绣在道袍上而成。

跪坐青铜羽人，其背部生出双翼，细看之下，还能发现其膝下有鳞状垂羽，一派仙风道骨之貌，它与右图均为陕西西安出土的西汉羽人的形象（供图／西安博物院）。左页图为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龙凤图》，画上古人拱手面向凤凰，毕恭毕敬（摄影／郝勤建）。无论是羽人，还是朝拜凤凰的古人，应当都是汉代人向往羽化成仙心理的流露。

奢华之羽

“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读罢这几句，眼前仿佛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清早，一扇又一扇的宫门次第开启，来自四方万国的使臣们列队走上一层层台阶，看到唐玄宗身着翠云裘、头戴冕旒坐在大殿龙椅之上，华贵而威严。顾名思义，翠云裘应该是用翠鸟的羽毛捻线所编织而成的。有意思的是，不久之前，唐玄宗还曾一度下令禁止社会各阶层随意穿戴鸟羽线编织的服装。

原来，此前的唐朝曾因



2

3

4

链接

五彩的鸟羽

且不说因为鸟类崇拜、羽化成仙的思想而催生的羽衣，仅仅看鸟儿们五彩斑斓的羽毛，就能明白为什么古人喜欢将其穿戴在身上——图1那掠过水面的翠鸟，背上一抹清亮的蓝色十分动人；图2是有着五颜六色羽毛的鸳鸯，任凭哪一种都很美丽；图3为火尾绿鹛，顾名思义，它有翠绿的羽毛和火焰似的尾羽（摄影／张永）；图4中雄性绿尾虹雉则更奇特（摄影／董磊），其羽毛从一个角度看为黑色，但换一个角度，会看到彩虹般带着金属光泽的金色和蓝色，这正是被唐代赫赫有名的百鸟毛裙所极力推崇的一点。因此，没有一种颜料能像羽毛那样炫目，也没有一种装饰手法能如羽毛一样灵动。

不过，美妙的羽毛，仍需要有巧手将其制成衣服。因整根的羽毛易折断，所以将羽毛拼贴在衣服表面则不太实用。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人们研究出了两种运用羽毛的方法：其一为织，将孔雀毛与金银线捻搓在一起，用来纺织成布匹，这样孔雀毛不易脱落，且兼具其色彩与光泽。其二是绣，即将羽毛捻搓成线，绣在织物表面，如右图中显微镜下北京故宫藏孔雀吉服局部所示。在显微镜下还可以看到，小羽枝包裹着丝线呈现不规则的放射状，发出荧荧的蓝绿色光芒。但颜色并不是因为孔雀羽毛本身含有色素，而是依靠自然光和波长尺度相似的微结构相互作用产生的颜色。这也解释了在许多出土的织物中，除了金线，只有孔雀羽线少有色差、并仍能保持绚丽色彩的原因。



1956年，埋葬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被打开之时，所有人都被其中保存完好且为数众多的华服所吸引了，其中便有上图这件黄绛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复制品）。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胸前的绿色团龙（下图），均由孔雀羽线绣成。可惜由于保存不善，原文物在一时惊艳过后，便暗淡了。供图／撷芳主人



为一件羽衣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灾难。按《新唐书·五行志》的记载，素有唐代第一美女之称的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也即唐玄宗的表姐，生活极为奢靡。她有两条百鸟毛裙，正看时为一种颜色，侧看是另一种颜色，对着阳光颜色又不同，背着阳光则又变换为其他色彩，甚至能从中看到百鸟的情状。《资治通鉴》中对百鸟毛裙的描述则更为详尽："安乐有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其奢华可见一斑。

百鸟毛裙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使用了羽毛。天然的羽毛上往往有一层无色且具凹凸沟纹的蜡质层，或有多角形无色的折光细胞，它们所产生的折光作用能使羽毛呈现出不同的光彩效果，是其他任何颜料所无法达到的。更为重要的是，羽衣历久弥新，不会褪色。

独特的光泽与色彩，加上公主的喜好，引得人们纷纷效法，掀起了一股穿着羽衣的风尚。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鸟类的浩劫。据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中说，为了获得鸟羽制作羽衣，人们"搜山荡谷，扫地无遗"，长江、岭南的彩禽几乎被捕杀殆尽。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也为了抑制住举国上下的奢靡之风，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下令，禁止人们穿戴"珠玉、金银、罗绮之物"，其中，自然

也包括了羽衣。

不过，禁令却限制不住人们对羽衣的喜爱与追求，同样也限制不住一种声名显赫的舞蹈的产生——霓裳羽衣舞。究竟是谁开创了这种舞蹈？在典籍中已经很难找到准确的答案。传说是唐玄宗作曲，杨玉环据此编排了舞蹈。如今，舞曲和舞蹈早已失传，惟有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的描述或许还能让人领略一二，诗文说道：轻盈的旋转像雪花飘舞，矫健的前行像受惊的游龙。垂下的双手像柳丝那样娇美无力，舞裙斜着飘起时仿佛白云升起。美眉流盼说不尽娇美之态，舞袖迎风飘飞带着万种风情。是上元夫人（道教中的女神）招来了仙女萼绿华，是西王母扬袖送别仙女许飞琼。……舞罢时像飞翔的鸾凤收起翅膀，舞曲终了余音不绝于耳，就像长长的鹤鸣一般。此时的羽衣，已非原意。就像霓裳所指，并非是真的云彩做的衣裳一样，羽衣，则更多的是借羽毛的轻盈，来形容舞蹈的优雅，如同仙女临凡。

到了王维写成前文中那首诗时，已是太上皇的唐玄宗也仍然没能抵挡住奢华羽衣的诱惑，身着翠云裘，带着大唐的威严气度，等待着朔方、回纥、大食等国遣使入西京长安向他朝贺。

此后，羽毛带来的奢华，也一直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延续着。只是，各朝偏好略有不同，而自明清开始，孔雀的羽毛逐渐受到青睐。

1956年，从明十三陵的定陵出土了一卷长达16.3米的袍料，其上所有龙鳞、龙爪、头部均用孔雀羽线织成。而同时出土的另一卷杏黄色的袍料，则是用片金线和朱红、水粉、宝蓝、浅蓝、月白、明黄、墨绿、果绿、中绿、蓝绿、浅降、白等十二种彩绒纬丝与孔雀线合织而成。此外，江西明藩王与王妃的合葬墓中，还出土了用孔雀羽线铺绣的霞帔。

清朝时，孔雀羽毛被视为皇家独用和权利富贵的象征。清初叶梦珠的《阅世编》中有一段相关的记载："今有孔雀毛织人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2008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中，曾出现了一件慈禧御用的"晚清雀金裘"，尽管与《红楼梦》中的"雀金裘"同名，但却并不是一回事。慈禧这件只是以孔雀尾翎为原形，将数件孔雀翎纹绣片叠积而成，并没有使用真正的羽毛来织绣。

巧夺天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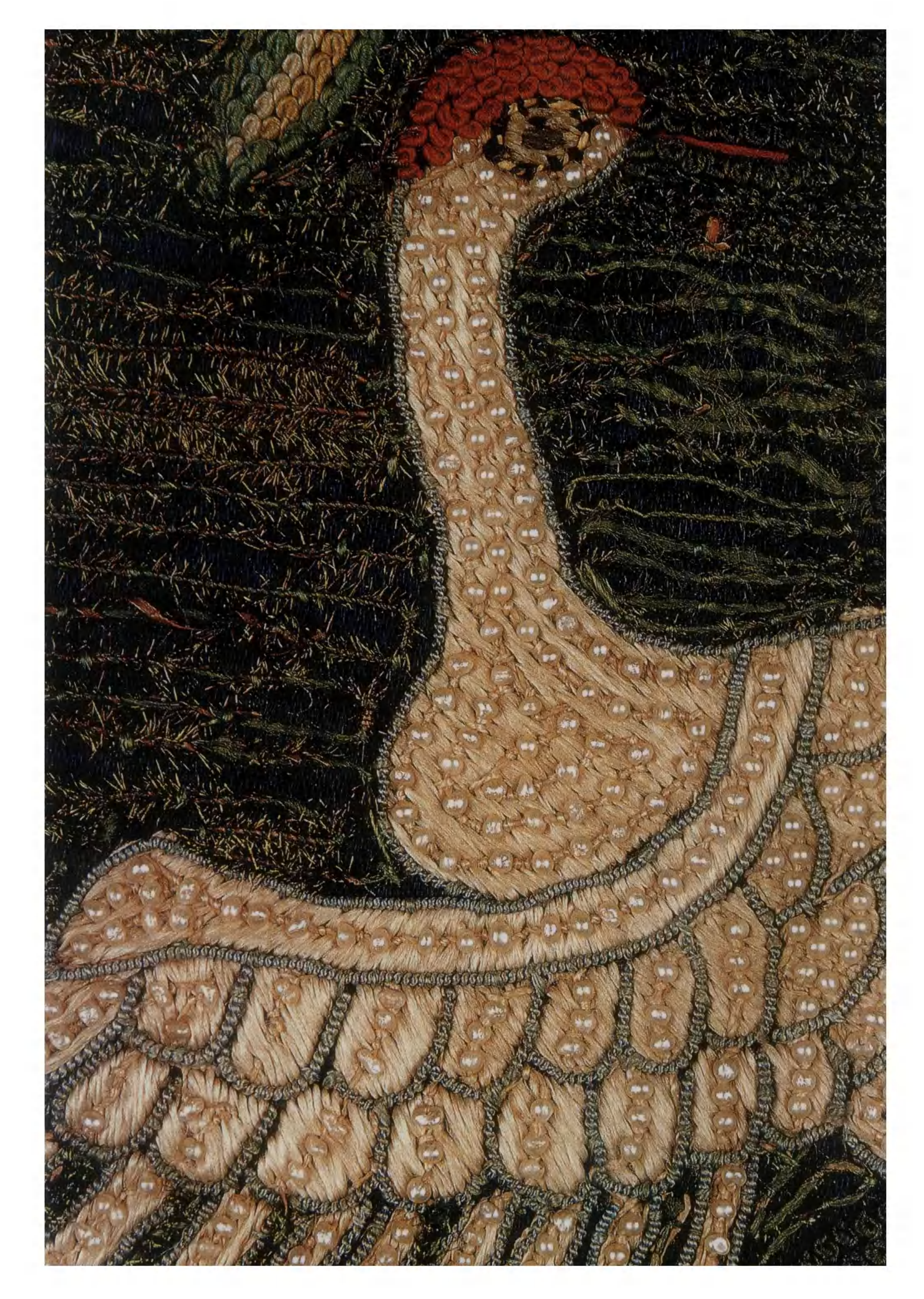
华丽归华丽，但如果直接用羽毛来制作衣服，却是不大实用的。民国时，曾有人出重金请来高级裁缝给梅兰芳定制了一件孔雀尾翎的戏服，来表演京剧《天女散花》中的散花天女。不料戏演得很成功，可是身上的羽翎却折断了不少，散掉了许多。因此，用羽毛来制作衣服，一般都还是把羽毛捻成线来使用。

再回到《红楼梦》中那件"雀金裘"上来。宝玉穿上雀金裘后，一次不小心烧了一个洞。街上的裁缝都不敢补这么贵重的羽衣，于是，病中晴雯勇挑重担，连夜补雀金裘。这是《红楼梦》中极为重要的一回——勇晴雯病补雀金裘。曹雪芹在此回中，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其修补的过程：

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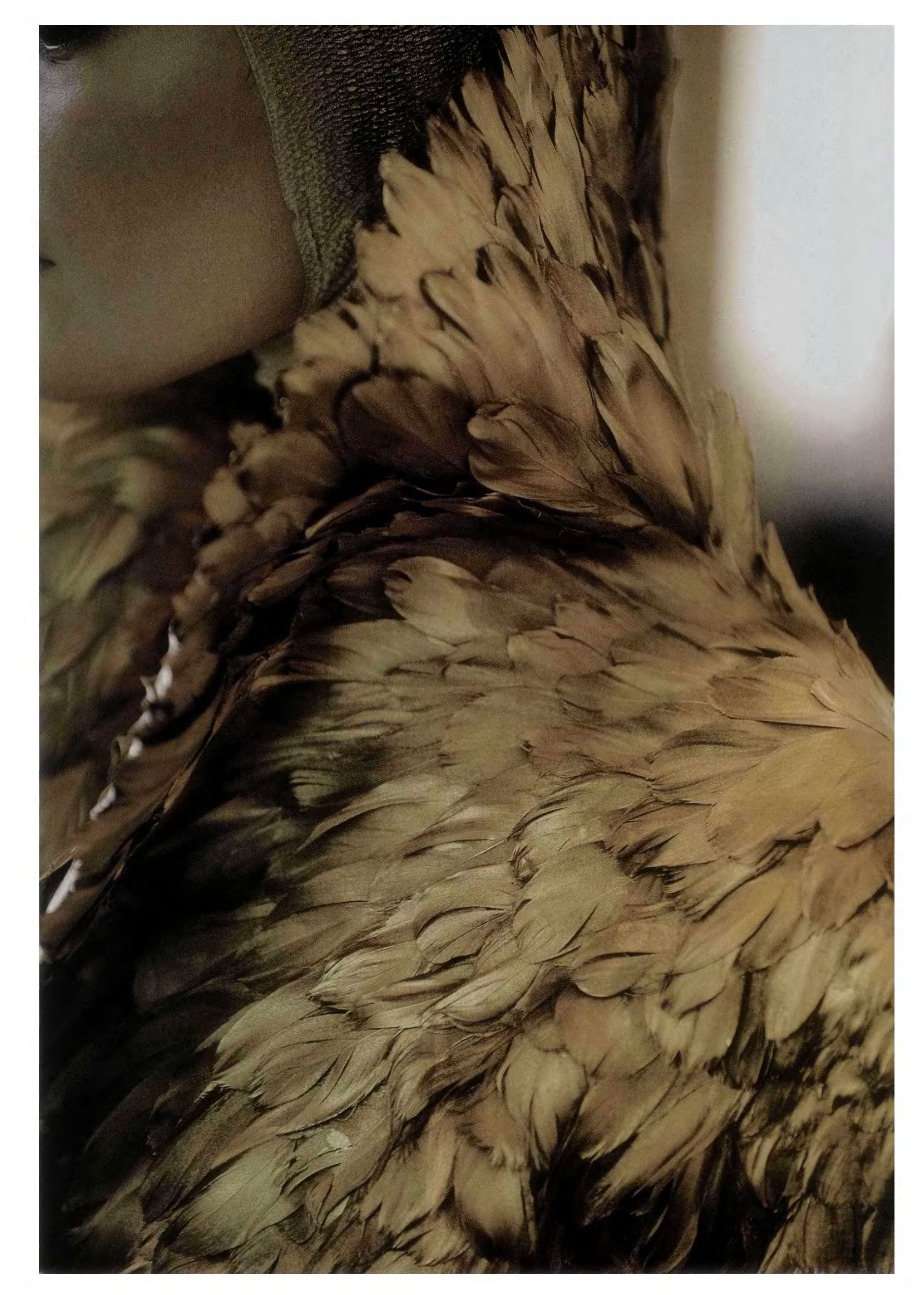
如此繁复的工艺，足见羽衣之珍贵。更重要的是，从这段描述中，也能发现雀金裘确实是用孔雀羽捻线织出来，而不是直接拼缀羽毛制成的。那么，孔雀羽线又是如何捻制而成的呢？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房宏俊，是研究明清服饰的专家，他说，孔雀羽线实际上就是将线与羽丝捻合在一起，具体有几种捻法：一股丝线与羽丝捻合；两股丝线与羽丝捻合；一股丝线加金捻合羽丝；一股丝线和羽丝捻合后再与金线捻合等等。不过，一根长长的孔雀羽毛往往只有顶端的"珠毛"可以用来捻线。





绿色的孔雀羽线，深深浅浅地在白鹤周围蔓延，不时还有一些花儿穿插其间，远远看去，是一片盎然的春意——这清朝官服上的补子，不仅昭示着佩戴者一品文官的尊贵身份，也充分展示了其上所用羽毛的华美。或许，只有孔雀羽毛上的颜色，才能历久弥新，让这春意延续数百年。供图／撷芳主人





亚历山大·麦昆是国际时尚界公认擅长运用羽毛的鬼才，左图即他用羽毛设计的服装。羽毛贴合着身体的曲线，衬托出一种炫酷与柔美相济的效果。这与中国古代的羽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右图为2010年麦昆服装发布的绝响，其后随着麦昆的辞世，作为时尚最前沿的羽衣也渐行渐远……
供图／WWD/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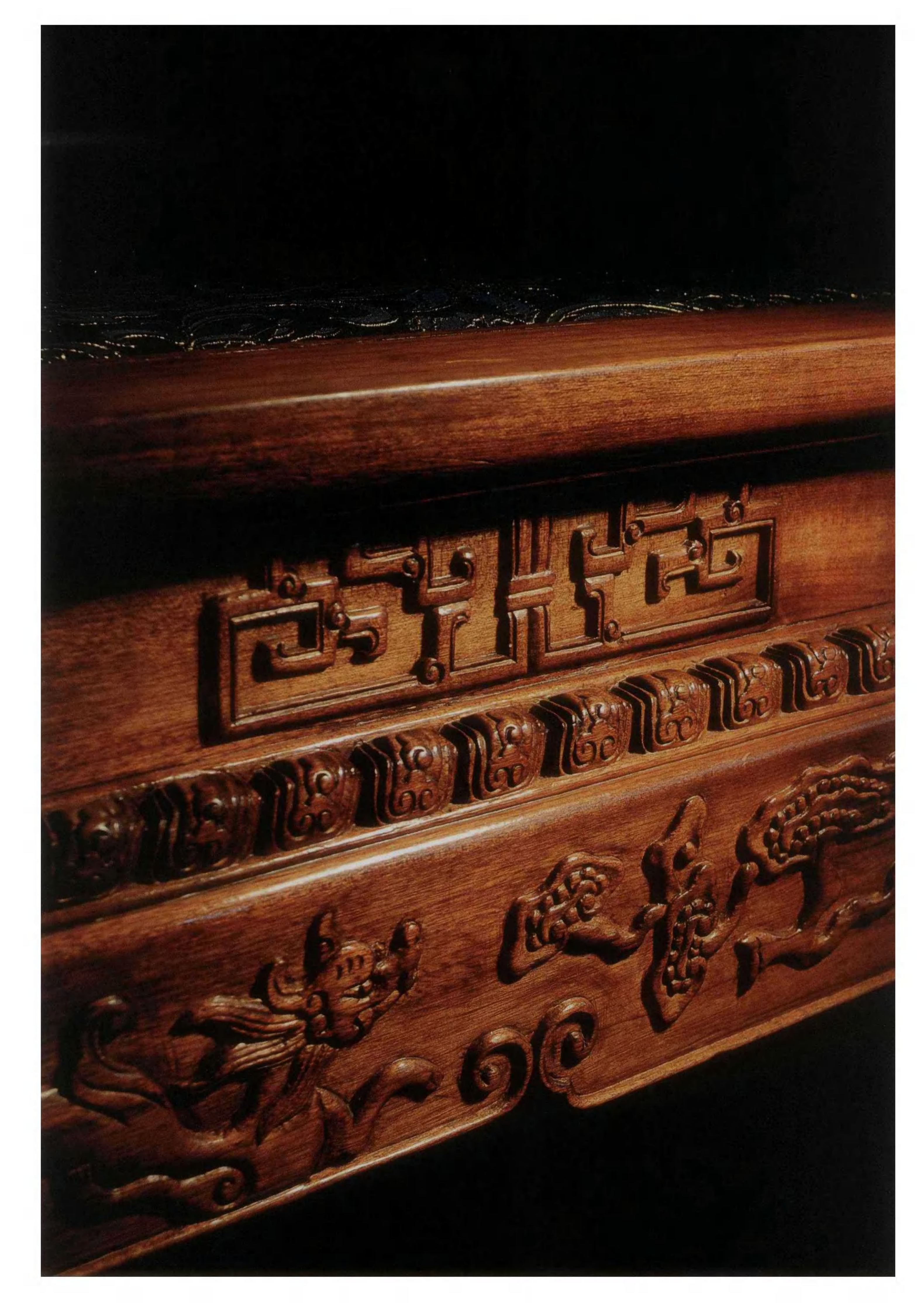
不同捻法形成的孔雀羽线，用途也各不一样。如前文所述，晴雯是用织的方式，羽线只是作为彩色纬线的一种，与白色丝线交相地织接成一个整幅的面料，其上不会有羽毛毛绒的感觉，且只呈现出羽线的局部花纹。

而故宫博物院藏有的一件乾隆时期的孔雀吉服袍则主要是采用绣。通过在显微镜下观看，房宏俊发现其所用的孔雀羽线，是将一股丝线与一根羽毛丝捻合在一起，然后再边捻边续上另一根孔雀羽毛。这种羽线立体感很强，但羽丝和丝线的结合却不甚紧密，所以更适合用作绣线。宫廷里的能工巧匠们，便在袍服有花纹空隙的地方，用羽线来填补，使整件袍服呈现出迷人的翠绿色，这种工艺也因此被命名为“铺翠”。

古人的精湛技艺，至今，仍难以效仿。南京云锦研究所就曾尝试过复制定陵出土的“孔雀羽织金花纱龙袍料”，他们费尽周折找来孔雀羽毛，劈丝搓捻成线后，再和捻金线、各色彩绒一管一管地妆彩，一梭一梭地织造，历时5年，才织成了全长17米、净重900克的镶金点翠、金碧辉煌的龙袍料。

当然，除了工艺的难以效仿，随着现在环境恶化、鸟类不断减少，羽衣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从最原始的图腾崇拜、祖灵信仰，到一种精神追求，再到对奢华之羽的迷恋，羽衣所走过的轨迹就像它的色彩一样斑斓。如今，我们偶尔还能在艺术舞台上看到它的身影——2010年第16届亚运会开幕上，影视明星章子怡就身着“时光羽裳”亮相，用白色羽毛贴制而成的短裙显得高贵而典雅，伴随着钢琴家朗朗弹奏的《时光》，她翩翩起舞，让人恍惚间看到了那霓裳羽衣荧荧烁烁的迷人光芒……

责任编辑／戴莹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刘扬



寻找金丝楠木

■ 撰文／樊腾木 摄影／王凯 等

金丝楠木，是一个人们“熟悉的陌生人”。做了一辈子木艺的工匠，都未能有幸目睹，普通人就更只是听说而已。历史上，金丝楠木同样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乾隆皇帝曾赞誉金丝楠木为“天地至美”，为了得到它，乾隆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一世英名去盗明陵。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在寻找它的踪影——这神奇的金丝楠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人们对它孜孜以求?

■ 这是一张金丝楠木的椅子，它静静地立在博物馆的展厅中，散发出温润、细腻的光彩。今天，如果有条件的人，完全可以在其上坐一坐。然而，若是换到了明清两朝，这椅子即便是官员恐怕也无福消受。因为那时候金丝楠木是皇家专用木材，普通人不得使用，否则会因僭越礼制而犯大罪。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一队人马正向鄂西北的深山挺进。这支队伍很奇怪，为首的除了光化（今湖北老河口）知县廖希夔，还有一位鹤发童颜的风水先生。

鄂西北地处汉江上游，大巴山、神龙架等大山大岭拱卫四周，它自古以来既是秦、巴、楚、蜀等多种文化犬牙交错的文化走廊，也是各种动植物生生不息的家园，至今，金丝猴等国家珍稀动物仍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知县廖希夔携风水先生来此，却不是为了寻找金丝猴这样的“奇珍异玩”，而是为了寻觅一种珍稀的木材——金丝楠木。

找寻“棺材木”

楠木生长缓慢，产量极低，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是一种稀有珍贵的树木，主要产自我国四川、贵州、湖北和湖南等海拔 1000-1500 米的亚热带地区的阴湿山谷、山洼及河旁，其木质坚硬耐腐，寿命长，需要四五百年才能成材，成材后的可用之料也仅仅是其中的十分之一。

明代谷应泰所撰《博物要览》中说，楠木有三种：一是香楠，木色微紫而带清香，纹理很美观；二是金丝楠，木纹里有金丝，是楠木中最好的一种；三是水楠，木质较软，多用来制作家具。“金丝楠出川涧中，木纹有金丝，材质细密，松软，色黄褐微绿，向明视之，有波浪形木纹，横竖金丝，烁烁可爱。”

金丝楠木坚硬耐腐，水不能浸，蚁不能穴，尤其奇特的是，它温润柔和，触之冬天不凉，夏天不热。基于如此特点，古代帝王御用的棺椁和龙椅宝座都会首选金丝楠木制作。

然而，中国人是从何时开始发现并重视金丝楠木的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人们却从考古发现中寻到了蛛丝马迹。

2009 年 7 月，在扬州平山堂东路北侧沈家山的瘦西湖西苑施工现场，一座西汉时期的夫妻合葬墓，在深埋地下 2000 多年后重见天日。考古人员根据墓葬形制以及出土文物推测，墓主生前家境比较殷实，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名低级官吏。令人惊讶的是，这座全部用金丝楠木制作的西汉墓葬，其棺椁历经两千年，丝毫未腐。

更多的汉墓考古发掘也证实，至晚从汉代开始，人们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金丝楠木，且王公贵族及皇室常用它作棺椁。于是相传至今，金丝楠木有了“千年不腐，万年不朽”的说法。这种特质，首先得到千年不腐的棺椁验证。更有一层，这说法还不仅仅指金丝楠木本身埋在地下几千年不腐烂，也指藏于其中的物体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清朝慈禧太后的棺椁，即是用金丝楠木制成。当年盗墓贼撬开内棺，就发现埋葬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尸身依然完好，面目栩栩如生。为了验证金丝楠木防腐的功效，据说有人曾亲自做过试验，在常温下将一块生肉放置在用金丝楠木做成的食盒内密封保存，两月后开启食盒，鲜肉不馊不臭。

于是，金丝楠木得到了一个别名——“棺材木”。有几句老话是这么说的：生在苏州，吃在广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最后一句说的就是楠木，因为柳州出楠木棺材。

名字虽不好听，但在古代，要是哪个有钱人在死后能有一块金丝楠木做为棺材板，那是相当荣耀的事情。2004 年 2 月，在南京江宁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古墓，经考古发掘证实其为宋代墓葬。墓主是女人，而且从其“一棺一椁”的形制来看，她的夫君充其量只是士的级别，还远远没有达到高级官僚的地位。然而，她使用的棺木却是金丝楠木。史料记载，“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以墓主并不算高的身份地位，却能用上只有慈禧太后才能用的金丝楠木棺材，如此“僭越礼制”，这可不是普通人敢做的事。这恐怕是因为：历史上，人们对于身后



因为金丝楠木神奇的耐腐功能，自古以来它都被看成最好的“棺材木”。《红楼梦》中曾写到，有人想用金丝楠木打一口棺材，竟发出了“一千两银子只怕无处买”的喟叹。左图为2004年人们从湖北襄樊战国墓葬中起出完好的金丝楠木棺（摄影／邱厚强），右图是2011年安徽巢湖境内盗墓贼遗留下的金丝楠木棺材碎片。摄影／李远波

事的追求，往往不亚于生前事。所以即便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要追求高贵而耐腐的金丝楠木，于是，金丝楠木一次次见证了古人在死后僭越礼制的行为。

此外，也有胆大的，活着就敢干。明朝洪武年间，大明律严格规定，金丝楠木为皇家专用，民间擅用即逾制获罪，这样的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朝。不过冒死者也有人在，清朝大贪官和珅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自己的府第（今天的北京恭王府）里使用了金丝楠木，被判“僭侈逾制”，这一条，成了嘉庆皇帝杀他的二十宗死罪之一。

深山觅“皇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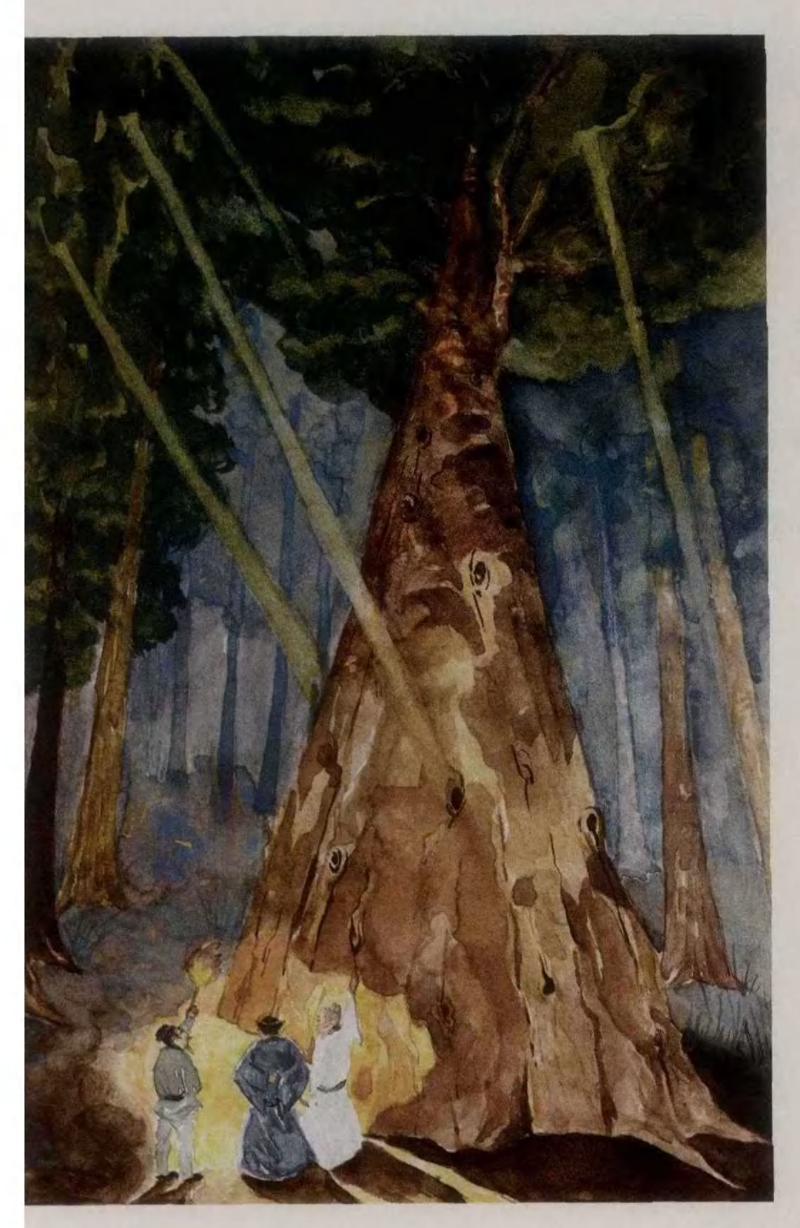
当然，如果仅仅用于棺椁，如此的良材那真算是大材小用了。其实金丝楠木更是古代修建皇家宫殿、陵寝、园林等建筑的首选材料，因为只有皇家才有资格和能力如此大规模使用，所以金丝楠木也被称为“皇木”。

宫殿未起，良材先行。中国的宫殿为木制系统，没有煌煌大木，一切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找寻足堪重任的木材，就是一件大事。

明代开国，定都南京。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儿那里夺得皇位后，北京便由边防重镇一跃而至为明朝首都。中国向来有“天子之居，非壮丽无以重威”的传统，大兴土木，修筑紫禁城势在必行。用材？当然非金丝楠木莫属。

知县廖希夔仅是为紫禁城寻找金丝楠木的众多地方官中的一个。朝廷规定，地方官必须限期找到金丝楠木，至于哪儿有金丝楠

不过冒死者也有人在，清朝大贪官和珅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自己的府第（今天的北京恭王府）里使用了金丝楠木，被判"僭侈逾制"，这一条，成了嘉庆皇帝杀他的二十宗死罪之一。



明朝大量采伐之初，金丝楠木还零散分布于原始森林中。图中展示的场景，是人们在"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觅到了它高大而神秘的身影。绘画／曲建涛

木，则语焉不详。

中国地大，除了疆域面积一目了然外，家底儿到底有多厚，谁也难以弄得清清楚楚。从另外一方面看，大有大的好处。大的国土，也意味着大的可能。今天这里冒出一个金矿，明天那里出现一座宝藏，都是常有之事。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贡，使得地方与朝廷有了联络管道，为修筑紫禁城而寻找到的金丝楠木就是一种"贡木"。于是，为寻找金丝楠木，一纸政令下去，地方官们往往倾巢出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皇令如山倒。廖知县先是发出一纸通告，希望黎民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而应者寥寥。后来，他又找到几位德高望重的乡绅，希望他们身先士卒。碍于父母官的面子，几位乡绅动用了一些人马，却收效甚微。这是怎么回事呢？金丝楠木真的如此难觅踪影吗？

自汉朝始，皇家、贵族已将浙江、安徽、江西及江苏南部的金丝楠木大肆伐用，所剩无几。到明朝，金丝楠木只有在湖广、云贵和四川的原始森林中才能觅到踪迹。这些地方环境险恶，危机四伏。明代有位敢说话的臣子叫吕坤，他曾上书皇帝说，蜀地民众将采办金丝楠木视为生死畏途。这些"深山穷苦，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的地方，实在是一座座鬼门关。为寻找金丝楠木，民夫是"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以致吕坤说他所见到的采木者，"谈及采木，莫不哽咽。"

为皇帝找大木，但皇帝不管吃不管喝，不发工钱，自己还要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谁愿干呢？毕竟天高皇帝远，所以能偷懒就偷懒吧。

这使得廖知县进退维谷。如果找不到大木，这“皇差”可不好交。如果就此放弃，天子派出的监督说不准会打小报告，说他敷衍了事，一旦上纲上线，后果殊难预料。念及于此，廖知县再也坐不住了，他放下官衙里一应日常事务，将寻找金丝楠木作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他规定，凡是寻找金丝楠木有功者，官府重重有赏。而且是赏罚并重，如果人手不够，官府可以随时向民间征调人员，任何家庭不得隐匿青壮劳力，否则将给予重罚。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听说廖知县有赏，寻找金丝楠木的队伍也就充实起来。但茫茫大山，何处着手？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人提议，金丝楠木不是寻常之物，必须要请一位精通鄂西北山川地理的风水先生带路，只有如此，才不会盲人摸象。

风水先生如约而至，而且确有学问：金丝楠木不是多生长在阴湿潮热的山谷吗？顺着大山之间的淙淙流水，是不是有可能按图索骥？金丝楠木不是高大挺拔吗？在它的下面是不是有更多的蘑菇、菌子？有了这些合情合理的推论，人们似乎增强了一些信心。于是找大木的人马，分成若干组，沿着条条小溪，向深山挺进。廖知县再次强调，谁先找到，必有重赏。

前有重赏，后有监工，尽管成功几率微乎其微，也只能向前走、不回头了。不知过了多少时日，突然有人惊呼——

“金丝楠木！”

清幽的山谷，阵阵楠木香气扑鼻而来，金丝楠木雍容静穆地挺立在天地之中。

廖知县应声而至，半晌无语。没有金丝楠木，紫禁城的修筑就遥遥无期，找到了金丝楠木，可是拔得头筹，立了头功。现在，他头顶上的乌纱帽更加牢靠，还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念及于此，廖知县不由百感交集。欣喜之余，他赋诗一首，命人刻石以传久远：

采采皇木，入此幽谷，
求之未得，于焉踯躅。
采采皇木，入此幽谷，
求之既得，奉之如玉。
木既得矣，材既美矣，
皇堂成矣，皇图巩矣。

几百年过去，诗词不改，青石依旧。于是这里被人们称为“采皇木诗摩崖石刻”，而它所在的这条鄂西北偏僻的小山沟，因向大



当民夫将金丝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此图描绘的即是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运木的场景。绘画／曲建涛

民间流传着北京是“漂来”的说法，说的就是北京皇家建筑的土木砖瓦，大多是通过运河从各地运来的。而这根从运河底出土的金丝楠木，恰好是一个绝好的历史见证。

明帝国贡献良材有功，其分量也不同凡响起来。原先默默无闻的小山沟，被廖知县改名为“慈孝沟”，意谓对天子尽心尽力、尽慈尽孝。摩崖石刻、慈孝沟，共同成就了这一段寻找金丝楠木的传奇。

廖知县办理皇差，一丝不苟，也为他的行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载。就后者而言，廖知县留下的摩崖石刻，可能更为重要，堪称紫禁城建造的活化石。为了对皇帝有所交代，不知有多少像廖知县这样的地方官为之绞尽脑汁。但纵观明代的官方史册，诸如鄂西北慈孝沟之类的记载，却几乎为零。或许，在官方正史的修撰者看来，这些都微不足道，上不了台面。我们只有“礼失求诸野”，从摩崖石刻中去寻找廖知县当年的所作所为了。



金丝楠木属大器晚成的木材，要成材至少需要60年以上。而修建紫禁城所用大柱，非300年树龄以上不可，所以清朝时重修紫禁城已无良材可用，只能用松木代替。图为人们正在测量野生金丝楠木的胸径。摄影/胡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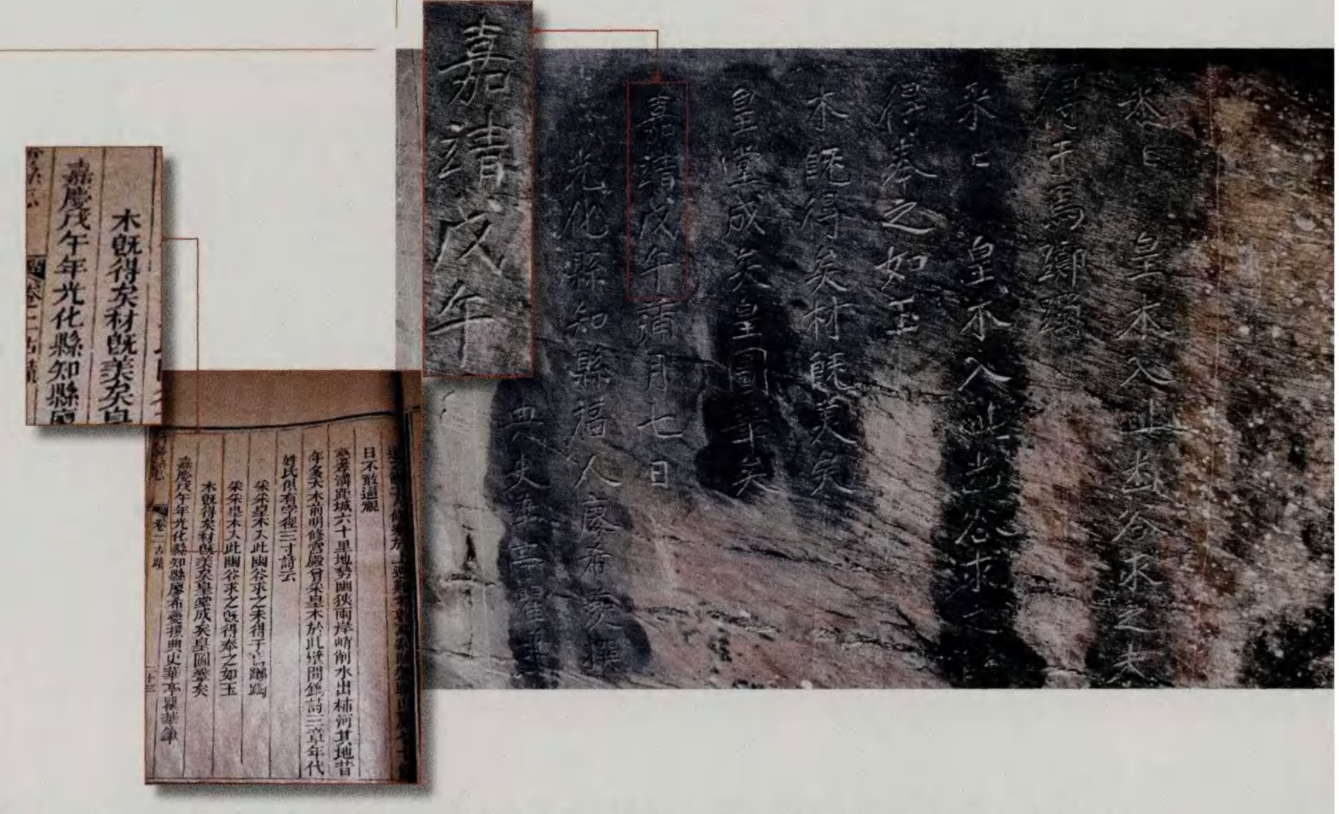
千里运“神木”

寻到了金丝楠木，皇帝交代下来的任务顶多才算完成了一半。因为大木的运输更是一项艰难而浩大的工程。当民夫将金丝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就曾对金丝楠木的运输情况作过如此陈奏：“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史载，当年建造天安门城楼的金丝楠木，仅运费就达90万两黄金。

几百年前的往事早已被时光湮没，然而仔细寻找，依然可以发现蛛丝马迹。

1953年年初，北京钢琴厂的前身——北京市乐器厂选址黄木场6号建立新厂。如今这里是北京朝阳区双井桥东边的一条小街，偶尔经过的人，没有几个知道这里原来叫“黄



■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光化（今湖北老河口）知县廖希夔为修复紫禁城寻找金丝楠木。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鄂西一带深山觅得良材，得交皇差，欣喜之余赋诗一首，刻于山石之上，是为今日的采皇木诗摩崖石刻（右图 摄影／朱江）。清同治版竹溪县志记载了该诗，但却记错了落款时间（左图），由此引出一段悬案。

木场”；更早以前被写作“皇木场”；再早叫“神木场”。

“神木场”名字的来源，就和运输金丝楠木有关。

据《明史》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派遣工部尚书宋礼采伐木料，以营建北京的皇宫和长陵。宋礼在四川省大凉山（今沐川县）西二十里的黄种溪山一带发现了一批特大金丝楠木，喜出望外。但是在要采伐的前一天晚上，忽然雷声大作，这批金丝楠木竟随着远去的雷声消失了。一时间，急坏了宋礼。待第二天再一看，这批巨木却都浮出山谷，抵达江上。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宋礼急速将此事奏报朝廷，朱棣十分高兴，以为“此乃祥瑞之兆，天助我也”，随即命名这批特大的金丝楠木为“神木”；封产地之山为“神木山”，建神祠岁岁祭享，以答谢神的赐予。

随后，朱棣又命人开山修路，疏浚河道，将这批木料由运河经通惠河辗转运抵京城，专贮东郊，这个地方因此被叫做“皇木场”，后来改称“黄木场”。

如今，在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里，有一根至少有着600年历史的金丝楠木。有关人士介绍说，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北京是“漂来的”，说的就是北京皇家建筑的土木砖瓦大多是通过运河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而这根从运河底出土的金丝楠木，恰好是一个绝好的历史见证。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地理观，建京城时一定要根据天圆、地方、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的结构，研究阴阳风水，以确定城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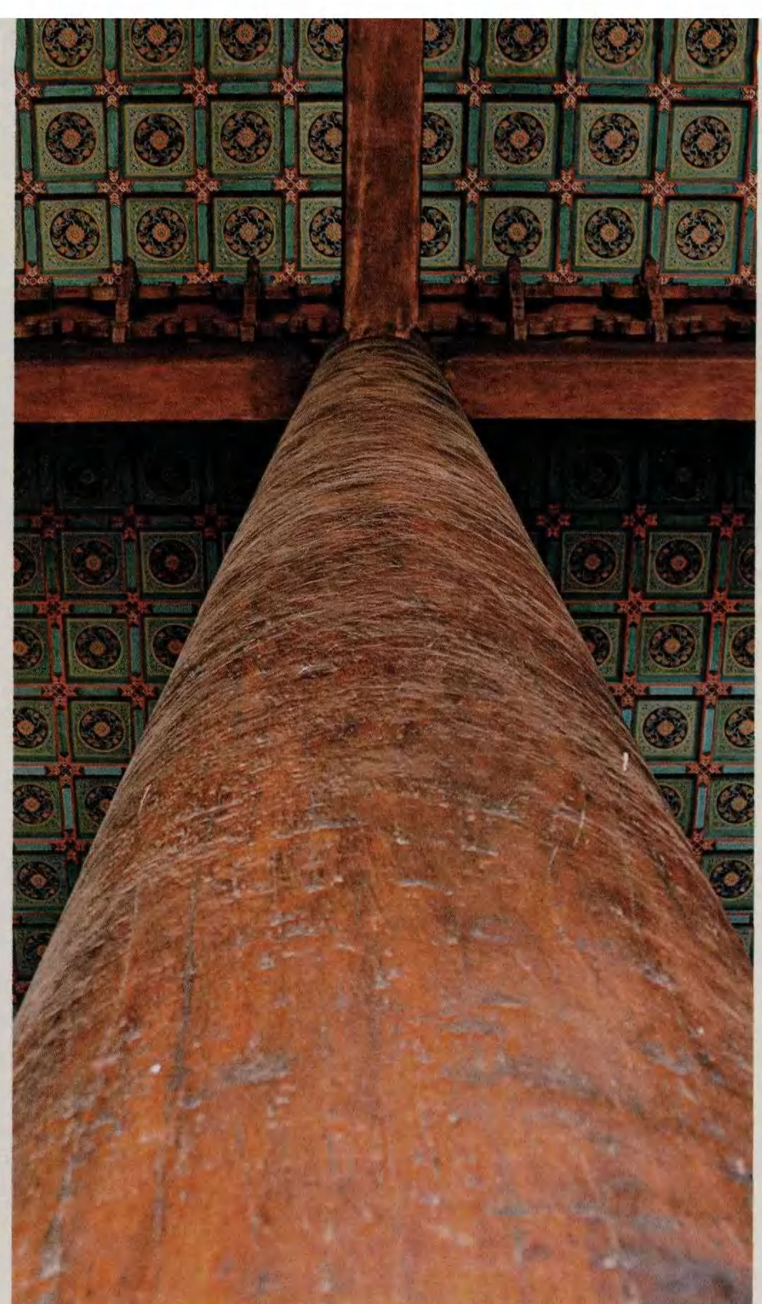


合理布局，并有意设计、安排或造就实物，拟定镇城之宝，作为皇权神授的佐证，以确保京城的平安。于是，明王朝在北京城的东、西、南、北、中，按照金、木、水、火、土的方位，确定了各个方位的镇城之宝，其中东方的镇城之宝，就是在皇宫和长陵的工程营造完毕之后，特别留存的一根巨大的金丝楠木，它被安放在皇木场，作为“神木”。这根巨大的金丝楠木，长6丈有余，相传当时两个人骑在马上隔木而立，谁也看不见谁，可见直径之粗。

这根金丝楠木到了清乾隆时期又传出一段佳话。相传，当年乾隆皇帝呱呱坠地后三天，曾用雍和宫五百罗汉山前的金丝楠木木盆洗浴，就此与金丝楠木结缘。乾隆登基后，“神木”托梦乾隆皇帝，说自己被冷落多年，刀斧加身，满身伤痛。而另一种说法是，在清朝百余年的时间里，有人曾在大北窑一带建窑烧砖，终日烟雾缭绕，火烤烟熏。而木最怕火。因此，这事终于惊动了朝廷，乾隆遂下令停止在此烧窑。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三月，乾隆亲临皇木场视察，并说：京都有这项古物我早就听说了，总想看看它。一看，“神木”神威犹然。乾隆帝触景生情，亲书《神木谣》一首并立碑以志，同时将所作的另一首诗也赐





刻在碑的背面，在"神木"西侧建立红墙黄瓦的方形碑亭一座，建筑了七间相连的瓦木结构房屋把"神木"覆盖起来，周围用青石栏杆围护，以避风雨侵蚀。这些举动恢复了前朝镇城之宝的神威，使百姓对其也另眼看待了。

然而岁月无情。如今，残存的神木碑仍在，而神木碑亭和房屋却早已荡然无存。而那根金丝楠木，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了。

皇帝盗陵木

寻找金丝楠木的任务，不仅仅廖知县一个人成功了。当李知县也成了，张知县也成了……对于野生金丝楠木而言，修筑紫禁城就意味着灾难。明朝也许是野生金丝楠木最大的劫难时期，由于建造和修缮宫殿、陵寝，过量采伐的后果在

历史上，皇家重要宫殿的梁柱通常都使用金丝楠木。明朝初建时的紫禁城，无疑是当时最大的金丝楠木宫殿。岁月沧桑，物是人非，今日紫禁城中，唯一留下原汁原味的金丝楠木古建，只剩下位于紫禁城东南角的太庙，其大殿中顶天立地的大柱令人叹为观止（左上图）。在北京地区，完整保留金丝楠木主结构的古建已是凤毛麟角，除了太庙享殿，恐怕就数明长陵祾恩殿了，它还引出了一段"乾隆盗墓"的传说。上图为祾恩殿气势恢宏的立柱。摄影/冯军

对于金丝楠木而言，修筑紫禁城就意味着灾难。明朝也许是金丝楠木最大的劫难时期，由于建造和修缮宫殿、陵寝，过量采伐的后果在清初就显现出来，金丝楠木越来越少。

清初就显现出来，野生金丝楠木越来越少。而清朝对金丝楠木的追求丝毫不逊于明朝，于是时至今日，野生金丝楠木早已濒临灭绝。偶有发现，也是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

2005 年 9 月，人们在贵州省都匀县阳和乡富裕村境内，就意外地发现了几棵“身份特殊”的树种，经林业专家考证，正是珍稀的野生金丝楠木，其中一棵至少有 300 岁，身高约 30 米，枝繁叶茂，主干上长满苔藓，粗大的树干需要两人合抱。这一发现令当地的人们深感惊喜，因为这在贵州省甚至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当地政府及林业部门很快对这几棵树进行了挂牌保护。

无独有偶，除了贵州都匀、浙西常山等地相继发现野生金丝楠木外，目前人们所知的最大野生楠木群落，位于湖北竹溪县烂泥湾村。这里是我国目前现存最大的金丝楠木群落，面积约 2500 多平方米，树龄在 400 年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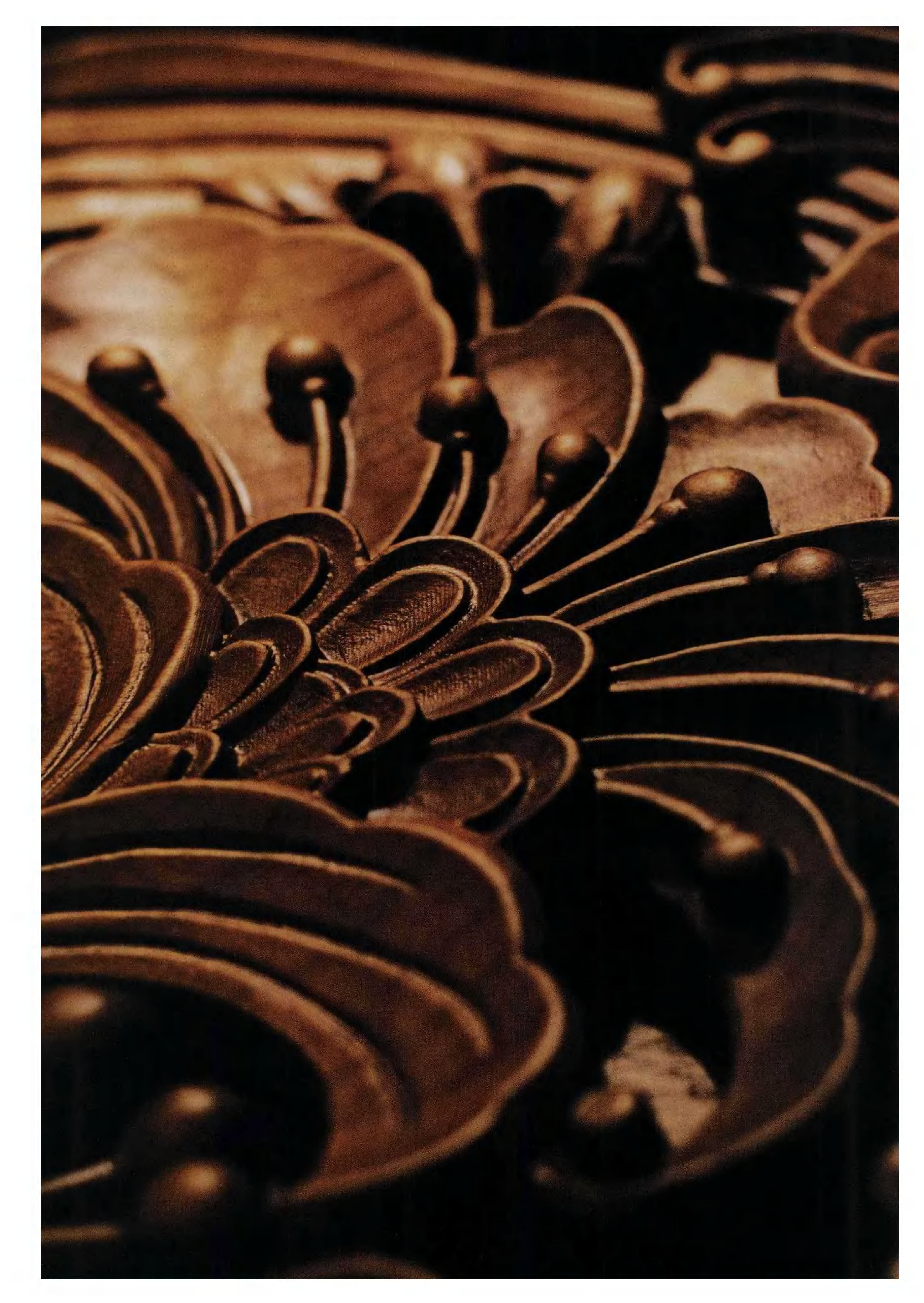
事实上，400 多年前知县廖希夔寻找金丝楠木的地方，正是这里——竹溪县。

廖知县留下的“采皇木诗”就见于清同治版的《竹溪县志》。在同治版《竹溪县志》中，诗的落款为“嘉庆戊午年光化县知县廖希夔撰典史华亭瞿华笔”，这一落款曾造成了一个历史谜团——嘉庆？那不是清朝皇帝的年号吗？那么这首诗记录的事件当然是发生在清代了。因为并非人人都亲眼看到过摩崖石刻，而埋首于古籍中的研究者却没有细加考证，就判断采皇木是清朝的事，由此还引出了“建造和修复圆明园时征用过竹溪楠木”的说法。

其实，只要去到实地一看，便知端倪，采皇木诗摩崖石刻上，清清楚楚地刻着“嘉靖”而不是“嘉庆”。

2010 年 8 月，央视《探索发现》栏目为拍摄与圆明园相关的影片，缘于“建造和修复圆明园时征用过竹溪楠木”的说法，去到竹溪，首先就发现了这个疑点。此后，经过与有

■ 金丝楠木光泽强，质地温润，纹理细腻。正由于这样的特性，金丝楠木纹饰会呈现出自然纯美、娴静低调的气质。最难得的，是金丝楠木那种古朴清幽的感觉，当你久久凝视它时，一定可以感觉得到。这种古朴清幽透出一种高贵的气息，令人向往，难怪有人将它看成中国文化的高贵代表。为此中国国家博物馆专门辟有金丝楠木厅，以用作贵宾休息厅，其墙上的金丝楠木花雕显现出无与伦比的温润质感（右图）。



“乾隆盗墓”之事虽无确凿证据，但无风不起浪，这是因为，一是乾隆的确修缮过明十三陵，二是他曾公开赞誉金丝楠木为“天地至美”。乾隆对金丝楠木的特别喜爱溢于言表。

关专家的反复考证，并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支持，证实同治版《竹溪县志》的记载有误，知县廖希夔实为明朝人，其进贡的金丝楠木用于紫禁城，但并非是初建时，而是修复时。因为紫禁城是朱棣在1406年至1420年所建，次年发生火灾，1441年重建；1557年紫禁城又发大火，前三殿、奉天门、文武楼、午门全部被焚毁，次年开始重建。而1558年正是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年），也即廖知县寻找并进贡金丝楠木这一年。

如此看来，今日之前三殿、午门等古建，当为金丝楠木建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紫禁城在这次修复后，又历经沧海桑田，除了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的一把大火，更有多次火灾。一次次的重建，哪儿来那么多的金丝楠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前三殿的大柱，都是清朝时用松木制成的。

整个紫禁城中，惟一留下原汁原味的金丝楠木古建，只剩下位于紫禁城东南角的太庙。太庙享殿中那68根顶天立地的金丝楠木大柱，令人叹为观止。

今天，在北京地区，完整保留金丝楠木主结构的古建已是凤毛麟角，年代久远的自不必说，明清古建，除了太庙享殿，恐怕就是明长陵祾恩殿了。

长陵，是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它是十三陵中的祖陵，在北京十三陵中，其建筑规模最大，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也保存得最为完好。

在十三陵中，有三座陵有一种特殊的共性，那就是它们都主要以金丝楠木建成。这三座陵，分别是长陵、定陵和永陵。

以长陵为例，正殿祾恩殿是长陵的主体地面建筑，高大宏伟。它面阔九间，重檐四出，庄严壮丽，与故宫太和殿规制相同。祾恩殿全部用金丝楠木建成，大殿有60根木柱，特别是中间最大的4根木柱，高14.3米，直径1.17米，两个成年人都合抱不过来。

长陵祾恩殿完工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从建成至今已有近600年历史，从未发生过倾斜变形现象。撇开建筑技术不谈，可以说正是金丝楠木的优秀品质使得祾恩殿得以几百年来巍峨伫立，稳如磐石。那些笔直粗大的金丝楠木大柱，谁不眼红？连皇帝都眼馋。

没错，清朝时，乾隆就看中了这三座陵。当然，他并不是想自己死后鸠占鹊巢，而是看中了这三座陵中的金丝楠木，尤其是三座陵中的金丝楠木大柱。有一种说法是，“在清朝乾隆年间，1克金丝楠木价值等于10克黄金。即使那样，也很难找到。”这种说法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证实到清朝乾隆年间时，金丝楠木已是一木难求。

于是有了“乾隆盗墓”的传说。

据说，乾隆本想拆毁长陵祾恩殿，将其楠木大柱用到自己的陵上。但当时的吏部尚书刘墉、文渊阁大学士纪昀等汉族大臣听说后，都很着急，想方设法予以阻止。纪昀不

愧是“铁齿铜牙”，竟然搬出《大清律例》中盗墓“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的条款，让乾隆无话可说，只好暂时作罢。

但还是有“聪明人”跳出来，奏上一本，说明陵年久失修有碍观瞻，请皇帝批准“修缮”明陵。乾隆一看，心领神会，立即下旨对明十三陵来一次全面的整理修缮。当然，少不了密传口谕，要工匠将明陵上的楠木撤换下来。

当时，负责修缮明陵的是工部尚书金简、户部侍郎曹文埴等人，他们上了一道奏折，大概意思是，十三陵修缮范围较大，而楠木已经“采伐殆尽”，若仍照旧式修整，则长陵、永陵两处购求大木更难办理，请乾隆准奏将永陵来个“拆大改小”的方案，意即把永陵改小。

永陵是明世宗朱厚熜的陵墓，历时十余年建成，极尽奢华，《昌平州志》称“其规制一准于长陵，而伟丽精巧实有过之。”鉴于此，“拆大改小”的方案首先选择了永陵。

对明陵的“修葺”历时两年，完成之后，永陵、定陵的门、殿的形制全部被缩小。与此同时，修葺之后“多出”了不少材料。在事后的奏章中，列出了材料的明细，包括“大小楠木238件”等，这些材料的去向为“拟运回京城，以备各工取用”……

“乾隆盗墓”之事虽无确凿证据，但无风不起浪，这是因为，一是乾隆的确修缮过明十三陵，二是他曾公开赞誉金丝楠木为“天地至美”。乾隆对金丝楠木的特别喜爱溢于言表。

今天，“皇帝”早已成为一个历史专用名词，金丝楠木也不再为“皇家专用”。但是随着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不断升温，在高档古典家具行内，也不时传出对“皇木——金丝楠”的追寻之声，并将金丝楠木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尊贵代表”。

但是，真正的金丝楠木已经少之又少了，目前市场上的金丝楠木主要有三类：一是新金丝楠木，国家禁止砍伐且数量稀少，要冒很大风险；二是老金丝楠木，这类来源比较广，有从明朝及清早期的老房拆出来的；有在三峡搬迁区及内地古庙宇维修拆下来的——当年维修拆下来的金丝楠木在拍卖时还会被文物部门扣押；还有挖掘古墓挖出的棺椁，比如扬州汉陵苑广陵王墓“黄肠题凑”，全部由千年金丝楠木堆砌而成，其边角料做成的镇纸在博物馆小卖部要卖上千元；三是乌木金丝楠木，即阴沉木金丝楠木，是埋在河里或因地壳变迁埋在地下几千年的金丝楠木，主要出在四川。这三类中，尤以老料最为珍贵，尤其是大直径的原木老料，价格很高，一木一议，没有行情价。

正因稀少，金丝楠木更受到藏家的追捧，有人这样描述用金丝楠木制作的明清家具：

它纹理平素，既柔软又坚韧，温温淡淡，气质优雅。相较黄花梨，金丝楠木家具没有矫情做作妩媚的纹理，也绝不会有火星四溅的燎人嚣张，她只是素颜，清晰亮丽，不施粉黛，不美艳，却明媚动人，淡雅文静；相较紫檀，金丝楠木家具没有植入骨髓的深沉神秘，也没有威严奢华的气魄，她只是意味幽然，用绸缎般的笑容、恬淡的气质化解一切暴力和焦躁，令人温暖、塌实、贴心，就如同一杯清茶甚至一杯白开水。

但是，相关专家警告说，小心买到假货！因为目前国产的金丝楠木新材料基本绝迹，市场上仅流传下部分年代较久的家具是真品。很多做了一辈子木艺的工匠，都没有见过金丝楠木，一般民众，恐怕只能是听说而已。

寻找金丝楠木——众里寻它千百年，蓦然回首，它在何处？

责任编辑/薛立若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杨东海

链接

金丝楠木并非红木

如今，红木家具大行其道，为很多人所热衷。然而，究竟什么是红木，可能许多人并不清楚。

“红木”一词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名称，所以它没有相对应的英文单词，翻译时只能译为“Hongmu”。红木，作为一种家具原料，并不是某一特定树种的家具，而是明清以来对稀有硬木家具的统称。

2000年8月1日，为规范红木市场，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首次发布并实施《红木》国家标准。《红木》国家标准起草人杨家驹说，红木不是泛指所有红色的木材；有人认为红木家具泛指红色的硬木家具，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根据《红木》国家标准规定，红木是紫檀属的紫檀木类、花梨木类，黄檀属的香枝木类、黑酸枝类、红酸枝类，柿属的乌木类、条纹乌木类，铁刀木属及崖豆属的鸡翅木类5属8类33种材料的总称。用这8类33种材料制作的家具可称为红木家具。红木材质结构甚细至细，平均导管（管孔）弦向直径不大于20微米。红木心材材色都是经过大气变深的，其中紫檀木类为红紫色，花梨木类、香枝木类、红酸枝类为红褐色，黑酸枝类为黑紫色，乌木类为乌黑色，条纹乌木类和鸡翅木类为黑色。

具体说，33个红木树种是：檀香紫檀、越柬紫檀、安达曼紫檀、刺猬紫檀、印度紫檀、大果紫檀、囊状紫檀、鸟足紫檀、降香黄檀、刀状黑黄檀、黑黄檀、阔叶黄檀、卢氏黑黄檀、东非黑黄檀、巴西黑黄檀、亚马逊黄檀、伯利兹黄檀、巴西黄檀、赛州黄檀、交趾黄檀、绒毛黄檀、中美洲黄檀、奥氏黄檀、微凹黄檀、乌木、厚瓣乌木、毛药乌木、蓬塞乌木、苏拉威西乌木、菲律宾乌木、非洲崖豆木、白花崖豆木、铁刀木。

目前市场上容易以假乱真的假红木家具，主要是使用俗称巴西木、红花梨、高棉木、黑紫檀、铁木豆木等红木替用材料制作的仿古家具。如安哥拉紫檀及非洲紫檀为非红木的亚花梨类，属于硬木，但因管孔过大，不符合国家红木标准，不属于红木。产于南美洲的蚁木被称为巴西紫檀，产于非洲的古夷苏木被称为巴西花梨或巴西酸枝，产于东南亚、美洲及非洲热带地区的葱叶铁木豆等树种被称为红檀，这些都是硬木，是很好的家具材料，但并非红木。

楠木的种类很多，实际上金丝楠木的学名叫紫楠，“金丝楠木”只是一种俗称。楠木的色泽淡雅匀称，伸缩变形小，易加工，耐腐朽，是软性木材中最好的一种。所以，金丝楠木是软木而非硬木，自然更不是红木了。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古筝用什么材质做比较好，一直以来颇有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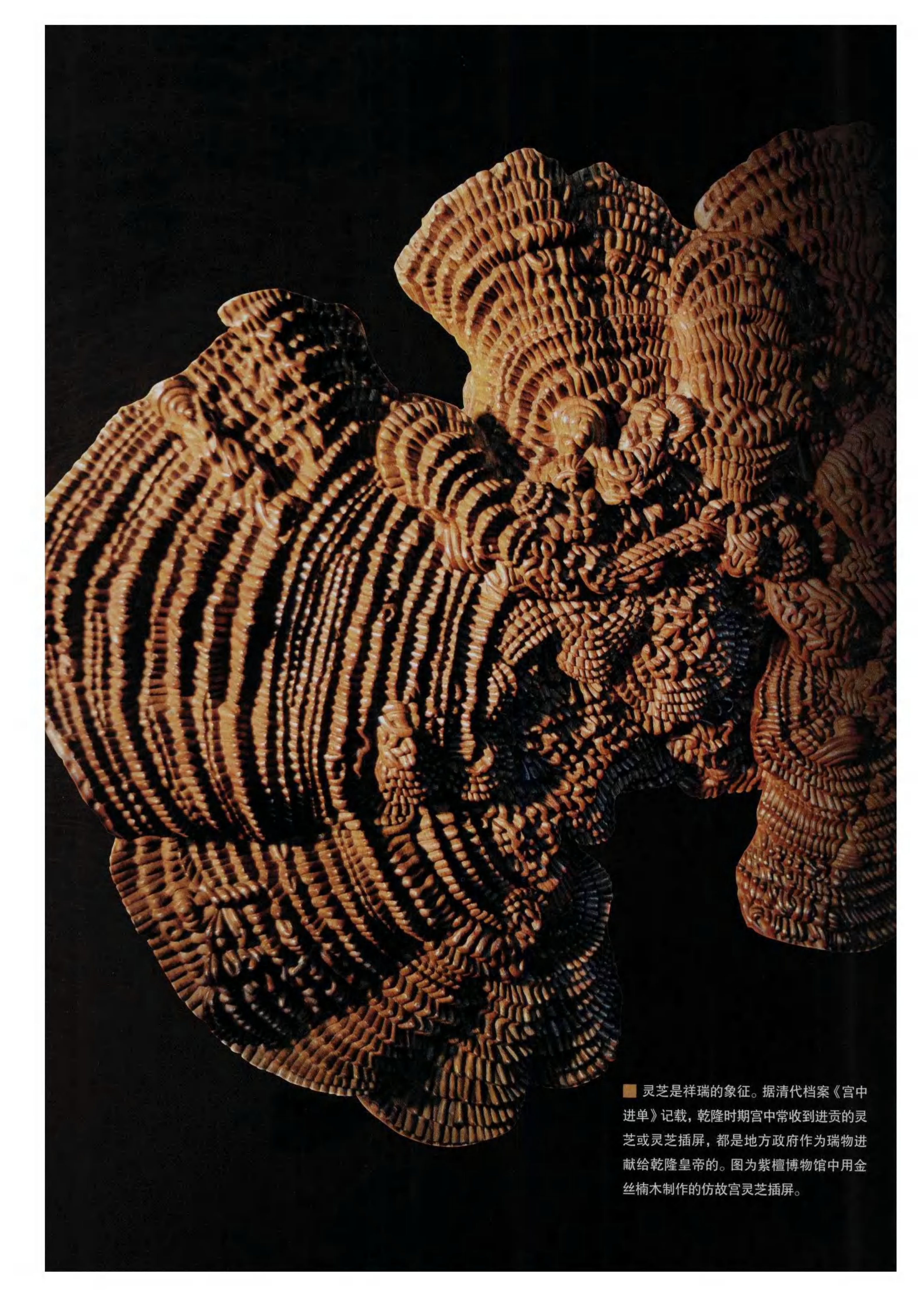
实际上，古筝并非用一种木材制作而成。古筝的面板大多数采用桐木制造，而筝首、尾、四周侧板，有用红木做的，也有用金丝楠木或其他木材做的。古筝的音质主要取决于面板和琴弦，周边用料对古筝的音色略有改善，以老红木、紫檀、金丝楠木为佳。相对来说，红木类系列古筝音色醇厚、清脆、明亮，适合演奏明快的现代乐曲；金丝楠木类系列古筝韵味足、音色古朴典雅，更适合演奏古典乐曲。（下图摄影／薛立若）



紫檀原木

黄花梨原木

乌木原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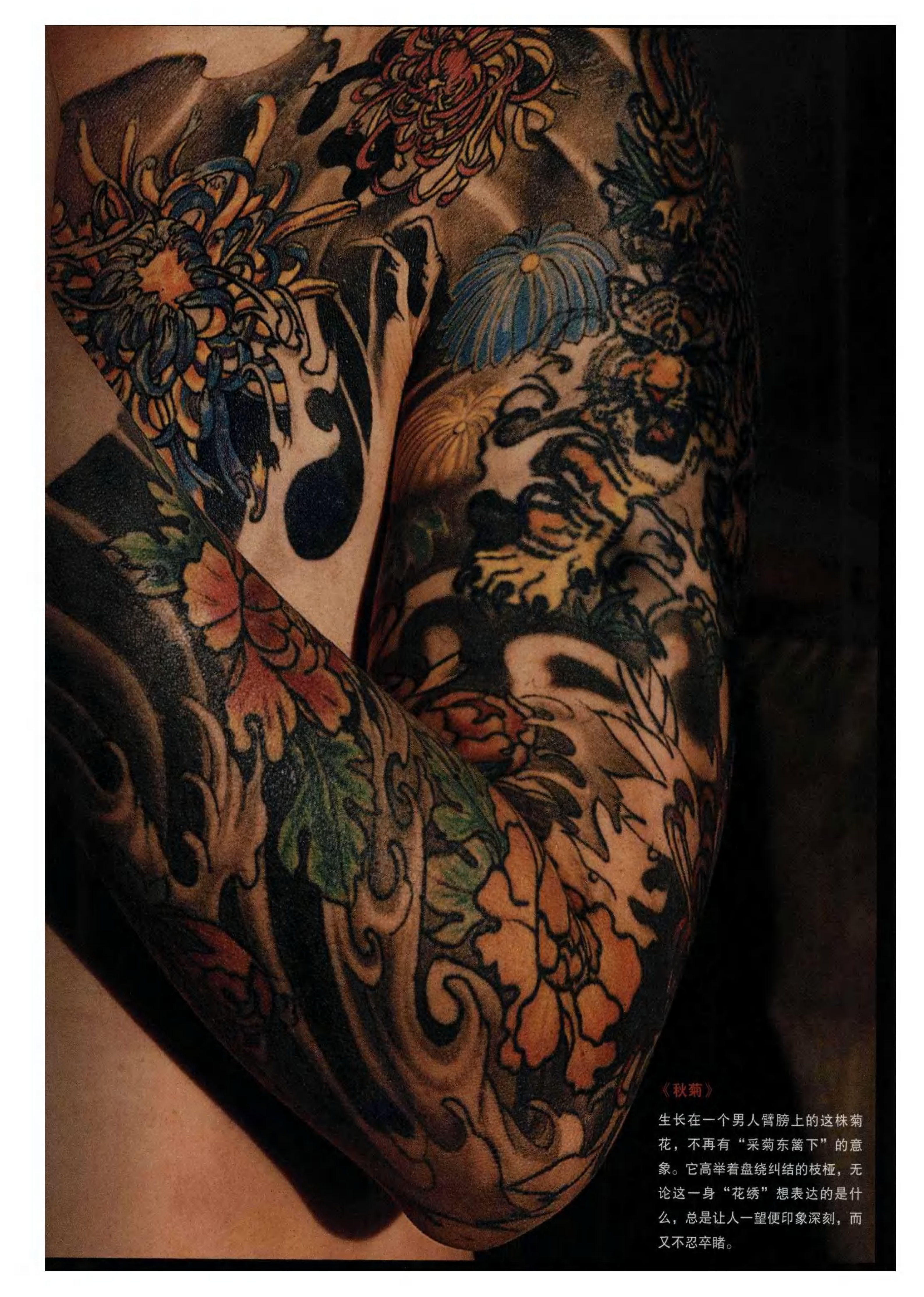


灵芝是祥瑞的象征。据清代档案《宫中进单》记载，乾隆时期宫中常收到进贡的灵芝或灵芝插屏，都是地方政府作为瑞物进献给乾隆皇帝的。图为紫檀博物馆中用金丝楠木制作的仿故宫灵芝插屏。

文身 美丽的异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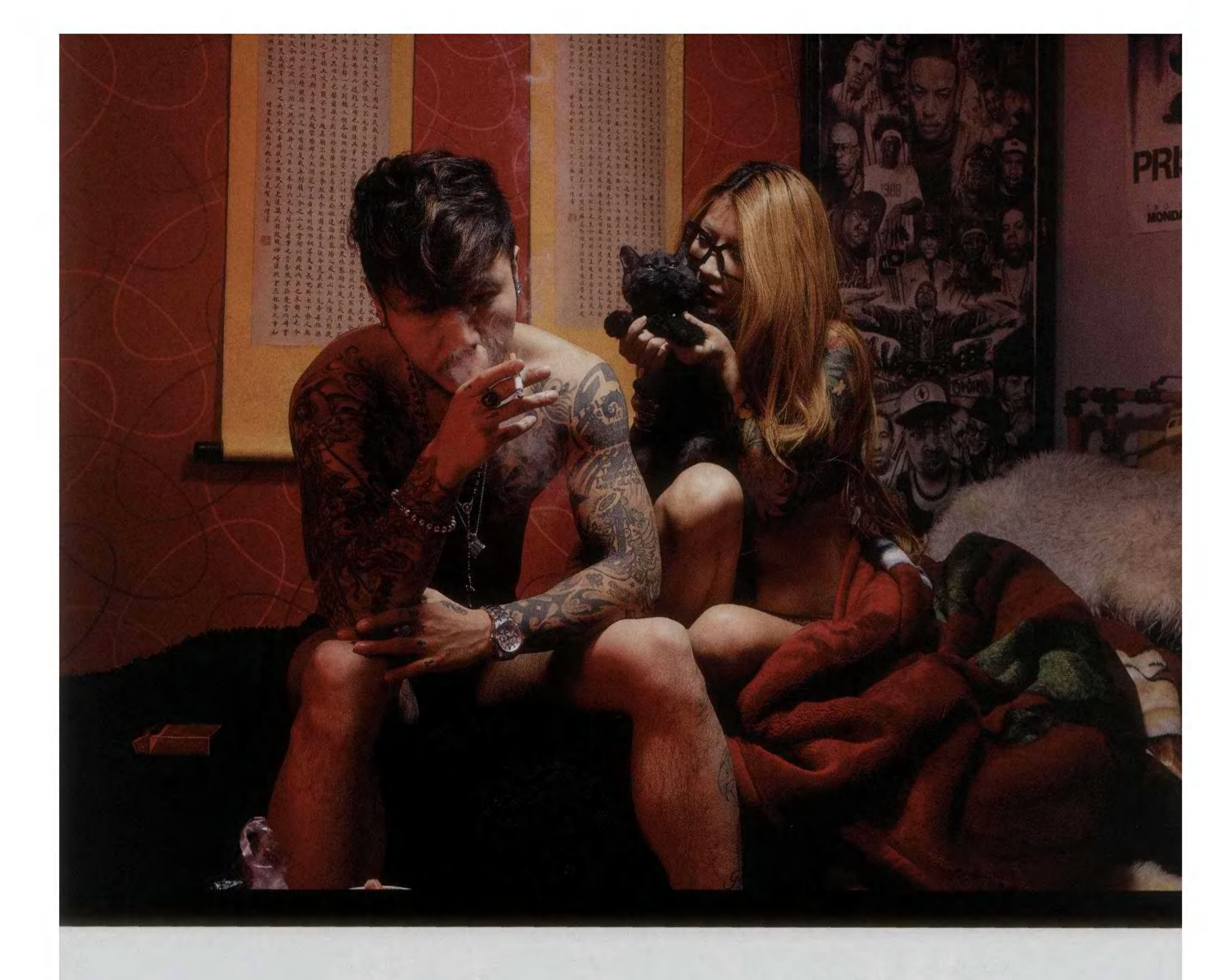
撰文/子今　摄影/耿艺 等

纵横南北纬二十几度的广大空间，与古文明同源的文身事件，实际上在东西世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象。倘就中国古代而言，文身多被用作刑罚或士兵的标志，作为对身体的修饰却基本严令禁止……文身在中国，从未被主流社会所接纳的原因是什么？它为何在今天仍难以打破人们异样的目光？



《秋菊》

生长在一个男人臂膀上的这株菊花，不再有“采菊东篱下”的意象。它高举着盘绕纠结的枝桠，无论这一身“花绣”想表达的是什么，总是让人一望便印象深刻，而又不忍卒睹。



《联合国》

摄影师耿艺为小白和朋友的这张合影取名《联合国》，遍身的刺青图案、被染金的头发、NBA球员众生像，连同小白怀中的异种黑猫，这些都代表着西方意识。谁又能想象，二人身后高悬的中国书法，内容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引为经典的三国时诸葛亮的著作——《前后出师表》，小白内心的矛盾可见一斑。

矛盾的小白

生于1982年的小白，在中国的动漫界、乃至整个80后中，都称得上极具号召力的知名人物。今年2月，她凭借作品《Si loin et si proche》——《这么近，那么远》，在日本拿到了第四届"国际漫画大赛"的最高金奖。

作品延续了她一贯的创作风格——就像她那本一出版就很快售罄的《青花》，主题是一个个比敦煌飞天还要美好的女子，翩然于仙境般的花前月下、繁茂藤蔓中。这些完美得简直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她们雪白的颈项，婉约的背部，或纤纤玉臂、撩人玉腿上……总有各式各样的文身图案相伴。所以，小白曾经这样总结说："《青花》啊，是青花瓷那个青花，也是刺青的青花。"刺青，也即文身，《青花》的外文版，译名就是《TATTOO FANTASY》——文身幻想。

小白的父亲是个"范进式"的老知识分子，因循守旧，

小白的父亲是个“范进式”的老知识分子，因循守旧，给了她一个很传统的文人之家。她却在小学看电影《红樱桃》时，“抛开了纳粹的政治色彩”，看到了文身的美。

一辈子郁郁寡欢，母亲从商，不过经营的是一家书店，父母给了她一个很传统的文人之家。意味深长的是：2005年3月，大学即将毕业时，小白顺利地找到了工作、签约了一家公司，然后她选择了一个出人意表的庆祝方式——在手腕上刺青。

当时只是刺了一个小小的图腾，她说：“我生来就有一种叛逆的冲动，一直都是在克制。找到工作意味着我能够自食其力了，所以我就自由了！我想做点儿以往被父母严令禁止的事情，譬如打耳洞、染头发……文身。”她说到做到。

大约两周前，我在摄影师的电脑里，第一次看见小白时，立即感觉她的与众不同。在那段视频采访中，小白坦陈：她小学六年级时看电影《红樱桃》，就“抛开了纳粹的政治色彩”，看到了文身的美。她还说：“文身会上瘾，有了一个就想第二个，连文身的痛都是让人上瘾的。”在那个瞬间，我首先判断她是一个前卫的时尚先锋。

在我的要求下，小白褪去外衣，露出了胳膊上绚烂的“七步莲花”，我一时忘记了那是刺破肌肤留下的印痕，在同样美白的瓷瓶上，我见过同样的图案。而且，我的脑海里回旋的都是“步步生莲”的佛教故事……

她生在传统的家庭，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但她从事着最时尚的职业——自由插画师和兼职文身师。她选择了文身来叛逆传统，但又同时选择了独特的图案来记住传统。她的所作所为，就像她倾诉的那样：“东方的含蓄与西方的开放，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就像两匹并驾齐驱的烈马，在我心里奔跑、碰撞。”

“没有文身的人就不是好出身”

除了在相熟的朋友面前，尤其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小白并不常常以文身示人。我所结识的很多文身者，在陌生人面前，也总有那么一点不易觉察的不安，这和我有文身的法国朋友极为不同。

不独如此，一直让小白耿耿于怀的是，她着力创造具有中国古典美的漫画形象，但是，从来没有人承认她是传统风格的艺术家，前一阵文化部通过了她“全国十大优秀漫画家”的称号，不过在她的个人介绍里，特别说明她是一位“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新漫画家。

“他们就是不让我和‘传统’两个字沾边！这都是从我拥有文身开始的，我内心的传统、保守这些东西，因为我有个文身就全都不存在了一样。”这样说的时候，她满脸都是郁闷和不解的神情。

内心充满矛盾的小白，让我对文身的来龙去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翻检历史，很快就惊奇地发现，在世界南北纬20几度之间，文身是最原生、原始的文化艺术，它大范围存在，差不多和大多数的古文明起源都可以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在其后的发展中，才酿成它在东西方地位的



古物留证

文身的历史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且看甲骨文、金文中的“文”字的若干版本，都是一个站立的人，胸前刻画了“十、乂、心、点”等等花纹。右页图中是湖北荆州市博物馆的“兵避太岁戈”，戈身部的人像身上刻画鳞片、腰部文蛇，对照历史，春秋战国时荆门地区是楚地，文身在那时已被边缘化。摄影／金陵

天壤之别。

埃及金字塔内，有存放超过四千年的木乃伊，其中男女贵族身上都刻有明显的文身杰作。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曾经在一篇手记里这样记述：“没有文身的人就不是好出身。”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84－前425年。那时的古希腊人盛行文身，文身部分地成为上层社会的象征。

19世纪末，欧美社会的上层人士同样钟爱文身，从瑞典国王别尔纳扎特，到希腊国王奥斯卡尔及其王后，都做过文身。英王乔治第五，曾在自己的左前臂上文刺了一条杂色的飞龙，法国亲王法兰西斯则在右臂刺了一条飞扑甲虫的小蛇，这些都表示他们具有不可侵犯的贵族身份。死于萨拉热窝行刺事件的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他的后腰右方也刺了一条大蛇的图案，据说是为了起到神佑和护卫的作用，但一颗悲剧的子弹仍然洞穿了他的身体。

而今，文身已经成为了欧美人的“宠物”，美国的一个媒体做过一项统计，在美国大学里18岁到29岁的群体中，大概有36％的人至少有一个文身标志，而且这个数字还有逐步增长的趋势。

我曾经有过一位来自法国里昂的同事，是位热情而又腼腆的电子工程师，他的左前臂有一枚小小的蓝色刺青，一片轻盈的羽毛像绣品一样精致。他告诉我，人们不会因为他的身上比其他人多那么一个小小符号，而觉得他有什么不同，这个符号只是他渴望飞翔的一种表达。

近代的欧美人对于文身的了解，来源于那位充满传奇与悲剧色彩的库克船长，而此前西方史中对于文身的记载是个很漫长的空白期。

1767年，英国皇家学会为了观察金星最接近地球时的状况，选中了詹姆斯·库克来组织一支深入南半球的远征队，之后他便指挥着“奋进”号轮船从普利茅斯起航了。八个月后他们绕过合恩角，登上了南太平洋的塔西提岛，当地土著的文身引起了库克的注意。在之后的数次航程中，他详细调查了这些土著身上的纹样，数次参加了他们的文身仪式，并且写入他的航海笔记。

不幸的是，1779年2月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酿成了库克一行与土著们的冲突，他在混战中被杀。

这位冒险家去世以后，他的笔记被公布于世，人们痴迷于其中关于文身的五彩缤纷的描述，土著文身者被带到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亚人和欧美人组织的马戏团里参加表演，人们竞相文身，并以此为荣。由于欧洲人是根据库克笔记中的线索“发现了文身”，于是英语里的文身就被称为“tattoo”，也即塔希提语里的“ta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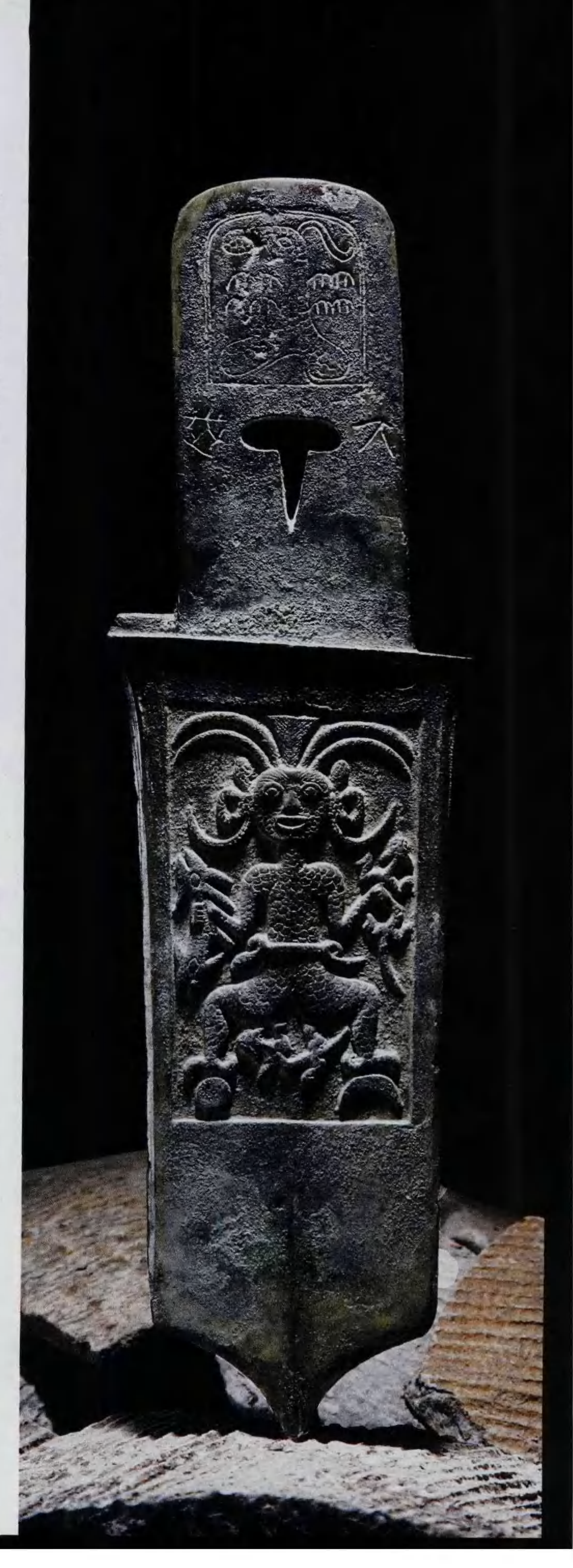
在库克的有生之年，恐怕不会预想到，他的笔记会带给欧美世界一种新的审美观——文身为美。

黥刑留下的创痛

文身在中国的境遇明显不同。

《左传》、《史记》中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述：商朝武乙末年，周部落君主公直父，欲将王位传给三子季历，两个哥哥得知父亲周太王“欲立季历以传昌”之后，赶紧“亡如荆蛮，文身断发”——远赴偏远的江浙，剪断头发，在身体上刺青，以表示自己不再有继承王位的资格，让贤于季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一，大约3000年前，周文王的两个哥哥所投奔的“荆蛮”，即吴越地区是有文身习俗的，兄弟俩“文身断发”，也算是入乡随俗；其二，这一习俗与



古代中国文身记

绘画／李智敏 等



刑以墨

▲ 在受刑人的脸上或额头上刺字或图案，再染上墨，作为犯人的标志，这就是墨刑，它是奴隶制时代“五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墨刑使受刑人蒙受耻辱，更使之区别于常人。后代又演化为“刺配”，以及对奴婢刻字，以标识身份，防止逃跑。

▼ 和今日军队入伍拒绝文身者不同，宋代和其他一些朝代的军队士兵则常常刺上文身。唐末、五代群雄并起，兵连祸接，为防止士兵逃走，后唐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开始强迫士兵刺字，宋代承袭此弊，刺民为兵，有防止士兵逃跑的作用。而北宋王彦所率领的八字军，在脸上文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的字样，既表示抗金的决心，也与当时的风气有关。

入伍行

周天子所踞的中原地区是大有差异的。断发文身者，非但不可以继承王位，还必须亡命他乡。

差不多相同时期的《说苑·奉史》里，越国使臣“诸发”不辱使命的故事，同样能够印证了这样的差异。据载，使者诸发奉越王之命，拿一枝梅花为礼，求见梁王。当时，梁王有一个大臣名叫韩子，嫌弃此礼太轻，想要羞辱来使。于是正告诸发，按照中原的习俗，“冠（戴帽子）则得以礼见，不冠则否”。诸发不卑不亢地反诘：“你们出使到我们越国，要不要先断发文身呢？”梁王闻听此言，自觉失礼，于是接见了诸发，并下令赶走韩子。

梁王最终郑重地接见了诸发，但是中原当然不会接受“文身”的习俗。缘何？春秋以来，中原民族渐渐开始接受儒学的统领。儒学认为天下孝为先，孔子弟子曾参所著的《孝经》又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儒家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原始社会时期的文身，树立自己孝道的思想。

其实文身在中国古已有之，刻在龟甲上的“文”字曾有几个版本，虽然小有差异，但都仿佛一个站立的人，前胸刻画着各种符号，算是“文身”起源的很直观的证据。之后，“雕、黥、刺、剺、镂、绣、黵、扎、刻”这些名称都与文身相关。

文身所使用的工具有植物的刺、动物的骨骼、铁器时代后的针尖、刀刃。总之，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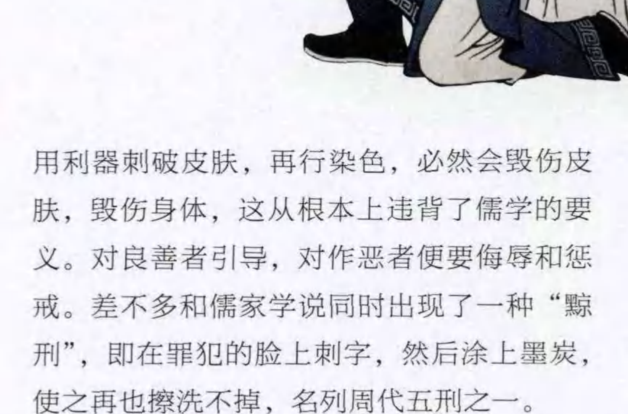


◀五代后周开国皇帝郭威虽贵为天子，却时常被人议论年少轻狂时的无赖作为。其少年时文了花颈——一只青雀振翅欲飞，所以在做皇帝以后仍然被人唤作“郭雀儿”。事实上，古代除受刑文刺外，便是役人贱者有这样的风习，他们或者是从蛮夷族群学来，或者以文身表示自己好勇斗狠，不惧他人。



▲在起源之初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文刺，在古人思想和社会观念下，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意义。《水浒传》中就有数位身带刺青的好汉被描写，从燕青遍体绣满花牡丹，到阮小五胸前刺着青郁郁一个豹子；从史进刺有九条青龙，到脖子上文虎头浑身刺虎斑的花项虎龚旺……但这些人的文身为何而刺？人们对他们的评价是赞誉还是批判？一个词——“满身反骨”即可说明一切。

▼古代最可歌可泣的文身者也许就属岳飞了。“岳母刺字”的故事激励了后人报效国家的决心，但也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疑点：宋人的笔记和野史均无此记载，包括岳飞的曾孙岳珂所著的《金佗萃编》也没有这样的记录。相关的记载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岳飞传》，书云：“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书中却也未提此四字出自岳母之手，很可能也和宋代军人有刺字之风相关。



用利器刺破皮肤，再行染色，必然会毁伤皮肤，毁伤身体，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儒学的要义。对良善者引导，对作恶者便要侮辱和惩戒。差不多和儒家学说同时出现了一种“黥刑”，即在罪犯的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炭，使之再也擦洗不掉，名列周代五刑之一。

黥刑也称墨刑，同劓、宫、刖、杀相比，墨刑显然是最轻微的。这种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把对身体的毁伤施加于身体的明显部位，无法掩饰，又因违背了儒家孝道宗旨，让人感觉耻辱。秦末农民起义者英布，就曾被秦始皇处以黥刑。《史记》中索性称他为“黥布”，他的传记就叫《黥布列传》。

说起来，秦始皇所为焚书坑儒、修筑长城两件“大历史”，也与“黥”不无关系。李斯请奏的《焚书令》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天下敢有藏书者……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黥，就是黥面之刑了，而“城旦”，是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可以想见，那时胆敢私藏禁书的人，多半就被面刺黑字，用作修筑长城的苦力了。

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规定将当受黥面之刑者“髡钳为城旦舂”，——男子改为剃去头发，女子则改为四年的舂米苦役。这应当说是文明的一大进步了。此后直至汉末，黥面未再实行。

但是，黥刑没有消失太久，就又以“刺配”的形式死灰复燃了。

《水浒传》中的教头林冲，被“刺配沧州”；打虎英雄武松为兄报仇，杀了西门庆和潘金

我们熟悉的其他关于刺青的故事可能来源于《水浒》。据说日本有个研究《水浒传》的学者叫佐竹靖彦，他干脆把智取生辰纲的晁盖集团，取名曰“刺青团伙”。

莲，也被官府“刺了两行金印”。后来他的典型扮相中，脑门上有个孙悟空式样的紧箍头饰，应该也是为了遮盖金印。直到清代，康熙大帝对奴婢刺字，头一年刚下令“改刺小臂”，结果奴婢纷纷逃跑，不利追捕，第二年又改成了刺面……

总之，在中国古代的主流社会中，黥刑就是一种耻辱、羞辱的印记。

汉族的异端

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有一个庞大的黑帮王国，其中的青帮掌门杜月笙被称作“三百年帮会第一人”。当时加入黑帮的规矩往往有两项，一是饮酒盟誓，一是刺青标识身份。连大佬杜月笙也不例外，在他的右手腕上刺有一只蓝靛的铁锚。

熟悉杜月笙的人都知道，他本人喜欢一年四季身着长衫马褂。晚年时，杜月笙曾向人透露他爱穿长衫的秘密。他这么做就是因为手腕上刺有花纹，长衫袖子长，撸下来，便可将“刺青”遮盖无遗，以显露他不同于一般黑帮成员的文质彬彬的作派。

从有坏人刺青，到刺青的都是坏人。这是中国人沿袭下来的难以撼动的逻辑。

不能说近现代黑帮的刺青与黥刑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也是黥刑在历史上逐渐演化的一个结果。

“岳母刺字”是个例外吗？是也不是。

岳飞刺青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岳飞曾经是抗金英雄王彦的部下，而王彦麾下令金人闻风丧胆的“八字军”，得名于脸上所刺的八个大字：“赤心报国，誓杀金贼。”

宋时行伍中文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同的文身图案，也能代表不同的军队从属关系。与岳飞之死相关的南宋四大名将之一的张俊，抗金不力，却很有经商的智慧。他让士兵在杭州为他每天搬运石头，营造后来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多次出现的著名酒肆：太平楼。苦不堪言的张家军接二连三地逃亡，张俊便想出一个绝招，“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目的是为了“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不久，一首士兵歌谣便在张家军里传唱开了：“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我们熟悉的其他关于刺青的故事可能来源于《水浒》。知名文史学者虞云国在《水浒乱弹》里，用了好几节专门写刺青。因为，梁山好汉中，刺青者颇多：史进肩膀胸膛刺有九条龙，满县人都叫他“九纹龙”；阮小五前胸刺着“青郁郁一个豹子”；而燕青的文身更是美不胜收，“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于他”。

据说日本有个研究《水浒传》的学者叫佐竹靖彦，干脆把智取生辰纲的晁盖集团，取名曰“刺青团伙”。

水浒第八十一回有一段李师师观看燕青



神龙

道符“罡”

关公

虎

鲤鱼

文身与江湖

文身虽是个性的展现，但文身图案也并非全无讲究。例如，有一些文身图案就与所谓的江湖、黑道相关。在台湾，还有人专门研究过监狱里的文身，将文身与犯罪直接联系在一起。江湖上的文身图案什么样？

“神龙满背，权威尊贵；青龙过肩，财路无边；青龙盘腿，财如洪水。关公在前，人身安全；关羽在后，大哥财厚；身文猛虎，必有大福；鲤鱼跃起，福禄无比，梵文密咒，神灵保佑，肩有飞云，快乐平安……”同样是龙、虎、关公，还有什么人能文，什么命能背得起之说。而且也有一些忌讳去文的图案，例如“哪吒降龙，钟馗伏鬼”，哪吒和钟馗就是不受欢迎的图案。

即使是此道中人，也会这样告诫道：“图案有讲，文前多想；易文难祛，深思熟虑。”

从“忙文身”到“洗身忙”

中国的文身工作室如雨后春笋，但同时它们也处在尴尬而敏感的半地下状态。迄今为止，文身在中国还没有被纳入“医疗美容”或其他任何行业，文身师大部分都是在美容院、酒吧或者自己家中为顾客文身（图4）。另一方面，文身工具大多丢弃了原始的银针（图1、图2 摄影／秦颖）。如今不单有文身机，还有洗文身机。洗文身者多为“七零后”、“八五前”，随着思想成熟，他们认为文身会影响个人形象，甚至为当初的“幼稚”行为而后悔（图3）。摄影／李志雄


1


2


3

文身的描写：数杯之后，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一身纹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得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这个锦体社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不过它是存在于南宋的都城临安。成员即由刺青者组成，迎神、比武是他们大显身手的两大节目。例如，临安每逢二月八日祠山真君生日，六条龙舟游戏西湖，其中就有“锦体浪子”，“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出尽风头。

如果联想西周“太伯奔吴”的故事，就会明白，江浙一地在衣冠南渡前，当地本就有文身的习俗。如旧版《辞海》对文身的定义的解释，断发文身曾为吴越之俗，目的是“以避蛟龙”。也就是说，文身与当地人的生存环境相关，有图腾的意义，旨在巫术般的避害效果。南宋之都盛行文身，可能与学蛮夷之俗有关。

还有经常被引为“文身在古代曾流行过”的证据之一的是：唐代段成式在奇书《酉阳杂俎》中说蜀地的人“工于刺，分明如画”。

当时还有个荆州人叫做葛清，堪称白居易的超级粉丝，他“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而且经常都袒胸露臂，且行且歌。京都的人干脆叫他“白舍人行诗图”，他确实因为刺青而“名



4

垂青史”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荆州也并非传统的汉地。

即便开明如唐宋，文身仍然不入宗室，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

会昌年间，长安文身者颇多，可能其中小混混也居多。当时的京兆尹薛元赏对此风极为反感，主持了“严打”：一次就处决了30多人。严打过后，太宁坊“力者”（小混混）张斡，便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以示抵抗。结果，还是被京兆尹给“杖杀”了。

在宋代，《宋季三朝政要》有载，有个名叫李钫孙的举子，少年轻狂，爱上了文身，在大腿间雕了一个小小的玩偶图案。在科考复试时，他担心监考官以为他挟带舞弊，便在两腿间“蒙纸其上”，力图盖住文身。可是，他很悲剧地被发现了，引得搜身者一声惊叫："此文身者！”结果呢，“事闻被黜”，李钫孙的功名泡汤了。

大概因为雕青率先流行于行伍，而刺青的武人容易给人以一种剽悍难缠的恐怖感，让见者躲避不迭，惟恐受到无端的伤害。因而在北方，北宋中期，刺青还是被视为不端的行为，文身者往往也令人侧目。

天圣二年（1024年），有官员说，和尚里有人“间或为盗”，建议今后两种人不得出家为僧：其一是有犯案记录的，其二就是“文身者”。皇帝下诏同意，显然也把文身者当作不轨之徒。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皇帝曾经明令，皇

她没有留下名字，拍照的时候也不愿意留下脸庞。据杨鹏介绍，她其实不像“看起来”那么另类：她是做风险投资的，收入不少，开着奔驰来的……

室赵姓后裔“不许雕青”。而后，明清两代，直至民国，文身都是被严令禁止的。

依然另类

唐宋元明清已经远去……

北京刺客文身店的楼下是一间发廊。暮色中，远远地，我就看到了霓虹灯上的三个字：“发新设”，如此“不通”的取名办法，只能说标新立异便是当今的时尚。“发新设”里面有好几个技师和小工，正围绕着惟一的一名剪发女客。推开二楼的文身店门，却远比楼下的发廊热闹和忙碌。

店主杨鹏和助手正在给一个漂亮的女孩文左臂。女孩约莫二十五六的样子，穿着精致的黑色抹胸裙。上周，她已经花了2000元在左胸文了一条殷红的锦鲤。而这次，她选择的图案是一个面目狰狞却相当流行的骷髅头，花费大约5000元。

工作已近尾声，文身师给女孩抹了一层凡士林，她站了起来，感叹：“唉，太痛了，太high了，受不了了。”随后点燃了一支烟，熟练地吐起了烟圈，大大咧咧地请教杨鹏：“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好好想想怎么把这东方的鲤鱼和西方的骷髅联系起来啊？！”话音未落，人已离去。

她没有留下名字，拍照的时候也不愿意留下脸庞。据杨鹏介绍，她其实不像“看起来”那么另类：“她是做风险投资的，收入不少，开着“奔驰”来的。她文这个骷髅头，是为了纪念自己刚刚逝去的爷爷。我们这里还有个客人，最宠爱的宠物狗喜乐蒂去世，他就在身上文了喜乐蒂的头像呢。”

闲聊之间，又有客人光顾。她们的打扮很中性，穿着宽大的T恤和肥大的短裤，脚踏塑料拖鞋，头发剪得超短，像男式的板寸。女孩甲手里拿着一个蝙蝠的图案展示给我看。她说，她们是青年篮球队的队友，其中一个女孩曾经在这里文过身，很多队员都在这里文过身，所以，她也要。

“你的父母知道这事吗？教练呢？教练同意吗？”我问。

“当然不知道。我得瞒着他们。”女孩不好意思地笑了，“但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我觉得这很漂亮，也很有个性。美国NBA球员，不都有文身吗？”

“你怕痛吗？”我提出这个一般人拒绝文身的第一理由，而且自以为知道答案。

文身有多痛？我曾经亲身体会了一下。以文身机当笔，纯净水当颜料，刹那之间，胳膊上留下了3厘米长的一道线。啊，一种痒痒的、异样的触觉，但痛楚还是清晰的。

“1891年电动文身机的问世已经极大地减轻了文身的痛苦。文身都不用打麻药。”店主杨鹏告诉我，“饶是如此，简单的一道线是很难体会文身之痛的。你需要想象，文一条花臂或者一个满背，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每天6-8小时的文刺。头一天可能是轻微的痛觉，但第二天就要开始在没有愈合的伤口上



享受文身的淑女

自由，作为西方文化中很重要的价值观，引发了众多“亚文化”，文身即是其一。于是“文身”和“淑女”两个中国人脑海里最不搭的词汇，可以自然地连接在一起，绚丽的玫瑰也可以真的在人体上盛开。摄影／David Lees

再加工了。所以，那种疼啊，很多人都难以忍住眼泪。”

那个女孩果然回答：“有点怕，但我觉得我能忍住，要美总要付出些代价。”

我接着又发问：“你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吗？”

“知道啊。”女孩回答，“但是你说，割双眼皮，丰胸，隆鼻，瘦身……好多医疗美容不也在毁伤身体吗？”

时代发展至今，发肤受之于父母的概念几乎消失。无论是疼痛还是古训，似乎在今天都不会成为阻挡了，但中国的文身族却大多还要承受对非主流的排斥的眼光。

我想起日前联系过的无锡文身师陈玦，他本是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的产品经理，他在去法国进修时迷上了刺青，给自己的手臂



1 2

传统图案的“极限”

图1中那张原本敦厚朴实的中国面孔，在用菘蓝色文满传统的饕餮纹以后，变得极为奇异，甚至有些狰狞。正如文身者的自述那样，他希望人们觉得他强悍、无敌。图2中的北京女孩儿则把古典的中国道教“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的护佑神旨文在左臂，同时她又不忘在右臂文上“无政府主义”的英文缩写和标志性符号，来表达内心的反叛与对抗。

“绣”上了一位跃马扬枪的中古骑士，结果回到公司就被婉言规劝辞去了职务，理由是他的形象与公司产品的形象不和谐。

“妈妈疼我，从不责怪我不外出挣钱，并且愿意让我终日待在家中通过网络了解世界，看看书和电影儿打发时间，从而避开外界那些带着歧视色彩的目光和言语。感谢母亲，她真的很伟大。”有个北京女孩儿因为文身得到个绰号——大花猫，她就坦诚自己给他人的负面印象，她心目中那优美流畅的文身图案极少被人认可。

小白告诉我，她在国外旅行，在海滩上穿泳装便会露出文身，然后必然引起惊叹和围观。而在中国，“如果被长者看到我的文身，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个好人。”



图3的文身图案是一副工笔重彩的《桃花扇》，这幅不以国画颜料、墨、宣纸为材料的"美图"变为文身的图案，便一下子失去了传统的感觉。而图4中的女孩儿全身心地迷恋"能跟随陪伴一生的画儿"，那些盘旋在她肌肤上的青色凤凰们，也让她付出了很大代价。她的母亲总是婉言要求她留在家中，借此躲开别人异样的目光。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要做就做最特别的那种"这是小白对自己的"一句话告白"。选择了文身，这种依然不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的"美"，就等于她把自己列入了特立独行的异端。

尽管她一再强调自己很传统，但实际上她并不传统。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之一是中庸，即不过度，这也包括审美标准和倾向。故而中国从来也不提倡另类，不提倡与众不同，标新立异。而她却要"最特别"，这种观念，显然与西方文化更为吻合。

我终于明白，历经千百年，文身在中国的地位却始终未变，就因为它的本质是异样、非正常的，而非正常是不能在主流社会里大行其道的。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南洋华人婚礼

一场回不去的家国梦

■ 撰文／王琛发　摄影／尤泽祥

当待嫁的中国姑娘习惯于把白纱作为婚服的首选，当西式婚礼成为中国家庭普遍接受的一种形式，在南洋华人社会，却依然保留着结婚时行“上头礼”的传统。大喜之日，父母要用红线替孩子束发，甚至至今仍有人为儿女穿戴上明朝礼服完婚。这看似奇怪的仪式背后，实则隐含着海外华人忠、孝、节、义无处安放的悲凉。

■ 早期下南洋的华人，把家乡沿袭了千百年的生活方式带到海外，落地生根。婚姻大事，自然更要遵照故乡的风习。然而，就如同左图中这间精致华丽的婚房，分明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韵致，但仔细想来，却又依稀可见异乡的痕迹。

供图／厦门华侨博物院

“消失”的六礼

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受华商吴士奇的邀请，福州名医力钧前往新加坡为吴父治病，事毕顺路游览槟城、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生平第一次游历南洋的力钧，偶然发现当地男女的婚礼颇有特色，于是就在《槟榔屿志略》一书里写道：

“槟榔屿风俗，甲于海南群岛，良由守家礼、重文教，昏则六礼具备亲迎，不行于中国，尤于海外。”

力钧所说的“六礼”，指的是成婚过程中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这种婚俗始创自西周时期。纳彩是择配、提亲的意思，通俗的说法叫“说合”。所谓“问名”，一般是由媒婆带着写有男方姓名和八字的大红纸到女家“讨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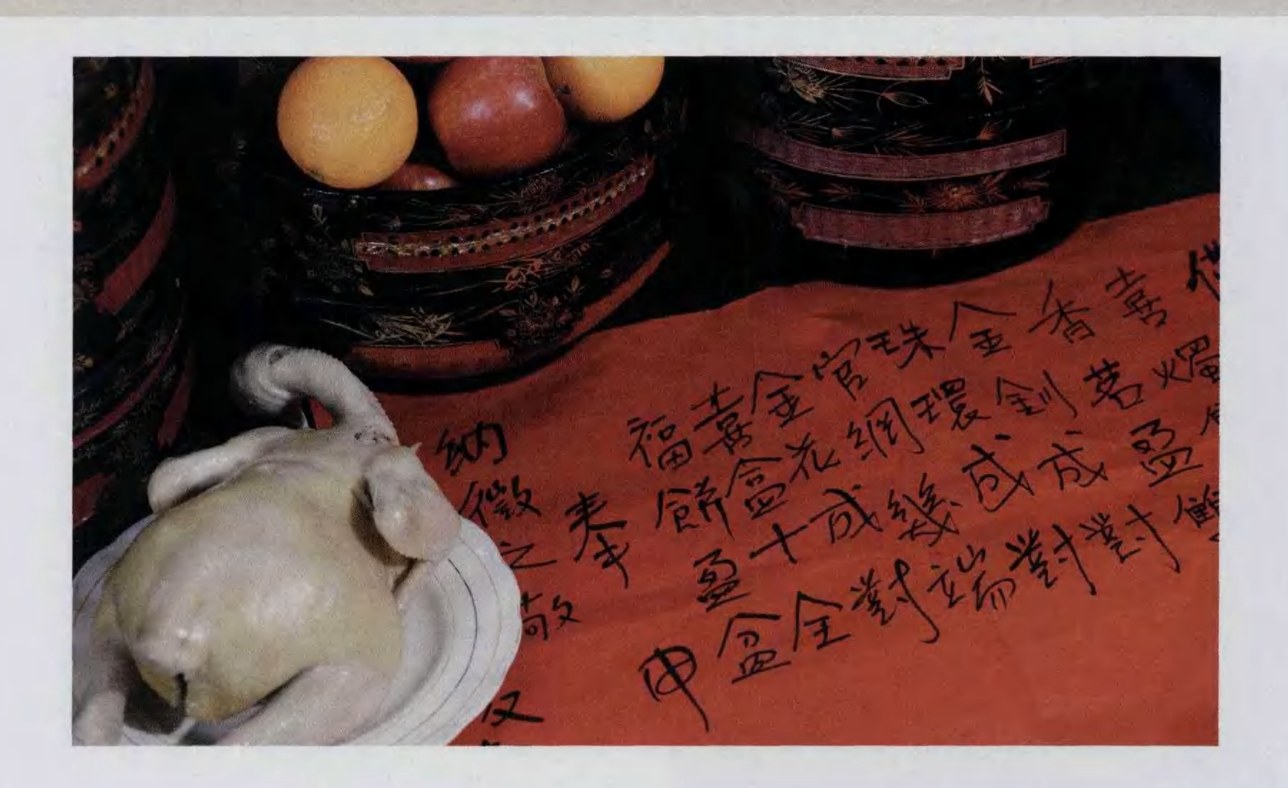
化繁就简的中国内地百姓恐怕想象不到，定居南洋的华人，却在婚礼流程上因循如旧。男女婚姻，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依靠算命来决定，以确保男女双方能够白头偕老。

字”，女家同意了，也把女儿的八字写在大红纸上，交给男方找算命先生配婚。一旦确定八字相合，就可纳吉——男方正式上女家提亲了。

明清以降，中国内地完整的六礼已不复存在。根据《平阳府志》的记载，历来守传统讲规矩的山西人，在乾隆年间也只遵循问名、纳彩、请期、亲迎四礼，有时甚至连“亲迎”——新郎亲自到女家迎娶新娘也省略了。

化繁就简的内地百姓恐怕想象不到，定居南洋的华人，却在婚礼流程上因循如旧。男女婚姻，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依靠算命来决定，以确保男女双方能白头偕老。即便是中间发生家庭纠纷，也只能归咎于宿命的安排。如此一来，的确成就了许许多多的宽容忍耐、儿孙满堂。东南亚这片以闽粤人为主体的社会，倒成了延续中国南方民俗的另一片中华文化版图。直到上世纪初，南洋华人还习惯性地把未婚女子视为不能随便出门的“小孩”。女子直到婚后，才有了陪丈夫外出或者带孩子逛街的自由。

“六礼”的婚俗，至今还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延续着。不过，现代人讲究自由恋爱，“说合”就不必劳烦媒婆上门了，双方家长与经验丰富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议一议即可。“讨八字”则依然遵循过去的风俗，男家把配婚男女的生辰八字压在家中大厅的神案上，如果家里供奉着祖先牌位，就把八字搁在祖先牌位前，只要三天之内没有发生不吉利的事，这段婚姻就算是通过了神明和祖先的考验。只是如今的算命先生也学会了与时俱进，看着一对有缘人的八字，不会再铁口直断男女之间会否相克，只是告诉双方应该如何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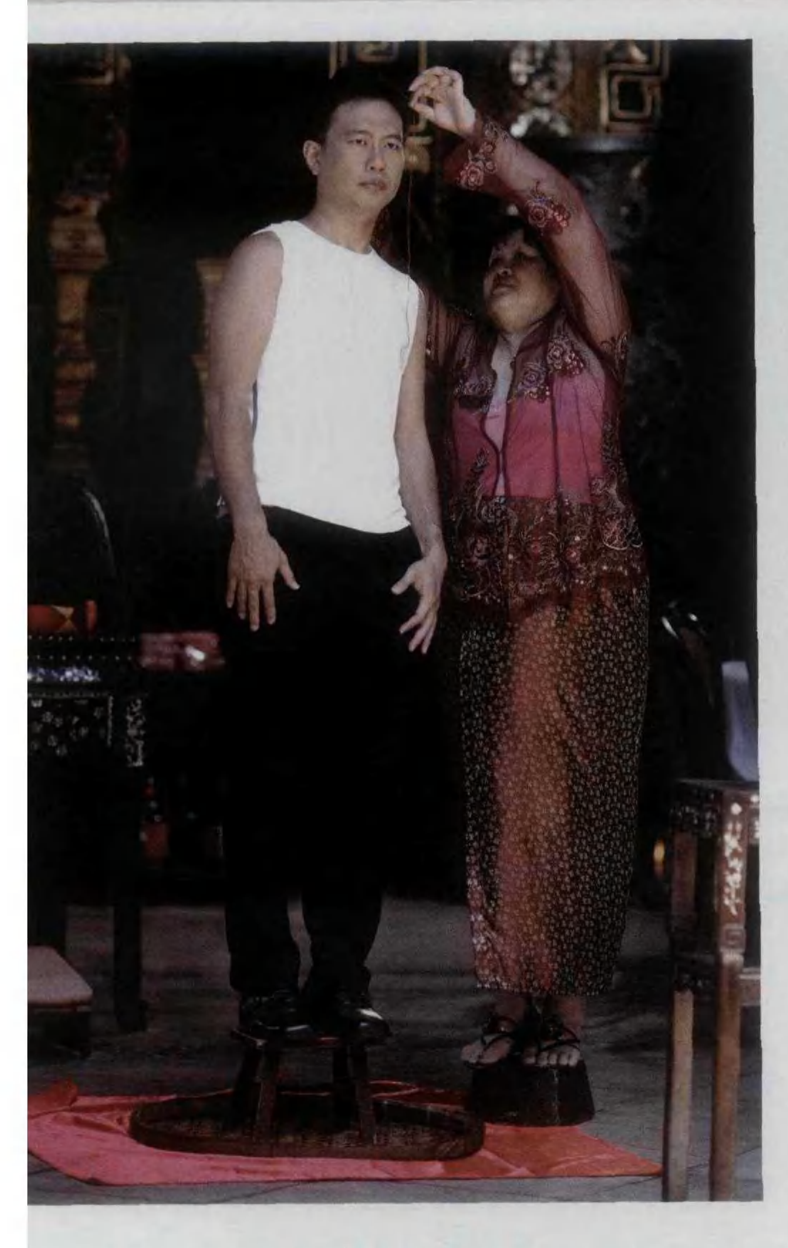
喜烛一对、香茗盈双、金钏成对、福饼盈盒……图上这似曾相识的纳征礼单，即便在中国传统文化保留相对较好的乡村也难得一见，而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这只是六礼当中的一个环节。大喜之日，新人在祖宗牌位前摆上果盘，倒上美酒，以敬先祖。左页图中用红色糖糕雕刻成的五方瑞兽，簇拥着中央的高塔，代表了魂牵梦绕却又回不去的中原。

照各自的命运特征彼此迁就和互补。

“纳征”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送彩礼”或“送聘金”。我翻阅文献材料，发现今天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盛行的“送聘金”，仍然因循着两百年前的传统。1851年担任槟榔屿警察总长、十年后升迁为驻新加坡副参政司的沃汉，曾经记录下他所观察到的华人婚礼。当时的定亲信物是由男方送给女方金戒指等首饰，女方也回赠男方金头钗和其它首饰。男方在下聘当天，会由媒人代表，把一锅煮泡醋卤汁的猪脚，以及一对鸡、一对鸭，再加一对贴上吉祥如意图案的蜡烛，连同聘金和算命先生写好的婚礼择日批文，一并送到女家。女方留下聘金和蜡烛，收下一鸡一鸭和一大片猪脚肉。蜡烛要交给女儿收着，等待生下第一胎男孩之后燃点谢神。今天，“吃猪

中国传统婚礼在马来西亚有效吗？

1926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成立了华人婚姻委员会，试图研究何种形式的华人婚姻、习俗、礼仪才是有效婚姻。结果，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政府不能订立任何法案说明哪一种形式的仪式是构成婚礼的必要条件。只要婚姻仪式是按照新郎新娘或其中国家乡习俗所需要的条件，或者是遵守虽已有了变更但依然还在延续着的习俗，这些旧式婚礼就与注册婚姻一样有效。此后50余年，所有按照中国各地区以至各民间教派礼俗举行的婚姻，都是合法的。华人婚俗到了东南亚英殖民地，虽依赖西方法制保障其合法性，但依然在传承中华婚姻礼制的文化与道德内涵。即使1982年马国政府实施了《1976年法律改革(婚姻及离婚）法令》，硬性规定从当日开始所有非注册的婚姻均属无效，但之前按习俗举行的婚姻还是有效的。多数华人在婚姻注册外，依然认为必须另择吉日按传统习俗举行婚礼。



■ 图上这个身穿素服的新郎正站在木凳上，等待长辈用红线为自己束发，之后就要换上大明衣冠。他脚下的圆簸箕压着红被单，代表天圆地方、地大物博的中华。从跪拜祖先到换上明朝礼服，新人都要在簸箕内完成，象征着“脚不踩洋地，头不见青（清）天”。

脚醋”还是马来西亚流行的谚语，譬喻介绍男女成就姻缘的功劳。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每年总有几个月特别热闹，尤其是农历的正月、八月、九月、十月，大家总是忙着参加各场婚宴，而不同籍贯的华人，在正式婚宴前送聘金的习俗也各有特色。漳州人的规矩是退回聘金，表示并非卖女儿。而祖籍漳、泉的男方，又会在聘金之外另送上两份“乳母银”，以示慰劳女方母亲从十月怀胎到养女教女之苦。两包“乳母银”里头所包的金额必须是一多一少，女方任选一份后，将另一份添成双倍奉还。大多时候，女方往往选择金额数目少的一包，而双倍归还金额多的一包。这既是向未来亲家暗示了对女儿的疼惜，也默默地表达了体恤甚至有意帮助女婿的温情。

来，换上大明礼服

1920年春天，武汉进步团体“互助社”的创办人之一梁绍文，搭乘大英公司的“甘马”号邮轮南下考察。在新加坡停留了一个月，便觉得有些厌倦了，于是乘船前往马来西亚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一天，他在槟城最宽阔的中街散步，远远的鼓乐喧天，一个高脚牌队迎面走来，牌上除了有“肃静回避”的字样之外，其余所写的都不是清朝的官衔。梁绍文颇感好奇，忍不住停下脚步。那紧随高脚牌队而来的，是吹奏喇叭、羯鼓的乐队和七八个仿佛是穿着戏服的童子。随后，只见一人手执红罗伞缓缓而至，身后的敞篷马车上坐着一位少年，身着蟒袍绣服，足登金线顾绣的靴，头戴状元帽，脸色绯红。与少年并肩而坐的女子凤冠霞帔，阔袖宽袍，冕旒垂盖。这女子周身锦绣，五色斑斓，好似戏台上的杨贵妃。二人坐在马车上簇拥而过，又仿佛是戏文里的董仲舒和七仙女。这古怪的迎婚礼，使初来乍到的梁绍文大为惊奇。梁绍文后来在著作《浪迹十年》里记述了这次的经历，他敏锐地捕捉到南洋婚俗的一大特色——“细考究他们的习尚，总是明代以前的习尚，倘若我们将三四百年前远祖太公的遗像来参照一下，或者与此日槟榔屿的婚制

服式相像。”

距梁氏初抵南洋又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为了弄清楚当下南洋华人的婚礼流程，我找到了“送嫁娘”杨爱苓，听她说这20年来替人处理婚礼仪式的经验。没想到，当我提到梁绍文笔下的古装婚礼，杨爱苓竟说，这种风习至今并未销声匿迹，只是在马来西亚北部，懂得处理“老古装”仪式的也就只剩下五六个人了。

现如今新郎新娘大多穿着西式礼服完婚，但许多华人家庭还是主张人生大事要依传统婚俗，在婚礼前夕为子女举行上头仪式。“上头仪式”，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子夜之后宣告孩子从这天开始更换身份，男婚女嫁了。“如果这家人要按先辈的传统礼仪进行上头礼，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替他们准备各种尽礼需要用到的象征物。”按杨爱苓的经验，不论是男方还是女方，上头礼都在各自家中的大厅举行。行礼时，要把置放水果祀品的神案摆在大门外，如果是穿着老古装——即明朝礼服的上头礼，就在客厅对门前摆上两张叠起的椅子，上边放着“斗灯”——一个盛了米的圆斗，斗内放置一盏点亮的油灯，此外还放有梳子、尺、剑、剪刀、秤、一对大红蜡烛，以及一封红包。

上头仪式一般在婚嫁前夕的子夜进行，也有些家庭特地按日选择吉时。杨爱苓说，她主持上头仪式前，都会按主家籍贯，给每个步骤准备不同的祝愿词，她比较擅长闽南与潮州人的传统。举个例子，如果是为闽籍新人主持上头，在新人拜天神时，她要念这么几句：“点香点红红，十二枝香拜天公，上头做大人。”如果主人家要求按老古装的礼仪上头，男女双方就会在上头前各自在大厅地面上摆上压着红被单的大圆簸箕——“大槛”，男的在簸箕上摆一张红色小木轿椅，女的就在簸箕上摆一张红色小四方木凳。吉时一到，新人要穿着纯白素服，由父母牵着绕簸箕走三圈，之后跨进簸箕里，跪拜家中的神明和祖先，再坐在轿椅或方凳上，由父母象征性地梳三下头。接着，父母再给新人喂食两粒煮在糖水里的小红汤圆，象征好事成双。为了确保婚后事事圆满，新人

点斗灯——婚礼前的人格启示

在上头仪式点斗灯，主人家摆设的斗，有来自自己家的，也有由送嫁娘准备的。摆设斗灯，其实是通过斗灯内各种物件的象征作用，表达出对天地以及人生的价值观。

斗：代表北斗，也象征宇宙的圆融、包容。

米：象征民以食为天，生命的基本需要绵绵不绝。以难以尽数的米粒，代表宇宙生养的人口就如天上繁星难以尽数，但都被宇宙包容其中。

灯：斗灯务必保持长明不灭，以象征光明生生不息，祈求家人的“元辰光彩”光照四方。

剑：象征施法、制煞、斩妖的宝物，作用在于守护身形，能斩一切不祥，也斩一切恶习和烦恼。

秤：象征不贪不取、调理准确，为人处世要能知轻重、公平无欺。

尺：警惕做事要有分寸、做人要讲规矩。

明镜：象征中央守护的日月星辰，有光亮。也代表心中要明了是非对错。

剪刀：象征剪除横陈的纠葛，也代表说话要如裁剪衣服，得体、合身。

如果主人家上头仪式点斗灯用的整套斗具都是借来的，那么在上头仪式之后，主人家不能还回一个空斗，必须将斗内的米留一半给对方以示“有余”；另外，主人家还必须在斗灯内放置一个红包，里边放几块钱，以示并非不劳而获，红包在过后也连同盛着半斗米的米斗送还，作为借用斗具的酬金。



南洋是大明王朝遗民最后撤退终老之地。自17世纪以后，南洋华人男女在结婚时不穿清装，而是各自在祖宗、神明、斗灯的见证下束发、着明朝衣冠。这其中暗含着海外华人北望中原的悲壮情怀。

吃汤圆时还不能咬破，只能咽下。这时，杨爱苓就会在一旁喜笑颜开地说："吃圆咬轮吞，好使生好子传好孙"。梳完头，父母还要用红线替孩子束发，然后再让新人站在轿椅或方凳上替他穿戴明朝礼服。这之后，才轮到孩子向父母捧上报恩茶。

那一湾跨不过的南海

南洋华人身处南海之南，这是大明遗民最后撤退终老之地。自 17 世纪以后，在南海的北部，中原大地经历了满清王朝三百年的闭关锁国，南洋华人男女在结婚时却不穿清装，而是各自在祖宗、神明、斗灯的见证下束发、着明朝衣冠，这其中有什么讲究？

若要更深入地了解南洋华人的上头仪式，首先还得承认这是天地会的传统。在民国以前，上头仪式其实暗含着海外华人北望中原的悲壮情怀。华人下南洋后，多是有家归不得，即便是办喜事，也总是挥不去国仇家恨的惆怅。在儿孙即将传宗接代之际，身处马来的华人，早已无法遥望故乡上空的北斗星，此时点燃斗灯，遥寄对中原的思念，聊以安慰，并借上头仪式传递恢复汉族衣冠的憧憬。

和"闯关东"、"走西口"相似，华人南下的历史，也饱含着一段段背井离乡的哀伤往事。

满清建朝以后，最早滞留在东南亚的一批华人，是拒绝降清的明末遗民，他们之中有前明水师、有滞留海外的华商、有跟从郑成功起兵而郑家归顺清朝后却不愿追随的队伍，也有从闽广海岸向南海之南逃难的百姓。

他们蓄发明装，直到清末还有人在墓碑上坚持不用清帝年号。以后陆续南下的，又有许多是历次反清起义失败的撤退队伍。这些人一方面生活在西方殖民者控制的土地上，与其他民族共处，有家归不得；另一方面，清廷长期视他们为化外之氓，自然也得不到国家力量的保护。于是只有依赖组织的力量，大家歃血为盟，结成拟血缘的兄弟情义，相约同生共死，以集体的力量开拓蛮荒异地。而一再拓展新的土地、开发新的资源，又势必与本土势力存在“夺利”的矛盾。欧洲工业革命后，锡需求量猛增，价格大涨，在南洋很多锡矿产区，马来酋长和华人采矿者常为了争夺利益大打出手。后来受到西方和清政府诬蔑的所谓秘密帮会，其实就是维护地区秩序的集体武装自治力量。在南洋，几乎所有男丁都归属于天地会在各地的分支，这既是要持续地反复地叮嘱大众“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引导族群的民族认同，强调流落海外的生命意义，又在现实的海外生活中维护着华人开疆拓土、发展经济的权利。

槟城已故诗人黄晚香的小说《吻壁老人》转引前人的著述，说清代东南亚的华人每逢儿女结婚，总要邀请会党中的长辈为新人梳头，长辈口中念着：“一梳梳到儿孙满地，再梳梳到白发齐眉，三梳为公不为己，四梳永爱不分离。”到了第四梳，就凑过头去，对新人低声耳语道：“记得你是炎汉子孙，大明后代。从今以后，已经成人，唯愿还我山河。”

早期的上头仪式更加讲究。以十二枝香拜天，象征了十二地支六十甲子的天道循环、与天地同在；以簸箕所在位置为圈，圈下放被单，又象征天圆地方、地大物博的中华。新人要事先贴身穿一套《周礼》中规定的戴孝素服，从跪拜祖先到换上大明衣冠都不能走出圈外，尤其是要在簸箕上的轿椅或木凳上披明服、戴明冠，代表了大喜之日犹未能



新娘吞下小红汤圆，象征好事成双（上图）。此时站在一旁的送嫁娘就会欢欢喜喜地说：“吃圆咬轮吞，好使生好子传好孙”。婚礼上吃汤圆的习俗中国内地也有，只是在民国以前，南洋华人的这项仪式，还暗含着另一层深意：要为大明生儿育女，开枝散叶。左页图是新娘为父母奉上报恩茶。

忘却国殇，整个仪式要“脚不踩洋地，头不见青（清）天”。

“上头”的主要意义在于束发戴冠，象征恢复汉族衣冠，它看上去类似于古代中国为男女成年而办的冠礼、笄礼，但在马来西亚，



■ 这是一张上世纪四十年代马来西亚华人的结婚证书。除了新人陈永禄、张爱珠的名字，婚书上还写有男女介绍人、男女主婚人和证婚人。可见这对夫妇依然遵照传统婚俗举行婚礼，并未脱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统”。而文末的民国年号则象征了马来西亚华人对国族有了新的认同。右页图中新人以十二枝香拜天，象征了十二地支六十甲子的天道循环、与天地同在。供图／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

即使之前举行过成年礼，华人在婚礼前夕还是要举行上头礼。类似的束发易服仪式也出现在天地会的入会仪式上。而新人上头时穿在里面的那件素服，本是福寿衣，是要择吉日请子孙多而高寿的老妇人取布、开剪后，方才交给裁缝制作。这套素服在上头穿过一次，第二次再穿就是老死之日，以表示至死也要为明朝戴孝。这个规矩在辛亥之后被逐渐废弃。

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就被长辈教导，自己的先辈来自远在南海之北的中原大地，忍见中原汉土，沦落异国衣冠。在大喜之日，在列祖列宗的灵牌前，穿上代表国殇的孝服，耳边又响起郑重的家国叮咛，再披上大红色的明朝冠服，欢愉的气氛顿时多了凝重的意味。于是，婚礼已经不仅仅是两个家族的事，即将步入婚姻的男女还担负着为大明生儿育女、开枝散叶的责任。忠孝两全的遗民情怀就这样在这片土地上隐晦而绵长地延续着。

如今时代变了，但若要举行上头礼，尤其是想要穿老古装上头，还是要遵守许多老规矩。杨爱苓说，过去的人强调忠臣不事二主、一女不嫁二夫，如果新娘属再婚或者已非处子之身，都没有资格走进“大槛”行上头礼。另外，牵着新人行礼和替他们梳头的是父母，父母不在，就由血缘最亲的长辈负责，汉族讲究的家族伦理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理义分明。直到现在，男方举行上头仪式还有个必守的老规矩——所有用品都要在一个属龙的小男孩向神明做了拜请的动作后，才交到新郎手中。对于老一辈人来说，龙的文化寓意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东南亚华人心中，它还象





大喜之日，在列祖列宗的灵牌前，新人穿上代表国殇的孝服，耳边响起郑重的家国叮咛，再披上大红色的明朝冠服，欢愉的气氛顿时多了凝重的意味。此时此刻，婚礼已经不仅仅是两个家族的事。

征着"长长久久"。

杨爱苓说："有很多时候，行上头礼是遵循祖父母或外公外婆的建议，可是如果作父母的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老古装仪式，按理就没有资格牵着孩子进'大槛'。这时我们就要先替父母重新做上头仪式，但他们只做'半世'，也就是按他们已经度过的半个甲子以上的岁月，烧六枝香。"

这道理却也分明，父母活到孩子结婚那天，至少也已过了三十个年头，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恢复明朝衣冠，又怎么有资格牵着儿女的手走入"大槛"，带他们回到虚拟中失去的故国？因此，就必须补回那后半个甲子，重新归服明装。

当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故国的历史，身着汉族衣冠，双手为父母和长辈奉上报恩茶，整个上头礼才拥有了完整的意义。南洋华人用喜事展示前朝衣冠，表达对传统的认同，借婚礼习俗去回应历史的悲情，这里面却隐含着忠、孝、节、义无处安放的悲凉。

19 世纪中叶的沃汉，曾花了两三页篇幅描写当地华人的迎亲仪式。在他笔下，男女方来来往往的全套仪式前后可延续一个月之久。但他所见的迎亲，也已被逐渐简化。杨爱苓就曾经办过一场"简化版"的新娘出门礼：新郎乘车到女家，小舅子欢欢喜喜打开车门送上鲜花，接过新郎给的第一封红包，这象征着建立双方长幼之间的敬爱关系。等到新郎在女家坐定，小舅子再乖乖地捧上鸡蛋茶，新郎搅匀打在加糖热水里的两粒生鸡蛋，再连同另一个红包一起交给小舅子，这时就可以从岳父母手中接新娘了。尔后，岳父母转



■这是建于1800年的马来西亚槟城广福宫，它是当地华人的信仰象征。槟城华人多祖籍广东和福建两地，男女结婚当天须敬告神明，此庙是必到之处。

供图／马来西亚槟城广福宫、王琛发

过头去，新郎带着新娘绕迎亲的车子兜上三圈，意味着“三朝回门”的完成，然后一对新人再回到新娘家中拜神，一起捧茶孝敬女方长辈。待到新人喝下了“燕窝茶”，就算是完成了在女家的全部仪式。接下来，新娘正式出门，两人可共乘一车到新郎家入门、拜祖、捧茶给长辈。在途中，夫妻二人会一起到附近的寺庙上香祈福。只不过，和沃汉的记载不同，这不是长辈事先替他们做，也不是妻子过门之后隔几天的事，而是新郎新娘连同他们的伴郎、伴娘和亲友，趁着交通方便，一路上完成的任务。

但是，这一切的简化还是离不开一环接一环拜敬神明、祖先、长辈的礼节，它是在一遍遍地提醒新人要重视慎重追远、长幼有序、亲友互尊的中华传统。比如，父母在新郎带着新娘出门兜圈时转头不顾，象征着新娘必须脱离旧家庭的女儿身份去适应夫妻生活。再比如，新娘在新郎家拜祖先之前，双方即便在迎亲仪式中可以并排而走，但一旦踏入男或女方家门，步伐都要一先一后，各自先一步在自家家门内站定，与门外的配偶互相鞠躬，这又代表着夫妻、亲家之间的彼此尊重。有经验的送嫁娘都知道，按南洋的传统，“鸡蛋茶”象征女家“会生蛋”，是替新郎传宗接代的意思，同时也象征女家小辈将来善意而为的恶作剧，希望男方不要计较。这样一杯鸡蛋茶，新郎是不能喝的，他要做的是把鸡蛋在象征甜蜜的热糖水中搅匀，再大大方方地给小辈个红包，以示宽容，也讨个吉利。那些糊里糊涂喝下鸡蛋茶的新郎，则会被大家当作“憨子婿”。

追溯传统婚俗，就会发现婚礼的背后其实是一本关于两个人以至两家人如何相处的伦理启示录。

南洋华人社会的文化礼俗，尤其是前英殖民地区的南洋华人婚制，之所以会和家乡的婚制礼俗有别，演变出当地的一套礼制，甚至又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党意识互相渗透，都是“环境所逼”的结果。

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其它地区曾经长达几个世纪流行以“恢复明装”为特征的婚制，至今影响着当地现在的婚礼面貌。乍看之下，这与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婚俗皆不相同，但它所强调的价值观反而很传统，因为在早期实践者的心中，南海那边的故乡是他们永远难以割舍的思念。

责任编辑／郭婷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晚清时期，英殖马来西亚的华人当中成长出一批买办资本家，他们游走在英国商行、马来贵族与清廷官吏之间，获取经济利益。这些人为子弟办婚礼，即使延续上头仪式，也少了由此而联系到国仇家恨“反清复明”的叮咛。他们的婚服显示出南洋华人买办的生活品味：新郎长袍马褂配瓜皮帽，新娘依然凤冠霞帔。从头饰到靴子都追求金丝细绣或加镶各色琉璃珠子，并且添加了许多源自西洋富人和马来贵族的饰物。整体来看这已是清代服饰的模样。供图/厦门华侨博物院

野菜和仙境
——再读李唐《采薇图》

■ 撰文、供图 / 黄小峰

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中，有这样一幕——年轻的梅兰芳和邱如白义结金兰，为他们作证的，即是一幅南宋古画。被当代电影巧妙使用的这幅画是有明确出处的，它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画家李唐的《采薇图》。那么，导演为何要选用这幅画来烘托情节呢？莫非它有特别之处？

伯夷和叔齐

细读此画，会发现其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两位主角便是伯夷和叔齐，情节大致如下：商纣王末年，孤竹国国王有三个儿子。按理，王位应该传给长子伯夷，但父王偏爱三子叔齐。父王死后，获得继承权的叔齐觉得自己即位有悖长幼秩序，于是让位给长兄伯夷，但伯夷觉得自己即位有悖父命，于是兄弟俩双双放弃王位和贵族生活，逃离孤竹国。流浪多年后，他们想去投奔新兴的周国，因为听说周王对老人很好，正好碰到周武王决定讨伐商纣王，伯夷和叔齐扣马进谏，希望周武王止兵，理由有两条：其一，当时周文王刚刚去世，在这时起干戈，不孝。其二，周是商朝的臣属国，以下犯上，不仁。武王当然不听。于是，周武王灭商之后，两兄弟觉得这是一种以暴易暴的行为，是不仁不义的王朝，耻食周朝的粟米，躲进首阳山中，采食山中薇菜为生，以致饿死。

在后世，伯夷、叔齐逐渐成为清高的仁义之士的代表，声望很高。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武王伐纣”是仁义之举，救天下于危难之中，那么，伯夷叔齐凭什么不和周朝合作，要躲进首阳山中？历史与道德的标准在他们身上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导致了两种分歧巨大的看法。一种推其为圣贤，一种贬其为迂腐。庄子说这哥俩“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现代人的讥讽更是尖锐。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他们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只管自己开小差逃跑。更有甚者，鲁迅在去世前一年写了一篇《采薇》，讥讽伯夷和叔齐是脾气太大的傻子。

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形象，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伯夷、叔齐和《采薇图》放在单一的历史人物评价系统中，而需要把这幅画放回其历史语境。

李唐的生平几乎像伯夷叔齐一样模糊，他也没有在画上留下任何解释这幅画创作目的的文字。最早探讨这幅画用意的是元朝末年的杭州人宋杞。1362年，他在画后写下题跋，认为画的用意在于规谏，以伯夷叔齐不向周朝臣服的典故，来影射北宋灭亡后曾经投降金朝的宋代降臣。这个充满政治意味的观点粗看起来很合情理，一旦深究，便很勉强：倘若《采薇图》是规谏降臣，那么无形中是把金朝视为周，而把北宋视为商，北宋末帝宋徽宗和宋钦宗就成了商纣王。南宋的皇帝能够接受吗？

高人和隐士

《采薇图》中，双手抱膝的正面形象是伯夷，他是兄长，在画面中位置更高。侧面的叔齐前倾着身体，似乎在说着什么。篮子里装满薇菜，表明采薇已经结束，正在休息。他们衣容整齐，身着白袍，只在袖口与裙边有深色的装饰带，伯夷脚上穿着草鞋，这都是高洁君子的装束。他们身处巨石和峭壁环绕之中，颇像山洞入口处，是所谓的“岩穴之士”。画右有一棵松树，这也是君子的象征，松树上爬着蔓藤，这常用来表示时间的久远，是一棵古松。在画面左边，阻挡人视线的岩壁突现，显出一片退远的空间，一条蜿蜒的溪水流向深远处，消失在雾气中。这究竟是什么季节，什么时刻？采薇应该是在春天，可是画面没有任何春天的气息，仿佛刻意营造一种消除了季节感和时间感、与世隔绝的时空环境。

虽然古人对伯夷叔齐究竟是圣贤还是迂腐，尚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的隐士身份。隐士是与俗世断绝往来的。这在伯夷叔齐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他们本是王子，都有机会继承王位，但最终双双放弃，逃奔它方，从而主动割断了和现实名利世界的联系。他们最后隐于首阳山，不吃人间的粮食，只吃深山的野菜，从而在食物上也断绝了和外在世界的联系。画面中的伯夷叔齐被深重的岩石封闭起来，象征着与外界的断绝，唯一的联系是那条小溪。

伯夷叔齐隐居于深山，按理来说，由于山势陡峭，深山的溪流一般都不会平缓。然而画中的溪流不但很宽，而且似乎处于平地，蜿蜒缓慢地消失在远处。在画上，小溪暗示着与外界的惟一沟通方式。山外的人可以沿着溪水走



到伯夷叔齐的深山之中。这立即会令人想起《桃花源记》。武陵渔人正是沿着平缓的溪水才来到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唐在画面左边画上的溪水，正是进入伯夷叔齐隐逸世界的入口。

隐居的世界通常都是美好的世界。没有战争和俗事的骚扰，而且可以享受薇菜的清香。“薇”并非是一种卑贱的食物，而是上古的人民经常食用的蔬菜。在《诗经》的时代，采集野菜食用十分常见，上古的人民经常食用各种野菜，名目繁多，有葑、菲、苓、蕨、蓄、芑、薇等等。“陟彼南山，言采其薇”，登上南山，采食薇菜，引吭高歌，是《诗经》中动人的画面。

薇究竟是什么东西？三国时代陆玑说：“薇，山菜也，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园种之，以供宗庙祭祀。”可见薇是一种豆类植物，在各种野菜中，薇的味道算是最鲜美的，可以生吃，也可熟食。陆玑甚至提到当时政府的菜园中还种植薇，以之作为国家祭祀的祭品。可见薇地位其实挺高。在今天，薇(vetch)常称为大巢菜，其营养价值很高，还具有药用价值。

可见，薇绝不是草草果腹的卑贱之物，而是一种长在山间水边、历史悠久的山间美味。大概正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点，因此又对于伯夷叔齐是否是因为食薇而死，有不同意见。有一种看法是，伯夷叔齐并非因为食薇而饿死，

■ 松柏、梧桐以及万年藤，构造出一个永恒的仙境，主人公伯夷、叔齐便在其中怡然采薇，这是南宋画家李唐《采薇图》所描绘的情形。这种描绘，打破了人们对伯夷、叔齐作为清高代表的固有思维模式，承载了更多有关仙境、隐居、长寿的内容。供图／故宫博物院

而是因为后来有人说山中薇菜其实也是长在周的土地上，两兄弟于是决定连薇菜也不吃了，绝食而死。二人的死，罪过并不在薇。

采薇与采药

由于采薇与伯夷叔齐的关系，采薇的行为逐渐成为隐居的象征。甚至于都不用真的去寻找薇菜，而只需要在诗歌中用“采薇”来象征这种行为以及其中包含的隐居理想。这类诗歌的例子数不胜数。譬如在年岁比画家李唐稍小一些的南宋官僚赵鼎（1085～1147年）看来，采薇之所以好，主要是因为采薇意味着“闲”，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爱闲如爱官，食薇如食肉。”

《采薇图》中的伯夷叔齐当然并不是在山间别墅之中，但“闲”却丝毫不减。他们刚采完薇，正坐在高高的石台上休息。伯夷倚着树，舒舒服服地抱着膝盖。叔齐虽然是



图为日本江户时代“狩野派”代表人物狩野尚信画在六曲屏风上的《夷齐采薇》，与李唐所绘比照，会发现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狩野派深受中国绘画的影响，且热衷描画中国隐士和仙人，这或可印证李唐笔下的夷齐也非作为清高之士，而是作为隐士、仙人。

侧面，但他的坐姿和伯夷差不多。二人都不是所谓合乎礼法的坐姿，而是恣意而随性的坐法，正体现出闲适的自由。在古代，这种坐姿是高士的典型特征。我们在几乎所有对于高士的描绘中，都能够看到不拘礼法的这种坐姿。譬如南朝墓葬中的拼镶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传为晚唐五代画家孙位的《高逸图》。《高逸图》中第一位高士还用双手抱着立起的右膝，活脱脱就是《采薇图》中伯夷的姿态。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隐士都喜欢采药，山中草药是求仙的手段。野菜和草药常常是二合一的，都是吃的东西，既能疗饥也能治病。日本17世纪著名画家狩野探幽曾经临摹过一件中国古画《逸民图》，其中画有东汉时期隐居采药的高士韩康。这个采药的韩康，双手抱膝，身旁放着采药的长镵和竹篓，与《采薇图》中的伯夷、叔齐很像。

应县佛宫寺辽代木塔佛像腹中曾发现一幅纸本绘画《采药图》。这幅画过去一直被当作采药归来的神农。而新近一些学者通过传世的诸多“毛女图”，开始重新定位这幅辽代纸画，认为应该描绘的也是采药女仙。画中女仙赤着脚，穿着由葫芦叶子组成的短裙，身背葫芦和拂尘，都表明其仙人身份。背景的大石块表明她正身处人迹罕至的深山。她身后背着竹篓，里面盛满了灵芝和药草，右手还捻着一支灵芝。最能表明其采药行为的是其左手握着的一柄采药草的短镢，与《采薇图》中伯夷叔齐的工具相比，粗糙一些，但更为强有力。

因此，《采薇图》中的伯夷叔齐也应该放在隐士和仙人的传统中来看待。与其说他们是近乎绝食抗议的异见人士，不如说更像是在深山采药草的仙人般的隐者。

在宋代，伯夷叔齐确实也被当作仙人。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死后成为九天仆射，专门治理天台山。这种说法可能是民间传说，但在宋代，伯夷、叔齐同样也得到帝王的追封。崇尚道教的宋徽宗就在崇宁元年（1102年）诏封伯夷为“清惠侯”，叔齐为“仁惠侯”。这种称号一般都是授予那些在民间信仰中能够保佑一方安宁、近乎于神灵的人物。在封谥伯夷、叔齐的诏令中，开头即说：“神生于商末，避纣海滨。”这两兄弟已经被官方明确定位为“神”，成为国家定期祭祀的对象。

长生与长寿

元代初年的官僚卢挚（约1242～1315年以后）同时也是一位著名散曲作家。他曾经为一幅《采薇图》作了一首诗：“服药求长年，孰与孤竹子。一食西山薇，万古犹不死。”这幅画显然也是描绘伯夷与叔齐采薇首阳山的故事。在卢挚对“采薇图”的解释中，巧妙地使用了两个相互关联的

对比："服药"与"食薇"的对比，刻意求长生而达不到的人和隐居食薇却万古不死的伯夷叔齐的对比。这里没有提到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看不到任何政治解读。在卢挚眼里，画里的伯夷、叔齐是两位得道的隐者，通过隐居食薇、自我修炼而获得近乎不朽的生命。倘若用来形容李唐的《采薇图》，也是非常合适的。

由此可见，"伯夷叔齐采薇图"这类主题都是与逃名、隐居乃至长生不老的理想有关。李唐的《采薇图》，尽管年代比卢挚所看到的要早一百多年，但无疑也应放入这个意义框架中来观察，并非是"意在箴规，表夷齐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的政治宣传画。

隐居其实可以有很多表现方式，那么，相比起其他的隐居方式，"采薇"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伯夷叔齐常常与"商山四皓"并列，"二子食薇于首阳，四皓采芝于商山。""商山四皓"是传说中的秦朝隐士，分别为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商山四皓"和伯夷、叔齐的故事有不少相同之处。其一，他们都是一个组合。其二，他们都很老，一个被称作二老，一个被称为四皓。其三，他们都靠采食山中植物为生，采薇与采芝。采食灵芝的四位皓首老人很早就被神化，成为长生不老的仙人，转化为人们寄托求仙理想的得道成仙者。

在17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狩野派"的绘画受到中国绘画的很大影响。不但在画法上，在绘画题材上也常常用中国的典故和画题，中国的隐士和仙人是"狩野派"水墨画的重要主题。狩野探幽的弟弟狩野尚信（1607～1650年）画过一对六曲屏风，分别是"夷齐采薇"和"商山四皓"（波士顿美术馆藏）。我们不知道画家是否知道李唐所画的《采薇图》，但画中人的姿态颇有些相似处，同样是伯夷在右，叔齐在左，尤其是叔齐，侧身前倾，左手伸出，与李唐所画姿态十分相似。这幅画虽然是异时异地，但却能为我们重新思考李唐《采薇图》提供旁证。

与狩野尚信的画不同，李唐《采薇图》有丰富的环境。其中有一处图像值得我们玩味。画面右边前景有一棵大松树，树根虬曲，露出地面。树干向右边倾斜，爬着两根蔓藤。这两根蔓藤很粗，在画面中显得十分突出。它们纠缠在一起，围绕着松干盘旋而上。其中有一根沿着松枝向左边发展，末梢刚好下垂在伯夷和叔齐中间。仔细看两兄弟的视线，仿佛正是集中在这条垂下的藤蔓上。叔齐举起左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恰好指向藤蔓。藤蔓在画中占据如此显著的地位，应该不是画家随意的点缀。

这种粗大的藤蔓容易使人想到俗名"万年藤"的一种大型藤蔓植物"木通"。在绘画中，缠绕藤蔓的松树并不鲜见，许多并不画出准确的植物类型，而只是以虬曲的藤蔓表达年代久远之意。所谓"万年松"、"万年藤"，二者一起构成了荒寒遗世的隐居世界和长生不老的主题。因此，缠绕着古藤的老松，一旦出现在绘画中，往往都是与隐居的高士、得道的仙人、长生的仙境有关。

《采薇图》中垂在伯夷、叔齐之间的藤蔓，带动起伯夷和叔齐的视线，藤蔓的这个作用很少能在别的绘画中看到。在画面的左边还有一棵树，与右边的松树相对，填补着画左的空间。虽然画得比较简略，但仍然可以看到树叶呈三个裂片形，这种树叶一般为梧桐所独有。梧桐是一种嘉木，有许多复杂的吉祥意义。传说梧桐是凤凰的栖息之处，比喻帝王的美德。《采薇图》中，没有凤凰，梧桐也并不是画的主体，因此这里的梧桐与君王之德关系也不大。实际上，有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认为梧桐饱受天地之气的熏陶，是三种最为特殊的树木之一，这个观点据说出自东汉王延寿："王逸子曰：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气淳矣，异于群类者。松柏冬茂，阴木也。梧桐春荣，阳木也。扶桑日所出，阴阳之中也。"松柏是阴气之树，梧桐是阳气之树，扶桑位居其中。《采薇图》中，右边是松树，左边是梧桐，起着分割画面的作用，把伯夷、叔齐所处的岩壁烘托出来。有趣的是，画家并没有忘记柏树。画中的伯夷倚靠在一棵大树上，粗看以为也是松树，但细细观察，它的树干和前景松树不一样，上面没有画上松鳞，而画有弯曲的长线，表示树干上长条形的树皮纹理，这是柏树的特征。此外，画家还用点子点簇出柏树的树叶。如此一来，画家巧妙地在画中描绘了松、柏、梧桐，松与柏同在画右，梧桐处于画左，分布有序。松柏为阴、梧桐为阳，阴阳之气交相融合，创造出永生的世界。

《采薇图》中的松柏和梧桐，阴阳协调，有如三个支柱，撑起画面，再加上松树上的万年藤，构造出一个永恒的仙境，伯夷叔齐就身处其中，采着薇菜，坐而论道。这是每一位为世名所累的文人官僚所向往的世界。

对于世间凡人而言，永生的仙境可望不可及，长寿是更可行的愿望，描绘隐居与仙境的绘画，其实不少都含有长寿与祝寿之意。在宋代，以"商山四皓"、"会昌九老"等著名老年人为题材的绘画十分流行。从"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的紧密关系来看，这两位既曾隐居东海之滨，又曾隐居西山之巅的商末隐居老者，也完全可以被用来作为表达长寿含义的祝寿绘画。或许，李唐《采薇图》就是这样一幅精心设计的作品，呈送给某位德高望重、即将退隐的老年官僚，希望其通过追随伯夷叔齐而进入隐居的不死仙境。□

责任编辑/戴莹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杨东海

当美国人看见梅兰芳

■ 撰文、供图／程龙

1930年6月，梅兰芳结束了在美国的巡回演出抵达上海，黄浦江畔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人们欢呼着，仿佛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无论当时还是今日，梅兰芳所得到的赞誉已无可复加，其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无需赘言。出访美国使梅兰芳那本已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上又多了一道“文化使者”的光环。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似乎从未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即，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如何看待梅兰芳？美国人是与我们一样对梅兰芳颂扬备至，抑或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来到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八十年前的各种历史档案和新闻报道中搜寻梅兰芳的影踪，希望把零散的历史碎片拼合在一起，复原一个美国公众视野下的梅兰芳。

矛盾的预言

打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组相互矛盾的预言。一方是久居中国的美国外交官、汉学家保罗·芮恩施（Paul S. Reinsch），另一方是深谙表演艺术的美国著名戏剧家斯金纳（Otis Skinner）。在梅兰芳访美之前，他们对梅兰芳的美国之行给出了互相矛盾的预测。



梅兰芳访美的提议始于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那是在1919年徐世昌总统为其举行的卸职宴会上，他说：“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为了使在场的人相信此话并非无稽之谈，他又进一步说道：

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并且最近有实例可证：从前美意两国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后来意国有一大艺术家到美国演剧，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两国国民的感情亲善了许多。所以我感觉到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国民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

此时的芮恩施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七年，作为梅兰芳的忠实拥趸，他不但自己时时出没梨园，还常把来华访问的美国达官贵人们拉去看戏。在华时间既久，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日深。这番话代表了一个熟悉中国戏剧的美国汉学家的观点。

不过，芮恩施把自己的主观喜好和感受推及美国公众，却忽视了中国戏剧与意大利戏剧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许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但却是普通美国人无法逾越的。当时的中国人对梅兰芳访美及其在海外宣传中国戏剧文化的看法，与芮恩施不谋而合，恐怕今天的中国人也大多持此观点。然而，芮恩施猜中了结局，却没有猜中过程。

当梅兰芳即将赴美巡演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戏剧界的反应却与芮恩施公使大相径庭。纽约公共图书馆里保存着一封美国著名演员斯金纳于1927年写给芮恩施的继任者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John MacMurray）的信，斯金纳如是评价梅兰芳筹划中的这次美国之行：

我认为梅兰芳先生美国之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除非他只在少数几个城市的唐人街里为他的同胞表演。与脸谱和造型不同，中国戏曲的表演形式太过于另类，很难受到欢迎，它更适合好奇者。当追求新奇事物的普通人访问纽约的唐人街，并把中国戏剧当做其参观内容的一部分时，他要么把它当成是深奥难懂的东西，要么把它当做幽默和滑稽。



左图为1930年5月梅兰芳抵达洛杉矶时，入住电影巨子范朋克的别墅，玩赏拿破仑结婚时用过的杯子。上图是梅兰芳在纽约49大街剧院演出的广告宣传单（现藏纽约公共图书馆）

与美国普通民众一样，斯金纳对中国戏剧的认识，来自纽约唐人街里的粤剧表演。他以过往的经验，来推测梅兰芳的美国之行，其预言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对美国普通观众的口味和偏见却认识得相当准确。

如此另类的舞台表演，缘何能博得美国人的欢心？

1930年2月16日，梅兰芳及其剧团终于站在了纽约第49大街剧院的舞台上，他们为美国人准备的剧目是：《汾河湾》、《青石山》、《剑舞》（《红线盗盒》片断）、《刺虎》。演出受到空前的欢迎，演出计划从原先的两个星期延长到五个星期，并搬至更大的可以容纳一千人的曼哈顿国家剧院。

《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美国知名媒体对梅兰芳演出和各种社会活动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这些新闻媒体为身在美国的梅兰芳，树立了一个令人炫目的公众形象。

2月19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梅兰芳首演之后刊登了如下的报道：

梅先生的每一个动作都看起来像个女人。在《汾河湾》中像一位久别归家的丈夫的妻子，在《刺虎》中像一位宫廷妇女，在《霸王别姬》中则像一位皇家宠妃。在中国传统戏剧中，女性角色由男人扮演，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值得注意的，是梅先生在表演中所表现出来的优雅。这是一种新奇、完美的艺术，它是如此高雅，足以整晚吸引美国观众，尽管大多时候，他们只能猜测台词和演员动作的意思。

《纽约时报》也不甘落后，在2月23日一篇评论梅兰芳的文章中同样毫不吝惜地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

梅先生在一段令人难忘的剑舞中舞动身姿。这通常是女性表演的舞蹈，在其形式背后总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发生。在此种特定情形下，很难讲舞蹈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说不清剧情在什么地方结束。……梅先生本人以其天才般具有感染力的气质，随心所愿地超越各种舞台表演形式，并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梅兰芳为哈德孙河畔的纽约上流社会带来了一股活力和狂热。最好的座位在演出开始前十天就已售罄；他的活动安排、欢迎宴会每天都会见诸报端；他的演出服装在百货商店里展示；一种花卉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纽约先驱论坛报》说：对于纽约的上流社会来说，“梅兰芳的表演，使买票去国家剧院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并且在任何社交场合人们都不再缺少谈资。”美国音乐、戏剧、舞蹈界的评论家在《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世界报》、《纽约电讯报》、《晚邮报》以及各种杂志上，第一时间报道了梅兰芳的成功。

斯金纳恰在此时出游在外，遗憾地错过了梅兰芳的演出，但看到报纸上的评论，他倍感困惑。事实上，各家媒体的评论员们在为梅兰芳高唱赞歌的同时，也陷入与斯金纳同样的困惑中。大多数评论家并没有表现出试图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努力，相反，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梅兰芳模仿女性形象的婀娜姿态和美目流盼，而与此同时，他们更难于接受京剧那令人烦躁的配乐和仅仅通过模拟手段来展现场景和剧情的表演形式。令这些报刊评论家不解的是，如此另类的舞台表演，缘何能博得美国人的欢心？

前面所引用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已经蕴含了这样一种矛盾和困惑。很难想象，一种观众大多时候只能靠猜测去理解台词和演员动作意思的戏剧，居然可以“整

■ 左下图为梅兰芳（左二）在美国表演《刺虎》的剧照（图片现藏纽约公共图书馆）。针对语言不通的问题，梅剧团总导演张彭春特意安排《刺虎》这出戏压轴，因为梅兰芳扮演的贞娥脸上的神情，变化极多，就是不懂念白的人看了也极容易明了。右图为梅兰芳在《霸王别姬》中饰虞姬。待他卸妆后，观众的掌声仍然不断，他只得穿着长袍马褂再次出去谢幕。观众发现原先的那个柔声细语、婀娜多姿的美女果然就是男人所扮时，更加疯狂。摄影／唐荣沛／东方IC





晚吸引美国观众”。美国普通民众没有芮恩施公使对中国文化那样深入的了解，他们看过表演之后的感受也自然跟汉学家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奇怪的是，这似乎并不妨害他们对梅兰芳的追捧。《世界报》援引了一位观众的话，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匪夷所思：“看了梅君的戏，我只能了解百分之五——就是在这五分中，也不敢说一定是真了解；但是看了还不到三分钟的工夫，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于是，众多热情洋溢又令人困惑的公众媒体评论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既然大多数美国观众对于梅兰芳戏剧中的音乐和语言既不明白也不感兴趣，梅兰芳的表演又是如何吸引他们的？

美得如同一个中国古代花瓶

这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在21世纪，也就是梅兰芳访美整整八十年之后，仍然困扰着美国戏剧界。为了寻找梅兰芳形象背后美国公众的心理思维过程，我们必须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当年这些引导舆论并反映舆情的新闻报纸。

1930年2月17日《纽约时报》一篇名为《中国偶像演员展示艺术》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它被其他媒体和学者多次引用。这篇文章把梅兰芳的表演称为“美得如同一个中国古代花瓶或毛毯”。这句话作为对梅兰芳表演的赞美之词，后来被印到节目宣传单和广告插页上。无独有偶，《纽约先驱论坛报》也用同样的笔调写道，舞台上的梅兰芳“好似窈窕淑女，让我们联想起中国诗歌或丝绸上的古画”；《世界报》则把梅兰芳描写成“如同中国古代绘画中精美的线条”。

这些看似普通的比喻，把古代中国器物与梅兰芳相互比照，却揭示了梅兰芳在美国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从18世纪开始，对中国器物的欣赏、赞美和拥有就已经成为美国人从欧洲祖辈那里继承过来的遗风。早在16世纪，欧洲宫廷和上流贵族的家庭陈设中就流行着来自中国的器物和明显带有东方风格的装饰图案和花纹，这些艺术品被通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这些精美的中国器物，从茶叶、丝绸到瓷器，不仅仅是一种摆设，更是权力、知识以及地位的象征。赠送、收藏和欣赏中国艺术品，不但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并且在区分上流社会和普通人的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社会习俗在十七世纪的欧洲达到了鼎盛，并从古老的西方文明中心传到了美洲新大陆。

到20世纪初，除了彩色瓷器以外，拥有“中国风”器物，已经不再是美国上流社会的特权，普通民众也加入到搜集和赏玩的队伍中。在普通美国人的想象中，“中国风”器物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他们不必知道中国瓷器上所描绘的人物或故事，也不需要理解那些东方图案和花纹的寓意，只要拥有它们，就是有身份、有品味和有地位的象征。就像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中国风’器物的欣赏和搜集，具有重要的身份识别意义”。那光泽、精致却又遥远、另类的“中国风”器物，印证着美国人对古老东方文明的理解，即中国文化是神秘的，没有人能说得清，说得清楚、明白反而不是中国文化，反而失去了魅力。

当美国人以这样一种西方人特有的、来自十七世纪欧洲的历史视角审视中国戏剧时，梅兰芳的舞台表演，被百老汇评论家比喻成最精致的中国器物，并受到纽约上流社会的欢迎也就毫不奇怪了。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梅兰芳被美国人当做一件“中国风”器物、一件中国古代花瓶，他的京剧表演虽然超越了美国人的理解范畴，但并不妨碍他被欣赏、被赞美，看不懂的表演，甚至恰好诠释了东方文化的神秘。换言之，梅兰芳的美国公众形象在他踏上美国土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古代的、高雅的、被艺术化的并带着几分异域风情的中国器物形象。毫无疑问，这种形象在西方的传播史决定了它必将受到美国人的欢迎。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纽约唐人街的粤剧表演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被当做一件“中国风”器物而受到美国人的喜爱呢？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排华法案》，以限制华人入境和在美国谋生，广大旅美华人的处境极为悲惨，饱受歧视和迫害的他们只好躲避在唐人街里艰难求生。在排华法案盛行了近五十年的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美国华人的社会地位已经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在这一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人街里的粤剧表演也和当地华人一样，成为美国人歧视和嘲笑的对象。被《排华法案》打上烙印的华人，因为不受欢迎而聚居在唐人街，被社会拒绝的他们同样拒绝着美国文化，过着极度拮据的生活，而粤剧只不过是他们聊以自娱的工具。

颇为可悲的是，那时在美国普通公众眼里，“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截然分开的，二者不但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其公众形象仿佛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的形象是矿工、铁路工、洗衣工……而“中国文化”则是古老、遥远而神秘的，是那些精美瓷器、丝绸和古画所传递的难以言说的“美感”，而梅兰芳显然属于后者。

我们是用生锈的剪子塑造出来的

在大量的新闻报道中，除了对梅兰芳的盛赞之外，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人的一种反思，一种因梅兰芳而产生的对“白人至上”思想的反思。3月16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特别引用了一位美国妇女对梅兰芳的评价：

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外表，穿着午夜蓝丝绸衫，仿佛是绘在墙上的人物一样与我们远远隔绝。他给公众的印象并没有印证我们雅利安人的优越感。他使我感觉到我们自己是造物主用生锈的剪子匆忙塑造出来的。在我看来，他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骄傲民族最完美的作品，他不仅仅个演员，他是个超人。

1930年，鼓吹白人至上的“雅利安主义”从欧洲蔓延到美国，与美国的种族歧视汇合，使上流社会的白人更有了沾沾自喜的理由。特别是面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唐人街的“中国人”时，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骄傲心理被进一步放大。然而所有这一切，却被梅兰芳的突然出现击得粉碎。梅兰芳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不同于任由西方人把玩的中国瓷器和古玩，他那一以贯之的完美形象和超常的艺术才能，使普通美国公众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意识到这位妇女自卑的感受后，这篇文章的作者亚瑟·鲁尔自己也补充道：

我必须承认，我那自鸣得意的雅利安人至上的思想受到了一些震惊。就像我们早已习惯的那样，我们很乐于轻视中国那数以百万计的、尚不能填饱肚子的饥民。……但是我们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人？一群艰难的开拓者，在一个还相对空旷的大陆上四处游荡。

梅兰芳利用美国舞台上下所赋予他的有限空间，在短暂的时间里强有力地重建了“中国人”的形象，其背后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积淀，足以令美国人感到自卑和震惊，既而促使他们走下“雅利安主义”的神坛，开始对自身重新反思。

梅兰芳在美国的成功固然有着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性，但不可否认，拥有古老文明却在蒙昧和落后中苦苦挣扎的中国，和掌握新兴科技并在文明和进步中不断上升的美国之间的相互审视，正是梅兰芳1930年美国巡演之外的潜台词。美国公众虽然同样给予梅兰芳极高的赞誉，但其背后的思维过程，却与当时乃至当下的中国人对梅兰芳的理解有着天壤之别。

责任编辑/李晓光 图片编辑/吴西羽 版式设计/刘扬

美女都穿石榴裙？

何谓石榴裙？

女性为什么钟爱石榴裙？

还有什么裙子招人爱？

特约专家 李汇群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教师

李汇群，湖北荆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女性文化及文学传播研究等。

主要科研成果：出版著作《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等。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名作欣赏》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何谓石榴裙？

白居易有诗赞叹良辰美景，曰："郁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对于"石榴裙"一词，我们可谓耳熟能详。但何谓石榴裙呢？

石榴裙最早指红裙。因为石榴花是上好的天然染料，由它染红的裙子色彩鲜艳，光华夺目，也称石榴裙。这是古代美女的钟爱之物，榴裙飘荡，观者亦随之心旌摇荡，有很多诗作记载了女子着石榴裙的美丽瞬间。杜审言在《戏赠赵使君美人》中云"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顾况在《古乐府》中慨叹"香飘石榴裙，影落蔷薇下"、常建的《古兴》也说"石榴裙裾蛱蝶飞，见人不语颦蛾眉"……诗人都将石榴裙与美丽的女性联系在一起，可见石榴裙在古代女性生活中有多重要。



李寿（卒于贞观四年，630年）墓舞乐图局部，图中女子所着为典型间色裙。



唐张宣的《捣练图》摹本局部，图中女子身着各色长裙。

女性为什么钟爱石榴裙？

女性钟爱石榴裙，不仅因为它颜色艳丽可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榴裙本身具有吉祥含义。中国古人的思维是“天人合一”,喜欢赋予万物灵性,认为物之灵性可以通过种种巧妙的方式转移到人身上。石榴多籽,在古人看来，穿着石榴裙的女性，能汲取石榴丰富的生命力，多子多福，兴旺夫家。如此一来，承载着美好吉祥祝福的石榴裙，就很自然地成了女性所钟爱的服饰。古人作画也常常将石榴裙作为女性的重要标识入画。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最右首的女子，绿衣乌鬓，眉目纤巧，拖地红裙将她衬托得精神焕发，正展现了石榴裙的风采。由于女性钟爱石榴裙，后来石榴裙也用来指代美丽的女性，词义中也逐渐涵盖了其他色彩绚丽的彩裙。

还有什么裙子招人爱？

女性所喜爱的裙子还有绿裙，因其色如荷叶，还称“荷叶裙”。盛唐诗人王昌龄《采莲曲》中写到“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古代女子还喜爱用郁金香花染裙，这种裙子色泽为淡黄色，散发出浓郁的幽香，也称郁金裙。此外，唐代还流行一种白色的裙子，称为柳花裙。元稹《白衣裳》云，“藕丝衫子柳花裙，空著沈香慢火熏。闲倚屏风笑周昉，枉抛心力画朝云”。身穿淡衫白裙的女子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白裙仿佛柳絮翩飞，在他心目中萦绕，久久挥之不去。

红裙、绿裙、白裙，都只用一种颜色染裙，所以以上这些也可称为单色裙。在唐宋时，还流行着一种晕色裙，就是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单色染成裙色，在几种单色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划分，而是自然过渡，呈现出晕染般的色彩。还有一种间色裙，也在唐代风靡一时。当时女性非常注重裙装对身体线条的映衬，往往将布条裁剪为上窄下宽的样式拼接起来。这样，竖条的褶皱拼在一起，显得上细下宽，穿在身上，宽阔的裙摆随风舞动，衬出纤细腰肢，将女性的风姿体态点染得飘逸风流，妩媚多情。在陕西三原焦村李寿墓出土的唐代壁画中，女性的红裙上就是点缀着一道道绿色条纹，拉伸了下肢的比例，显得轻盈灵动。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图中女子所着为典型石榴裙。

责任编辑/张婷 版式设计/杨东海

物以稀为贵的逻辑

■ 撰文／薛立若

参观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中国紫檀博物馆，工作人员热心为我们讲解，令人欣慰。这是一个庞大的奢侈品艺术馆，不仅有紫檀，还有金丝楠木、黄花梨、乌木等等，每件展品都价值不菲。未来，它们的身价可能会持续走高，为什么呢？野生金丝楠木已经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几近绝迹，别的木材，我却不清楚。于是我问工作人员，紫檀现在还多吗？她不无自豪地说，"紫檀也已经绝迹了"（她指的是野生小叶紫檀）。

这句话说得不仅轻描淡写，而且有一点点"只在我们这里"的意味。联想到电视上曾经介绍过，海南野生黄花梨因为前些年的炒作热潮，也可以说已经绝迹了——面对这些名贵的木材，也许我该换一种问法，哪一种还没有绝迹？

物以稀为贵，好东西越少越值钱，所以这些良材以及用它们制作的物件，身价自然会持续看涨。由此我也想到一个故事。

主人公记不清是谁了，应该是古时候的一个大古董商人吧。故事说的是，这个古董商人费尽心思，终于到手了两只宝贝（不是玉器就是瓷器），这两只宝贝一模一样，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天下只有这两只，再没有第三只了。商人细细把玩着宝贝，突然，他用力将其中一只摔得粉碎，令在场的人无比震惊和痛惜！不过，商人却有他的逻辑：物以稀为贵，这样一来，世间仅存这一只，它的身价比之前两只的总和还要大了。

这个古董商人的行为，基于物以稀为贵的逻辑。这种逻辑，在相当多的情形下行得通，且能给人带来好处。于是这个故事被商业营销的图书选作成功案例——但如果大家都信奉这套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一件珍贵文物的毁坏，对社会、对人类文明来说，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紫檀也已经绝迹了"这句话透露出的逻辑与之如出一辙。

物以稀为贵，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人为的稀、被迫的稀，长远来看却未必是好事。为了追求贵，而使其稀，更是没有道理。从自然生物的角度来看，金丝楠木也好，紫檀木也好，并不比其他树种高贵，是人的"爱"使其贵、使其亡。如果我是野生楠木，一定要对人类说："别爱我，求你。"——不过这话恐怕已经说得晚了点。

读编往来

各位编辑：你们好！

我是从去年年底的"二十四节气"专题开始关注《中华遗产》的，这段时间你们做了很多有趣的选题，我非常喜欢。今天拜读了黄秀芳女士6月的卷首语：《让孔子靠边站？》，感慨颇多。感谢你们在孔子像被移走之后，发出的公正之声。我写了一篇文章，也想谈谈如何正确理解儒家理想人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组 李郦

重新认识儒家人

《说文》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于是"温、良、恭、俭、让"成了一般人心目中儒家人的几个基本特点。然而儒家人的形象，并不仅仅停留在"柔"的层面上。

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而"巧言令色者，鲜矣仁"。但"木"与"讷"这两个特点，往往成为世人对儒家人有所诟病的借口，成为形容人呆笨的贬义词。木讷而弱势的儒家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却一心梦想拾回人们心中的道德廉耻，最后只能在他人的嘲笑声中报以苦涩的一笑。这样的儒家人，似乎一点脾气都没有，从表面上看起来未免太"柔"，但是当我们走进这"木"与"讷"的内部，就能发现这种示弱实质上是另一种要强："木"不是呆头呆脑，而是抛弃了"令色"，有着自己庄重的表情；"讷"也不是不善言语，而是通过对言语表达的克制，摒绝了"巧言"，有着自己稳重的心性。

在这个崇尚"巧言令色"的时代，我们也许不能体会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勇气。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歌："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这哪里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生，这分明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却依然倔强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形象就是"刚"与"毅"。

《孟子》中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能做到这样，必定源自儒家人内心深处的"刚"与"毅"。要实现"仁"，可谓任重而道远，在这条道路上，"毅"是必需的内心修养。而孔子的"道之不行已知矣"，屈原的"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这一切都是儒家人"刚"的表现。

也许我们可以在"刚毅"、"木讷"之间寻找到一种联系。"刚毅"是精神内核，"木讷"是外在表现，正是有了这些特点，"仁"、"义"、"道"、"德"才能成为指导儒家人行为的准则，使得儒家人在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基础上，走向"成人"、"君子"、"圣人"。有时候，正是那些让我们为之而死的东西，使我们因之而生。

责任编辑／薛立若 版式设计／刘扬